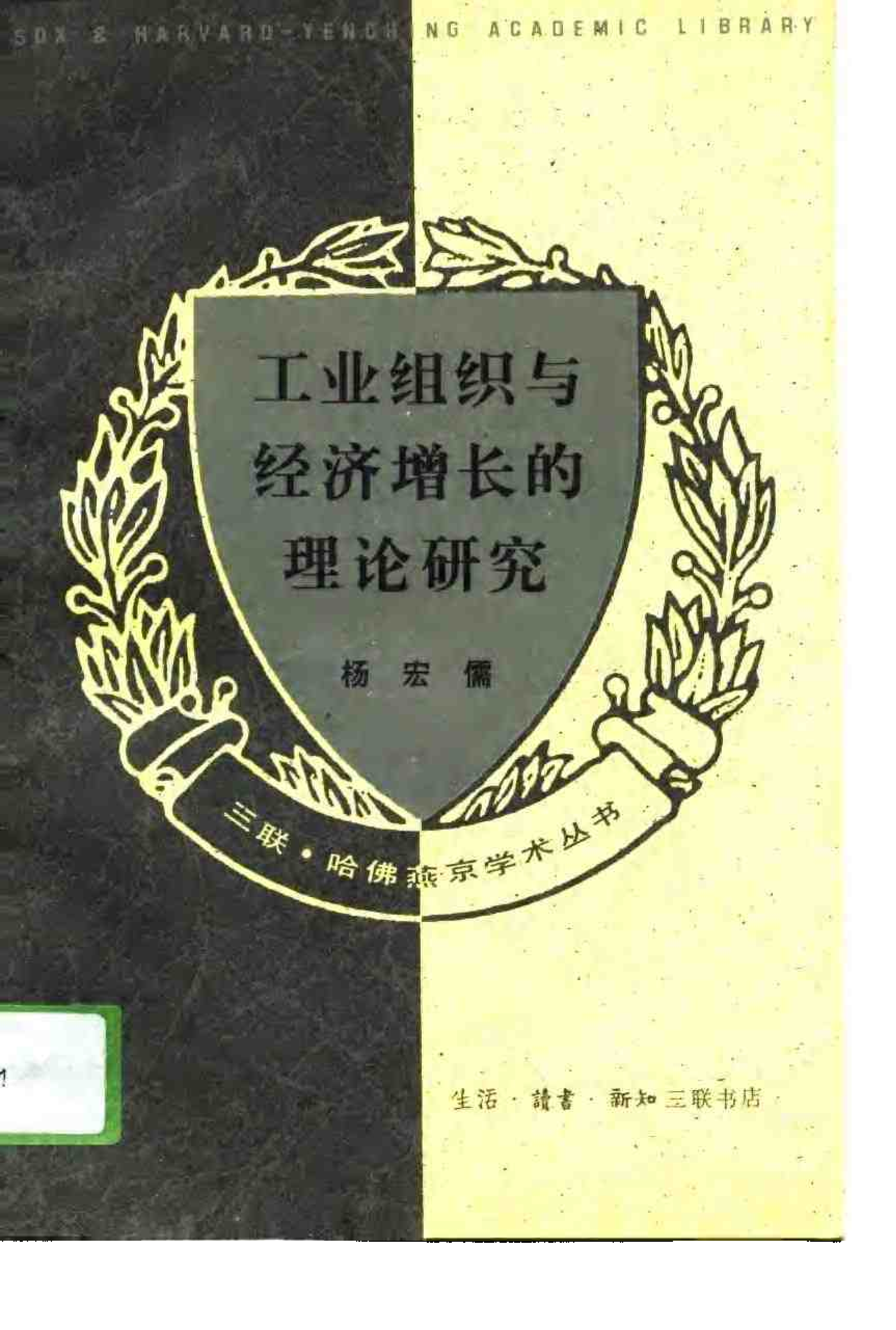

SDX & HARVARD-YENCHING ACADEMIC LIBRARY
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杨宏儒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三联 ◉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杨 宏 儒



◆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京)新登字 007 号

Our Academic Books
are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杨宏儒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7-108-00677-4

Ⅰ.工…
Ⅱ.杨…
Ⅲ.①工业管理体制-关系-经济发展-中国 ②经济发展-关系-工业管理体制-中国
Ⅳ.F425

责任编辑　吕　祥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版　　次　199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75
字　　数　127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7.80 元

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新进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

•

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学术与
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奖掖继起人材，鼓励刻苦治学，
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
学术创新精神，
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
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燕京学院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
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原则上要求参选书稿高于一般博士论文水准），
按年度评审遴选，
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
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

引言

经济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对经济过程的洞悉和远见，在于对改善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和迎接未来的挑战所能给出的政策建议。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已经取得了持续十余年的令人欣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已经从勉强维持温饱的落后状态，走向了经济起飞的阶段。

经济增长的成就为今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和经验的积累，我们已经跨进了现代化之路的起跑线。同时，中国经济也已从较为简单、粗放的发展阶段进入了复杂的经济转折时期。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这样的转折时期带有三个基本的特点。

第一，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需求结构处于从必须性消费到选择性消费的过渡之中。在必须性消费阶段，消费和为了满足消费而从事的生产活动都比较单纯，产品生产和投资的针对性十分明确，供需双方的透明度都较高，市场风险较小。而选择性消费则以需求的多样性和易变性为特点，需要高效的企业和高效的市场来实现产品从开发、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企业的经营活动的主体不仅包括实现和扩大预期的产量，而且要包括技术革新、新产品开发和提高产品质量，这就要求有高水平的经营管理和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能否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这种转变，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在转折时期宏观经济管理的复杂性日益提高。宏观经济管理的复杂既与生产力水平相关也与经济体制相关。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经济增长使社会经济活动日益复杂，资本、技术和管理在生产中的作用加大，中间产品的比重上升，专业化和协调的经济性越来越明显，与之相关的发展计划、投资、项目选择和市场监控，以及各种现实中的经济政策都面临着理论和操作上的困难。从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任何宏观调控政策都有其相应的微观基础。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历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都出现了经济政策的很大变化。我国的经济体制亦是依然处于变化之中，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及其不同的经济行为，使原来有效的调控方法随着情况的改变而或多或少地失效。而建立适应新情况的宏观调控体系，会遇到既得利益格局的对抗，不仅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刻的现实洞察力，更需要坚韧的意志和反复的尝试。得失成毁，矛盾重重。

第三，经济增长的来源构成面临重大变化。在经济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动员资源的能力和由此产生的再生产投入是决定性的。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依靠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在动员资源、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方面是成功的。在改革前，尽管经济基础薄弱，但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并几乎是仅仅依靠劳动力的投入从事了许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即使是在改革以来的十多年间，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广泛使用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但是，粗放型增长在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现资源的边际产出递减。况且我国并非资源全面充裕的国家，绝对过剩的资源只有劳动力，而劳动力只有与其它要素相结合才能获得生产能力。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必须依靠提高生产效率，依靠工业结构的高级化，依靠从国际市场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

理经验。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既有利于产品、技术信息的交流，也有利于刺激企业的竞争力量。然而，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结构调整还是参与国际竞争，我们取得的成绩和经验都十分有限。

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透过纷繁的现象发现内在的规律，在于从更宽的范围和更长的时间跨度上，指出通过经济增长的这一特定阶段所需要的条件。正是由于意识到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即将面临的挑战，我们需要高屋建瓴，做好理论上的准备。中国经济错综复杂、千头万绪，但从性质上看不外乎两类。一类是理论认识尚不十分清楚，需要深入分析和探讨的问题，另一类则在理论上比较清楚，纯粹是操作问题。前者主要是带有长期特点和一定规律性的问题，如我国生产率长期以来提高缓慢、经济效益停滞的问题。后者多是一些短期的现象，例如承包制在执行中引起的某些短期行为即属此类。有一种看法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操作失误所为，这显然是偏面的。频繁的操作不得当，一定是由于对某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刻所致，深入的经济学研究对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意义重大，更是迫在眉睫。

中国经济增长和今后所面临的问题的理论研究，需要一代人的共同努力，显然并非本文所能议论。出于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微薄之力的良好愿望，本文选择经济增长与工业组织演化的关系作为研究内容。经济增长理论在国际上已有多年研究，这方面的文献卷帙浩繁。然而迄今为止，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并未穷尽真理，能够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所启发的更不多见。从抽象的增长理论看，自六十年代以来，以索洛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一直占正统地位，主导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但正

象许多经济学家所批评的那样，这种理论说明的是他们自己限定的现象，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实际过程。当然，新古典增长理论作为认识经济增长的一种理论准备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至少给出了增长路径的一种特解，有利于我们认识和追踪增长的时间轨迹。

认识经济增长的实际过程比掌握任何增长理论都更为困难。理论是灰色的，而现实却有着生动的与具体条件和组织过程相关的方方面面。

二战后，国际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奇迹，一是战后日本和西德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复兴。特别是日本，在战后不长的时间内，勿庸置疑地赶上并在一定范围内超过了其它发达国家。第二个奇迹是亚洲四小的迅速崛起。这些国家和地区先后分别经历了十年左右的经济高速协调增长阶段。他们创造的经济奇迹，使无数经济学者和政治领袖看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希望。各国学者对于高速成长所需的内外条件和机理已经做了许多研究，逐渐深化了我们对增长过程的认识。

伴随着经济增长过程而发生的工业组织变化，是反映增长本质的重要方面。概括地说，工业组织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经济增长。其一，工业组织的调整和演化是资源配置合理化的条件。工业组织的变化推动资源配置优化，从而取得理想的经济效益，而效益的积累又是投资和继续增长的源泉。这是早已为人们所认识的。其二，工业组织的某些形式具有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组织因素和技术因素一样，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经济增长具有相当的继承性，经验的积累、组织的协调，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率。象专业化、学习过程等增长因素的实现，都依赖于一定的组

织形式。

工业组织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迄今为止讨论得还很不充分的问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工业组织形式和结构都是由政府控制的，经济增长也是由政府投资推动的，很难反映出两者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市场经济国家，至少有三个原因影响了对此的深入研究。第一，经济学的学科分类。工业组织问题是由微观经济学中的市场结构理论转化而来。在传统的经济学思想中，只要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就实现了最佳的静态效率，而总量经济增长是由自然增长率决定的。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在资源合理配置之外，又增加了资源的充分利用，但是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的合并未见进展。同时，随着西方经济学数理化和抽象逻辑化的加强，大多数学者专心于很窄的领域，搞微观的人很少考虑宏观问题，反之亦然。这也就影响了对经济过程的综合研究。第二，经济学研究中的思维定式。在西方经济中，与增长相关的投资和开发活动是由企业对经济的预期决定的，工业组织也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在西方经济学家眼中，这是一种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过程，无须多加研究。第三，问题的复杂性。工业组织与技术特性密切相关，且工业组织的目标具有多重性，因果关系复杂，难以从中分离出工业组织与每个具体因素的关系。

分析增长过程与工业组织的演变之间的关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意义的。在开始本文之即，要说明的是：第一，由于增长过程的复杂性和与其它社会事件的密切联系，“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总是保持缄默的，而是不断地表白自己”，这既是启发又是混沌的源泉。因而，即使在我们限定的问题上，本文的分析也是初步的。第二，经济增长可以与社会上的几乎所有问

题有关，本文限定在增长与工业组织的关系上，这也就难以避免地对涉及到的其它问题的讨论是欠深入的，甚至是有片面性的。第三，对工业经济组织研究中的一些概念，在东西方之间有些差异，即使是在西方经济学界内也有些分歧，因而本文对有关概念的应用是以本文中给出的限定为准的。

目　　录

第1章 概论

1.1 经济增长与工业组织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国经济中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持续增长，其本质是能够满足社会（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者）需要的商品生产的扩张过程。这个过程从供给方面看来源于各种要素的投入和生产效率（全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基本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资本，资本一般包括广义的各种可利用资源。土地、森林、矿产、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可以单独列为生产要素，以强调其不可多得的“天赋”的性质，也可以包括在广义的资本之中，因为它们和由资本所代表的实物型投入物一样，都是作为物质型投入而加入生产过程的，也都是以牺牲它们可能用于其它用途为代价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则是指在投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技术和组织水平以及其它因素的作用，使产出水平得以提高。生产效率的测度现在已由单纯的劳动生产率指标转向综合要素生产率指标，以全面衡量包括资金在内的全部投入。

从要素投入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有这样的一致的基本认识，即要素投入的增长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循环过程。要素投入的增加会推动产出量的增加，面要素投入之所以能够增加，又是上一期经济增长的结果。

（1）劳动力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两者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能互相替代。超过一定的范围，就会使其中投入过多的要素失效。当资本投入量不变时，扩大劳动力的投入量只能使劳动力的边际产出递减。特别是在制造业内，生产过程常是由设备的性能决定的。在一条正常运转的生产线上增加劳动力不仅毫无益处，反而会干扰正常的生产秩序。因而，单纯增加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可能会由于人数的增加而导致人均产出水平的下降。也正是在只看到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一些悲观的经济学家为经济增长描绘了阴郁的前景。

（2）资本投人的增长依赖于经济增长。很明显，一国的资源拥有量是无法人为改变的，即使考虑到开发技术的进展，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增长也是有限的。以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为代表的实物资本投入是来自于上一期总产出的。在一定规模的产出量上扣去用于消费的部分，构成了资本投人的可能的资金来源（当然还要受实物型态制约）。在产出确定的情况下，要增加资本投入只能提高积累率。提高积累率确实可以在短期内提高生产能力，但其负作用是对国内消费品需求和消费品生产的压制，并使生产资料生产走向自我循环的畸型轨道。

（3）另一个引起许多发展中国家关注的增加要素投入的可能性来源于引进外资。但事实上，国际资金的流动是以考虑了风险在内的综合利润为导向的。只有在一国的生产有竞争力的情况下，才会有正常的资本流入，一些发展中国家以高额关税和行政手段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割裂开来，某些国际资本为了打入这一高利润的市场而以投资为手段，这是不必以该国的经济增长为前提的，但显然也是不受欢迎的。

需要强调，我们所说的是，靠增加要素投入而提高经济增长

率是很有限的，并不是说要素投入本身在生产中不重要。要素投入不仅是生产的起点，而且，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结构的调整都要以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为媒介。当广义的技术进步体现在要素中时，要素投入的增长对经济增长不仅有短期作用，而且有长期作用。这是本文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的理论差异。

对于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有一个容易误解的概念，即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指的是，在经济增长的诸项来源中，由于要素投入的增加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在全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例如，依据丹尼森对美国经济在 50 年至 62 年间的增长测算，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为 3.32%，资本的年增长率为 3.58%，劳动力的年增长率为 1.42[①]。按照丹尼森的分析，在美国的那个时期，资本的平均产出弹性为 0.15，劳动力的平均产出弹性为 0.82。也就是说劳动力每增长 1%，会引起产出增长 0.82%，资本每增长 1%，会引起产出增长 0.15%。经加权后，全要素（资本加劳动力）的增长所引起的经济增长为 1.95%，占全部经济增长的 59%。这也就是说，要素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 50%左右，其余部分均是由生产率提高所致。但随着计量经济学方法的逐渐深化和统计数据的日益丰富，87 年哈佛大学的乔根森等人以最新的方法估计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来源，指出美国经济的扩张主要是由资本积累所致，由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 25%左右，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②]。

---

① 参见 E. F. Denison, *Why Growth Rates Differ*.

② 参见乔根森等:《生产率与美国经济增长》中译本。

容易理解，要素对增长的贡献率仅仅说明的是，在现有的增长率下，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作用。而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却受制于许多因素，决不是一次性的要素投入增量能够改变的。例如，同时是在丹尼森的分析中，西德的要素贡献率与美国十分接近，均在50%稍多一些，然而西德的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7.26%，是美国的2倍有余。提高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就会提高经济增长率，这是入所共知的。然而，在美国3.32%的年平均增长率下，资本的年增长率即使超过3.58%，也绝不会达到西德的6.37%的资本增长率。这也就是我们在上文中强调的要素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循环制约。

各国在经济增长率上持续存在差异，是各国经济实力变化的根源。发展中国家要追赶发达国家也必须提高自己的经济增长率。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长率的差异，这也是经济学家们长期思考的问题。正象卢卡斯所说，这个问题对人民的福利是如此重要，一旦为此问题所吸引，便很难再有兴趣考虑其它问题。如上文所言，要素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互相制约，怎样才能从较低的要素增长和经济增长率走向较高的要素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呢？走向良性循环的路只能是提高经济效率。就目前的认识水平而言，生产率提高的机制主要是：(1)科学技术进步；(2)经济结构转换；(3)内生经济增长。(这里要明确生产率的概念。通常我们理解的技术是和设备联系在一起的，技术进步就是用新设备代替旧设备。而在理论上，新设备所需的资本投入是计入资本投入的，全要素生产效率是包括资本效率在内的。只有当新技术的投资收益率大于原来的资本收益率时，全要素生产率才是提高的。)

科学技术领域的突破能带来生产技术的更新和效率的提

高。从蒸汽机、电力的发明到今天的微电子技术、合成材料和生物工程，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展又可分成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技术的创造。前者是由科学技术的内在规律决定的，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显然不依赖于经济状况。然而真正为人类带来工业化利益的，是大量应用广泛的应用技术。应用技术的研究在发达国家都是由企业的开发活动（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形式进行的，其意图在于能通过产品改进获得竞争优势和随之而来的利润。应用技术的创造是以投入大量的R&D资金为条件的。企业是否愿意为技术而投资，取决于这项投资包括风险在内的预期收益。这样，技术创新便纳入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关于技术创新的具体问题，国内已有学者在从事创造性的研究。要说明的是：第一，如果R&D活动也带有不可分性和固定投入，那么技术创新便会与组织结构有关。第二，企业从事开发活动必须既受到竞争的压力，又有获利的诱惑，显然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倾向将是有差异的。这就提醒我们，技术创新是与工业组织结构相关的，尽管这种关系更多地是体现在工业组织变化以适应产品的生产上。

经济结构的转变对生产率的影响是很容易理解的。当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如农业、矿业）转向高生产率的部门时，必然会使全社会平均的生产率提高。经济结构的转变一直是增长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从库兹涅茨提出现代经济增长概念以来，已有丰富的关于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化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钱纳里等依据多国模型归纳出了长期结构转换的标准模式，但这仅仅是一种一般趋势的描述而已。没有理由认为各国一定要遵从这一标准。况且许多经济增长取得显著成就的国家，其结构

都是偏离这一模式的。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结构转变不仅仅是以部门划分的工业化过程，更需要部门内的结构高级化过程。近年来我们一再强调调整产业结构，但是久调不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过于相信某些国家的“产业政策”所起的作用，而忽视结构调整的根本途径，即产业组织的变化。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80年代后期才兴起的，在此之前只是偶见零星的观点。内生增长理论是一些相近的观点的集合，其主题是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自身演化的结果，满足动态的一般均衡过程。这一理论观点主要由比较保守的美国芝加哥学派所倡导，核心是试图从经济系统之内发现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这个理论对经济增长中的组织结构变化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强调了专业化组织、学习过程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这些作用又都是与工业组织形式和结构密切联系的。因而，内生增长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经济增长与工业组织之间的理论联系，这种联系是可以程式化的，这也就有助于克服在此问题上研究的随意性。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的供给方面与工业组织有着重大的关系，分析工业组织的演变，是观察经济增长现实途径的重要方面。经济增长过程是供给和需求相辅相成的过程。需求水平对现实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十分重要，并对提高供给能力有推动作用。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因而，研究工业组织与供需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和设计适合经济增长的工业组织，对我国的长期发展将有重要的理论作用，这也就是我们提出并研究这一问题的用意所在。

1.2 概念限定

本文中工业组织的概念与西方文献中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概念基本相同，略有差异。Industrial organization 亦称产业组织，其讨论范围一般包含了除农业之外的所有部门。而本文中则仅讨论工业内的各部门（不包含服务业）。工业组织这一概念，对局外人来说很难直观地了解其内容，它并不是讨论怎样组织和指挥一个企业，而是研究怎样通过一定的组织机制，使得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从事的各种生产协调起来，并且分析组织机制上的不完善或改变，会使目标的实现受到怎样的影响。在市场机制下，产业组织研究又可称为市场结构（market structure）研究。这是因为市场是协调各种经济活动的主体，而市场的结构（是竞争型还是垄断型，程度如何）也就极大地影响了产业的运行状况。一般“产业”被界定为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的集合。按照这种界定，产业划分是比较细的，一个经济内可以有许多的产业。西方的产业组织理论是以每个产业为研究对象的。国外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一般包括下述内容：

1. 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例如，企业的成本函数、交易费用对企业的影响、企业的代理人行为等。

2. 关于市场行为的分析。例如，寡头垄断行为、垄断与反托拉斯、串谋等。

3. 关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管制。例如，市场失灵与管制失灵、管制机构与方法的设计、管制效果的分析等。

4. 产业组织与国际经济的关系。例如，国际贸易的源自产业

组织的优势、产业组织的国际差异比较等。

5. 有关产业组织理论的各种经验研究和验证。

本文中对工业组织的概念不做一般性讨论，而是密切联系与增长的关系来限定其内涵，侧重点在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许多问题都有联系，经济增长与金融的关系、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与结构转换的关系等都已有过许多研究。本文讨论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限定在下述三个方面：(1)工业组织形式，即企业的专业化、联合化、规模经济对增长的影响。(2)产业组织结构，即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进入壁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3)动态的演化，即企业生存、灭亡、重组等组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无论是对国际经验的分析还是对国内的分析，在本文中都是按照上述三方面来理解工业组织的内涵。

本文对经济增长因素的论述与通常的分类基本一致。经济增长指的是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实际经济增长，这一过程并不仅仅来自于产品和劳务数量的扩张，也来自于技术进步和质量提高所引起的产品价值量的上升。要说明的是，许多对熊彼特的创新说比较熟悉的学者，或许对内生经济增长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这主要是个文字归类问题。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增长过程很大程度上来自学习过程和调整，是个渐进的过程。某种产品从其最初的诞生到大批量生产以满足广泛的需要，其间经过大量适应性的探索和调整过程，既有制造技术和工艺上的改进，也有为达到低成本的生产和销售进行的组织调整。在一定的目标和行为准则下，有某些环境就自然会有某些结果，这是可预见的一般均衡的性质，未必都是出自随机性的创新冲动。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包括五种情况：

(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可见,上述两种提法是对同一增长过程中的不同侧面进行了强调,创新理论强调变化带来的生机,内生增长观点则强调演变过程的有序性。

另一个概念是所谓"均衡增长"问题。在增长过程是均衡的还是非均衡这一问题上,对"均衡"有着三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各部门之间在增长中是否保持一致的地位。很明显,就此而言,经济增长过程是非均衡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新部门的兴起和夕阳产业的衰落,在这点上是没有分歧的。第二种理解实际上指的是长期增长率是否稳定,也就是卡尔多描述的发达工业国家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是否一定是增长的特征。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讨论。第三种理解则是指增长过程是否是一个与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完全相容的过程,也就是资源最优配置与最优经济增长配置是否一致。内生增长理论比较重视增长中的学习过程和收益递增,因而也就导致了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在这一点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似乎是主张非均衡观点的。然而内生增长论坚持认为这一过程是在动态均衡的基础上,由市场机制可以实现的。总之,关于增长过程的均衡性,本文中不做概括性的假定,而是对具体过程做出具体分析。

1.3 基本内容

本文的基本内容包括:

第一,建立经济增长与工业组织的理论联系。

尽管经济增长会与工业组织互相影响的观点,从直观上是

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但是在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中却很少讨论这个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内。经济增长是个典型的宏观问题，而工业组织与市场理论密切联系，属微观经济学的范畴。近年来尽管一些有见地的学者一再论述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但宏观和微观分析的结合难度较大，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应用目标所致。工业组织影响资源配置，通过资源配置的改善可以获得资金，追加投资又会增加产出。但是，这种效应一般被认为是一次性的短期效应。资源配置合理了之后，就不再具有改进的机会。在长期内，经济增长是在资源配置已经合理化的条件下讨论的。本文中讨论了含有组织问题的增长模型，指出工业组织通过资本积累的外在性和学习过程，直接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为增长过程描述了大致的轮廓。这种类型的模型有助于解释各国之间增长率的持续差异。

第二，讨论和分析了工业组织演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经济增长过程是我们研究的核心，工业组织状态和演变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的特征。在从理论上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工业组织的关系之后，我们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工业组织的演变做了实证性考察，证实了工业组织形式和演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果说美国经济是在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的过程中崛起的，那么，日本和后来的韩国，在追赶发达工业国的进程中，则更直接、更主动地采用了更为集中的工业组织。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分析了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原理，分析了其微观经济机理，并给出了工业组织合理化的准则。

第三，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工业组织问题，并对工业组

织调整的方向作出了初步的建议。

我国在取得持续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经济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出于复杂的各种原因，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与工业组织形式的僵化和工业组织结构的非效率性密切相关。优化工业组织结构并建立灵活的组织调整机制，配合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将有助于我国经济走上效益型的发展轨道，并保持长期增长的势头。当前，组建企业集团对优化工业组织、促进和稳定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本文考察了我国企业集团的现状、潜力，和进一步发展中的问题，并讨论了搞好我国工业组织调整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 2 章

思想渊源和实践的启示

——经济增长分析的起点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各种增长理论和过程分析在学术出版物中已如汗牛充栋，每种观点或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实践背景和应用范围。经济增长理论和整个经济学一样，本世纪来经历了形式化的过程，即强调表述严格性、数学化和可验证性。但是在增长理论的总量形式化过程中却也丢掉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增长的重要性，认识到工业组织在增长中的作用。作为分析经济增长与工业组织关系的起点，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

2.1 从过程分析到总量模型

一、经济增长问题在经济学产生之时起就成为考虑的中心问题。在亚当·斯密那一代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范围是很宽的，其基本思想是与其价值论相关的。在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中，有一部分经济活动（生产性经济活动）能够产生出超过成本的剩余，不断地扩大对这部分活动的再投资就可实现经济增长。按照斯密的想法，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一是生产

性就业与非生产性就业的比例关系，二是资本积累。现在人们一般知道斯密主张以“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竞争机制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而实际上斯密同时也很强调资本积累和规模经济对提高生产率的作用。在《国富论》中，斯密以缝衣针的制造为例说明分工的作用，并提出了市场规模影响生产率的著名论断。分工引起生产效率的上升，在斯密那里是一种自然的力量。随着资本积累上升，就业量就会增加，增加的收入使制造业的市场扩大，这就使产品生产的数量能够满足分工的要求，从而实现进一步的分工而提高生产效率。

我们看到，尽管古典经济学家在分析技巧上远不如今天精细，但从大的思路来看，人们今天的认识也不过如此。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的来源分析放在物质生产领域，并试图从生产过程和生产组织改变中发现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仍具有启发。

随后，在经济理论规范化和形式化的过程中，却失掉了这些难得的思想。马歇尔之后的经济学基本上考虑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其出发点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下，靠市场竞争自然地就会实现经济增长，重要的是如何使稀缺的各种资源产生最大的收益，实现最佳使用。在这一时期，基本上没有宏观经济学的立足之地，也就更没有增长理论。

二、西方国家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市场会失灵，从政策上导致了国家干预程度的上升。从经济理论上看，人们也认识到仅仅依靠资源配置并不能说明许多总量上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多马和哈罗德提出了简单的宏观增长模型，即哈罗德一多马模型。这一模型实际上是凯恩斯模型的动态化，在思路上是从

需求角度来考虑的。总需求由投资、消费、出口和政府支出四个部分构成。依照凯恩斯的就业理论，投资需求不足是导致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哈罗德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在动态下，储蓄依赖于收入水平，而投资依赖于收入变化，那么怎样才能使储蓄与投资相等呢？答案十分简单，只要收入以固定的比例增长。（数学推导十分简单，设：$St=s\cdot Yt$，$It=v\cdot dYt/dt$；若要 $St=It$，只须 $s\cdot Yt=v\cdot dYt/dt$，即 $Yt=Y_0e^{(s/v)t}$。）多马教授则是从投资的双重性质开始其分析的。一方面，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引起了收入变动；另一方面，投资以生产资料的增加扩大了经济系统的生产能力。为了使新增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产出也必须增加相同的量。何以做到呢？结论与哈罗德雷同，投资和产出必须以固定的速度增长。（假定新增投资的生产率是1，则新增生产能力 $dPt/dt=1\cdot It$，由乘数原理 $s\cdot dY/dt=dI/dt$，假定 $P_0=Y_0$，为使 $dPt/dt=dYt/dt$，得 $It=I_0e^{st}$）容易看出，哈罗德—多马的增长模型强调了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需求条件，但在思路上也存在基本的缺欠。除去其形式过于简化，假定过于苛刻等技巧性的缺点之外，其理论基础是有问题的。这个模型依据的是凯恩斯的需求决定论，而凯恩斯的理论是短期理论，是在假定供给能力有剩余的情况下或供给能力可以随需求面变化的情况下展开的，因而在哈罗德—多马的模型中见不到对生产或供给的研究。而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是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的过程，供给能力的提高是这一过程的基础。

三、六十年代以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逐渐取得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同。以索洛(R. Solow)等人开创的经济增长的长期研究是以供给方为主线的。其思路上的进步和成就在于，它明确提出了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实证情况的联系，限定

了增长理论要描述和解释哪些经济增长中的基本现象以及如何描述这些特征。这样，理论的解释对象就很清楚，同时易于接受各种经验验证。正象索洛本人所称，经济增长理论尽管可以包含许多精致的内容，但其框架结构却是比较简单的。这种理论就象一种“寓言”，通过一种人为加工的特定的故事来说明一些道理。增长理论究竟应该解释什么现象呢？N. 卡尔多认为发生在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六个“典型的事实”可以显示其性质：(1)从比较长的时期看，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率具有稳定性；(2)人均资本持续增长；(3)资本的收益率是稳定的；(4)资本——产出比率是稳定的；(5)劳动和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固定的；(6)各国之间在生产率增长率上存在显著差异[1]。虽然经济学家们对这六个“典型的事实”进行了许多经验验证，对其中的某些条也有过怀疑，但基本上认为这些描述大致符合工业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实际过程。考察了这六条特征之后，人们发现，这六条之间并不是线性无关的，而是有一种依存关系。由事实1和事实4必然可以得到事实2。(设Y、L、K、代表总产出、劳动和资本，若Y/L稳定增长，Y/K不变，K/L必然持续增长)事实3又可由事实5和事实4推出。(设r代表资本收益，若Y/K不变，r · K/Y不变，r一定也不变。)这样，真正独立的长期经济增长的特征由上述(1)、(4)、(5)、(6)四条构成。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描述了除第6条之外的所有特征。上面已经提到，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意图是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一种经济能够稳定地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要分析的起点还是这个问题。在哈—多模型中，经济体系只能在一种均衡

1　见卡尔多：《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载路茨等编《资本理论》。

增长的“锋刃”上达到平衡，一旦储蓄率、资本——产出率或劳动力的增长率稍稍离开均衡点，其结果不是失业增加就是持续的通货膨胀。索洛1965年发表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一文[1]，也是从研究增长条件开始的。在每一时期的产出中，总是一部分用于消费，另一部分储蓄起来用于投资，净投资是总产出的函数 $\dot{K}=sY$，而产出又是资本与劳动投入的函数 $Y=F(K,L)$；于是 $\dot{K}=sF(K,L)$。假定劳动力的增长源于人口的增长，不受经济因素影响以指数增长，$L(t)=L_0e^{nt}$，就有 $\dot{K}=sF(K,L_0e^{nt})$。这是一个只含有K(t)的一阶微分方程，这个方程的解是资本存量的时间轨迹，而这种资本存量将使全部可供的劳动都得到就业。当我们知道了劳动力供给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又知道了资本存量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就可以利用生产函数求出总产出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也就是经济增长的途径。至于资本积累的增长率是否与劳动力的增长率相一致，取决于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索洛给出证明，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当要素比率可变时，经济系统能够对任何一种给定的劳动力增长率进行调整，达到平稳的按比例扩张的状态，从而也就摆脱了必须在锋刃上移动的阴影。

到这里，索洛的研究思路基本上与多马、哈罗德是一致的。而且，这种以微分方程研究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的思路，实际上也是后人研究经济增长的一种标准思路。这种做法的优点是，能够在几种简单的假定满足的情况下，得到一种经济增长路径的解，从而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增长的轨迹。留有余地的是关于生产函数的具体假定。在此，我们首次从数量关系中看到了那我们早

---

① 中文译文见索洛：《经济增长论文集》，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就认识了的道理，即生产过程的性质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性质。关于生产函数的不同性质的假定，实际上出自于对实际生产过程本质的不同理解。对生产过程的深入、细致的分析，理所当然地是经济增长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事实上，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也正是因其对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因素的强调而声誉鹊起的。索洛在 1957 年发表的《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一文中写出含时间变量 t 的生产函数，$Q=F(K,L,t)$。在中性技术变化（如果生产函数的变化并不改变劳动和资本之间的边际替代率，而只是使既定投入量所达到的产出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称中性技术变化）的假定下，技术的因素可以分离出来，$Q=A(t)\cdot f(K,L)$。对时间微分后得到：$Q/Q=A/A+W_kK/K+W_lL/L$，其中 W_k，W_l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相对份额。这个式子就是人所共知的索洛增长方程，其含义是，经济增长率是技术进步率加上两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和。在西方的许多学者看来，经济系统在长期内是稳定在自然增长率左右的。自然增长率是一种稳定状态，在简单的表述中是“劳动供给的增长与纯粹增加劳动的技术进步的增长率之和”。正是这一结论，给人们试图运用政策加快增长率的设想浇下一盆冷水。它意味着，某些利用率上的变化的效果是短暂的，长期内的经济增长率有趋于自然增长率的倾向。当然，如果实际的增长率低于自然增长率，则一定是存在着某些障碍在起负作用，这时就需要某些措施和改变来清除障碍。很显然，这种政策在理论上是一种一次性的配置政策，并不影响长期增长率。

既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如此大的理论意义，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也就一时成为热点。技术进步在生产函数中的性质一般从三个方面描述：(1)技术进步是怎样进入经济系统的？依照

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分为体现型和非体现型技术进步;(2)技术进步引导的等产量曲线的移动类型是怎样的?依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分成中性技术进步与非中性技术进步,在中性技术进步中按不同表述又有希克斯中性、哈罗德中性和索洛中性之分;(3)企业家控制技术进步的能力是怎样的?依此分成内生技术进步与外生技术进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一般认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是外生的(应该承认这样的假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数学上的简单)。对于体现型和非体现型的问题,一般多认为技术进步是资本体现型的。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就意味着,技术进步并不是对某一时刻经济中所存在的所有资本都能等效地起作用的,技术进步是通过体现了技术改进的新的资本品,例如新的设备、更有效的中间投入等,进入经济系统的。这一看法显然更为接近实际情况。以模型描述这种过程时,一般假定不同时期的资本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时间越新的资本效率越高。这就是所谓资本寿命期(vintage)理论(其数学上的推导稍微复杂一些,为了理论逻辑上的简练,这里不必写出这一过程。在许多中级以上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可找到)。

四、索洛之后的增长理论所以取得了长时间的一致,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正确地描述了发达国家工业增长的现实。与理论相伴随的,是大量的对西方工业国家经济增长过程的实证研究。这些实证研究根据时间序列的历史数据,既考察所谓"典型的事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出现,又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尽管这些结论在细节上不尽一致,但对典型的事实大致是一种认同的态度。也许是人们日益认识到各种可用数据本身的误差,对于诸如资金——产出比等关系的长期趋势的确定不再严格地深究其是否不变,而是一般性地认为,这是一种重要的关

系，理应作为增长理论解释的内容。在众多的实证研究中，以美国霍普金斯研究院的丹尼森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影响最大。丹尼森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把要素投入的度量作了深入的分析，除去要素数量的变化之外，对要素投入的质量的改进作了衡量。例如，对劳动质量的变化，丹尼森分成四项：(1)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变动；(2)劳动力在年龄和性别构成上的变动；(3)女劳动力利用上的改进；(4)劳动时间的变化。对资本存量的变动也是细分成五类：(1)生产存货变动；(2)非居民用设备和建筑变动；(3)住宅和居民用地变化；(4)国际财产变动；(5)非居民用土地的变动。分类计算资本就有助于准确地测度资本存量的变化。将这些要素投入按照它们对产出的贡献加权之后就得到全要素投入引起的经济增长。从实际经济增长率中减掉由于要素增加引起的经济增长，余下一个部分即是由生产率的变化所引起的经济增长。丹尼森又从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变动中识别出结构变化的影响和规模经济的效果，把其后的净剩余归于知识进展的作用。从方法上看，只要数据完备，这种核算不失为一种简洁明了又含义深刻的好方法，尽管其中也包括了“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等于边际收益”的不完全现实的假设。从数量上看，丹尼森认为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占全部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约有50%左右的经济增长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广义的技术进步。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中知识进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左右。这一结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我国也有许多类似的看法。由于缺少系统性的要素质量变化的数据，在我国对技术进步研究之初，曾广泛使用索洛增长方程作为估计技术进步贡献的工具，因而也都得出了技术进步的贡献可以高达50%以上的结论。而实际上索洛增长方程是一种抽

象性很强的理论方程，即使不说其假定，单就其是总量方程，隐蔽了结构变化因素这一点来说，以此来分析问题的粗糙性就是必须充分认识的。另一些著名的数量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乔根森等人，很早就与丹尼森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于 84 年推出了他们的最新的成果《生产率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其重要的结论是，美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要素投入推动的，生产率增长对美国增长的贡献不足 1/4。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分歧，主要是因为后者是以部门分析为基础的，在计算各部门的经济增长因素之后，再汇总成总量的增长因素。而丹尼森的做法还是一种总量分析法。由于各部门内在生产性质上有较大的一致性，使用部门的生产函数估计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应该比总量估计要有更高的准确性。因而，我们认为乔根森等人的核算或许更为接近实际一些。出于我们的实际情况，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增长因素在细节上做出过多的追究。我们更加注重各种分析对我们认识经济增长过程的机理的启示。

五、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至今又面临着新的深化的机会。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鼎盛时期之后，其局限性也日益明显。首先，这种理论是以均衡的稳定状态分析为基准的，这就限定了其应用范围只能是在少数符合条件的国家和时期。经济增长问题本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理论课题，与经济组织、经济政策有着人所共知的联系。然而新古典增长模型把问题人为地划窄了，模型趋于精细，而把困难的理论分析放在一边，从而仅有十分有限的政策意义，这也就难怪有人将之称为“无结果的练习”(sterile exercise)。索洛本人也曾指出，均衡状态的研究对经济增长理论是一个好的起点，但若作为结局将是危险的。其次，正象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能描

述和解释典型事实中的重要一条，即各国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长期差异。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与经济水平的差异在本质上截然不同。解释国家之间存在的经济水平的差异是比较容易的。经济起点、资源条件、历史和社会因素都影响各国的经济水平。但若企图以这些因素解释增长率的差异则是徒然的，因为基数并不是速度，基数低的国家有时反而易于产生速度。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仅仅用资本缺乏来解释增长率的差异难以服人，假若经济系统运转良好，仅仅是缺少资本，那么资本的相对稀缺性应导致资本的收益率上升，从而使贪婪的国际资本在利益的诱导下而流入。但实际上，在资本短缺的国家的投资，往往没有好结果，其收益普遍低于在中等发达国家投资。偶有成功者也深感学费昂贵。这种情况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成惯例、屡见不鲜。用技术落后来解释更是气虚，因为技术后进国面对的是广大的成熟技术的市场，更容易选择适合自己的技术，更容易学习已有的经验，其技术进步率应该容易是较高的。用劳动力素质来解释也理由不足，落后国家的教育发展常常快于经济增长速度，更何况大量后进国家的劳动力能够流入发达国家并找到工作，可见基本的素质还是具备的。显然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忽略了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忽略了经济组织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只按新古典的稳定增长理论，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的增长率曾是8%，美国是4%，而有些国家出现负值。

必须说明，上述讨论按严格的界定有些已可称为“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有概念上的区别。发展经济学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和行为，除去提高人均收入和生产能力等经济因素之外，还包括社会公平、减轻贫困、促进人

的健康等社会因素。经济增长理论则研究发达国家的产出的变化。但是我们认为，不论其经济结构是否符合传统的增长理论的假定，任何国家的富强都无一例外地依赖于其生产和收入的增长。一个好的增长理论应该对不同水平上国家的经济增长规律都有启发作用。分析经济增长差异的成因，以及通过何种变革或政策调整可促进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理论面对的最终需求。

2.2 经济增长过程要求理论的深化

我们已经看到了总量增长模型的形成过程。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实证分析，历来比理论要丰富得多。除去均衡增长状态之外，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化和影响增长的政策同样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亚洲四小等新兴工业国和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似乎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提出了新的理论问题，其中的内在机理只有在新的理论体系内才能得以解释。

一、库兹涅茨分析了今天的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之初到工业化之后的转变过程，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概念。这一过程包含了工业化、城市化等全面的结构转变。统计资料显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上升，需求、生产、贸易和要素使用上发生了一系列的结构变化。例如：消费需求在国内需求构成中占的比例下降；食品消费在消费构成中所占比例下降；在总产出构成中制造业所占比例上升、初级产业所占比例下降；在就业构成中服务业所占比例上升；在总投入中，中间投入 的比例上升等等。钱纳里(H. Chenery)等人总结了不同水平上的国家对应的经济结构的平均值，提出一种平均的结构类型。容易理解，随着收入水

平的提高，恩格尔效应发生作用，人们对食物的消费终归是有限的，其它需求将转向非必须性消费，这就要求加大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个问题或许还有有另一面，因为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特性，制造业能够获得更快的生产率增长，从而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

要正确认识的是，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变的关系是一种长期关系，并不存在唯一的最佳的对应关系。统计研究还发现，一些取得了比较成功的经济增长的国家，其经济结构往往是与平均结构有较大偏差的。例如，世界银行在考察我国经济的时候，就发现我国 1981 年的经济结构中，制造业的比例已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上值得深入研究的是，制造业的发展是否有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应怎样发展制造业才能保持制造业的效率。对本世纪经济学有较大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N. kaldor)早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卡尔多 1966 年在题为《联合王国的缓慢的增长率的起因》的一次讲演中提出，应该将经济增长看作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这种过程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不能解释经济内各部门间的本质不同，就不能圆满地解释经济增长。卡尔多认为英国经济速度的放慢，主要原因就在于制造业增长放慢。说到制造业的增长为什么会放慢，卡尔多最初认为英国经济已进入成熟期，推动制造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全部转移完毕，由此将使制造业的进一步增长遇到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后来，他的观点有所变化，认为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不足是主要原因。我们的兴趣不在于英国的制造业为什么增长缓慢，而在于制造业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来说，制造业带动经济增长是很容易接受的。早在 1958 年赫希曼就认为制造业有很强的关联效

果，理当成为领头产业。然而卡尔多指出的是，即使在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过程的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增长仍是十分重要的。卡尔多举出了统计资料支持他的观点，也确实有许多经验证据证明，存在着制造业增长超前于经济增长的规律。那么原因何在呢？直观的解释是，制造业具有比其它产业高的生产率，制造业的增长会提高平均的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种说法是，制造业内有更多的技术进步机会，提高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将使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机会加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卡尔多认为上述理由并不是重要的，本质的问题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具有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的性质。收益递增亦称为动态规模经济，指的是生产率提高与产出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卡尔多在最宽的意义上使用收益递增的概念，不仅包括由于大规模生产而带来的利益，也包括产业自身增长的累积优势——技能和专利的发展、交流经验的机会、专业化的机会等。亚当·斯密曾指出生产力的最大改进是分工的结果，分工有助于：(1)促进工人操作的灵巧；(2)节省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的转换时间；(3)便于应用机器。但是分工受制于市场的范围。那么，是否存在着生产率随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提高的趋势呢？意大利经济学家沃顿(P. J. Verdoorn)认为存在着这样的统计规律。在考察了一些国家工业增长的经验数据之后，沃顿指出，劳动生产率的产出弹性的平均值在 0.45 左右，即生产规模每增长 10%，劳动生产率增长 4.5%。在沃顿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做过不少的经验验证，虽然各自的样本不同，但大致上支持这一发现。因而生产率随生产规模而增长的现象被称为沃顿规律。卡尔多在 66 年重新强调不大引人注意的沃顿规律，并对不同的部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沃顿规律在第二产业之内特别是制造业

内，比在第一和第三产业更为合适，也就是说制造业享有更为明显的动态规模经济。卡尔多认为制造业引导经济增长，这是主要的论据。前面我们从理论上讨论过生产过程的性质对经济增长理论假设的决定作用，这里我们又从实际数据中遇到了这个问题。这就强烈地提示我们，经济增长研究必须落实到对生产过程以及不同部门生产过程的特性这一点来认识。

二、近三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和实行各种经济政策的不同结果，对我们认识经济增长过程也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五十年代，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和关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针对西方的建立在均衡概念上的一般经济理论难以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提出了许多旨在刻画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的经济理论，例如比较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依附理论、关联发展理论等。这些思想对南美的国家影响很大。(南美洲在二战后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虽然政策的制订与理论分析有时大相径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相继实行了以进口替代为特征的工业化政策，这显然是有某些共同的基础的。进口替代政策的主要依据是贸易条件恶化论和保护幼小工业论。前者是说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产品是农产品和矿产品，这些产品的贸易条件在长期内将恶化，因而必须迅速实现工业化。而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学习和发育的过程。在制造业建立之初，缺少市场信息和渠道，尚未建立起企业信誉，技术和操作都不够熟练，往往会出现亏损，更不可能与强大的国外竞争者竞争。因而必须防止国外同类产品的侵入，留出国内市场，直到新生的工业壮大起来，这就是保护幼小工业的思想。

或许是由于理论上的粗糙，或许是由于操作上的失误，更可

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实行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就并不理想。相对比地，实行了以自由贸易为特征的亚洲四小，取得了难得的良性的高速增长，引起越来越多的兴趣。高速增长的四小尽管有着不同的资源和环境，其共同的特点是出口的持续增长伴随着经济增长。很显然，那种把经济增长全部归因于其地域之小或某国援助的说法，在学术研究中是难有苟同的。那么，建立在出口导向政策上的出口扩张，是怎样推动了经济增长进程呢？当然，问题可能还有另外的一面，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和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高，经济增长必然会有利于出口增长，正象许多人对日本高速增长的认识一样。日本战后恢复之后，也经过了相当长的出口和经济都高速增长的时期。但相比较而言，四小龙的增长更是由出口推动的，而不是相反。

三、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一部纷繁复杂的百科全书，对这一过程的描述自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经济结构的转换和对外开放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很明显的，但是对其中机理的研究还不深入。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资源配置的改善只能一次性地提高经济的产出水平，却并没有长期的持续的作用。而近年来对出口导向国家的研究表明，当这些国家取消了一些配额、补贴等，听任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后，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持续了很久。这就出现了资源配置的改善究竟有没有增长效应的问题。某些经济学家为了维护理论的纯洁性，一再强调执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之所以取得长期增长，并不是改进资源配置的功劳，而是由于开放环境下的激烈竞争刺激了企业的创新机制，从而获得了增长效应。这固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并不能否认资源配置改善而引起的经济环境的好转所带来的效益。我们早已知道，

资源配置调整的真实过程并不象理论假定的那么简单，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结构刚性和我们在改革中一再领教了的结构刚性，都有着根深蒂固的体制根源，都与社会的经济组织结构密切相关。研究经济增长，并努力使之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所启发，就必须深入认识经济增长过程，并指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组织因素。

第 3 章 经济增长与工业组织演变的理论联系

3.1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

我们已经看到，占主流地位的增长理论把长期经济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增长，经济政策在这样的系统内是无能为力的。而经济增长的实际过程显示出各国间长期存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异，并显示出资源配置改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理论上给出新的增长模型来解释这种现象。内生经济增长(endogenous growth)理论就是这种背景下产生的①，其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速度是由经济系统之内的各个变量的互相作用决定的，而不是由外生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决定。所以经济增长的状况，在一定范围内取决于经济内部组织和激励机制，以及经济政策的成功与否。大体说来，有三种可能性能够实现经济系统的持续增长而不必依赖关于外生技术进步的假定：(1)如果生产过程对于可再生要素是收益递增的，则可以靠不断投入要素实现持续增长，但在这种假定下将会导致垄断

① 所谓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并不是一种达成共识的理论，而是包含了多种相关的看法，这些看法的共同之处是认为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系统自我推动的，但他们对实现内生增长的因素却有不同的强调。

的出现。(2)即使生产是收益不变的,(这样就可与竞争均衡相容),但生产过程中存在外在经济,那么人均产出可显示递增或不变。(3)如果人均产出对于特定的可再生资源是已有存量的线性函数。(例如人力资本的累积可以认为是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这样三个方面:人力资本、经济(技术)外在性(externality)和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一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是六十年代以来由舒尔茨(T. W. Schultz)和贝克尔(G. Baker)等人建立起来的。其思想十分清楚,除去基本的劳动能力之外,人可以有提高的劳动能力。这就依靠以投资的形式,加强劳动力的健康素质、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过去,用于接受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的支出往往被认为是消费支出,人力资本理论则指出这是一种和投资于物质建设一样的投资,这种投资对下一期的劳动力产出效果是极其重要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更是如此。人力资本理论创立之后把主要的研究集中在教育投资的收益上。人力资本和技术的概念既不相同又有密切联系。技术往往指的是设计、方案和程序等软件内容,而人力资本则是产生技术和使用技术的条件。传统意义上的技术进步一般指的是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取得的突破,带有随机性和偶然性,而人力资本的提高则是经济系统内的可控变量,只要把资金投进去,一定能获得人力资本的增长。

人力资本应用于增长是很正常的,特别是当人们进行经济增长的国际间比较研究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各国的劳动力的实

际能力不能以劳动力人数和劳动时间来计算的问题。例如，安妮·克鲁格(A.O. Krueger)曾粗略地估计，在50年代末，一个美国劳动力的有效劳动能力平均是印度人的5倍，即一个普通的印度劳动力如果流入美国，只能获得美国劳动力平均收入的1/5①。这一估计是否准确我们不去追究，至少我们承认，用于人的投资可以大大地提高人的生产能力。如果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到此为止，那么，这一理论基本上与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相容的，只不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保证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而已。人力资本而临和物质资本一样的问题，这就是人力资本是否也将是收益递减的。如果人力资本也是收益递减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内会有增长减速的趋势，除非技术进步依旧外生。所以近来的一些讨论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方式具有一定的外在性。(要明确外在性 externality 与外生 endogenous 的区别，外生是指某变量是由系统之外的因素决定的，对本系统是给定的常数。外在性则是说这个变量的变化不仅影响其自身，还同时影响了其它变量)合理预期学派的头号人物卢卡斯(J.R. Lucas)指出，每一个人力资本的提高都直接引起了产出的提高，同时也都引起了社会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社会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社会平均的运作效率，总体效率的提高又使每个企业和个人从中受益。在卢卡斯给出的模型中，生产函数写成 $Q=A\cdot K\cdot L\cdot ha=A\cdot K\cdot(u\cdot h\cdot N)\cdot ha$，式中：N 是劳动力人数，h 是人力资本水平，u 是利用系数，因而 $u\cdot h\cdot N$ 成为有效劳动投人，而 ha 是社会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②。解这样的函数，

---

① 见克鲁格："Factor Endowments and Per Capital Income Differences Among Countries".

② 见卢卡斯："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的假设。如果假定人力资本仅由投资决定，则此问题与外生技术进步问题在本质上是同一问题。但许多人认为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是已有人力资本存量的函数〔例如 $h=h^{\delta}G(1-u)$〕，则竞争均衡的增长路径与最优增长路径发生偏离。如果人力资本真的存在这样的外在性，则不必假定外生技术进步，经济系统亦能保持经济增长。

二　技术外在性

人力资本的外在性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相比之下，技术的外在性似乎更为可信。这一论点的主要倡导人保罗·罗默(Romer Paul)在提交1990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的论文中举例说明了技术的外在性[1]。据《华尔街杂志》报道，杜邦公司的两个前雇员因勒索被起诉，他们威胁说要把杜邦公司的一项核心生产技术泄露出去。同样地，英特尔公司的一名雇员也因使用在公司里得到的秘密而成为被告。这类事件有两个特点，一是资金数额巨大，那两个勒索者向杜邦公司开价1千万美元。第二个特点是，这种"贼"被指控偷盗，但是杜邦公司并没有被剥夺任何东西，仍然可以照常生产。这种情况证明，在现实的生产中有些经济价值很大的投入，可以被同时用于许多生产中。尽管最初研制这一技术可能耗费巨资，但如果把成果推广到其它地方去用，并不需要花费什么成本。这类投入品具有非独占性(nonrival，一般有译非竞争性，这里译成非独占性较好)。

一般普通商品具有独占性和排它性(rivalry and exclud-

1　见罗默："Are Nonconvexitie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Growth".

ability)。独占性是一种自然属性，由商品的性质所决定。例如一件服装，当某人使用时必穿在身上，不可能同时为另一个人使用。排它性则由技术和法律制度共同构成。一个商品有时尽管在技术上可能被多人同时使用，但其所有者能够依照法律限制其它人使用，那么这类商品就具有排它性，例如计算机软件。上面例子中的关键技术就是不具有独享性而具有排它性的商品。当然，技术的概念有时和设备联系在一起，易产生理解上的模糊。如果把技术和设备分离开来，仅指"将原材料组合、作用而成产品的指导和设计思想"，那么，这种设计一经形成便可以无成本地反复应用。在技术的创造过程中，有一部分是通过政府资助科研部门面获得的，这部分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西方国家，技术更主要地来自于各个企业为了经济利益而研究和开发(R&D)的技术。技术的这种非独占性的本质就决定了其外在经济性。假定将投入分为独占和非独占性两类，R 为独占性投入，N 为非独占性投入。显见 $F(\lambda R,\lambda N)>F(\lambda R,N)=\lambda F(R,N)$，即投入增加相同的倍数，产出的增加大于这个倍数，也就是存在着由外在性导致的收益递增。相比之下，人力资本则不具有这样的性质。人力资本可创造和改进技术，但这种能力是依附于个人的。一个有贡献的科学家诞生之后，并不能同时用于多种活动。再培养一个同等水平的人才仍然要花费几乎同样的代价。当然会由于经验的积累而走些捷径，但其程度是有限的。技术的非独占性的本质在现实经济中究竟是不是真的重要，就取决于技术是否具有扩散性。如果技术能完全排它，则也就没有什么外在性，但如果考虑到任何技术都是基础理论与具体技术的结合，那么至少在基础理论上是非排它的，技术的改进在对本企业的生产起作用的同时，也为公共的知识积累作出贡献，从而使以后的

研究节省成本,这就有了外在性。

三、最早给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是阿罗(K. Arrow)的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模型。他首先指出,在增长模型中把一个相当大的量归因于外生的技术进步是很遗憾的,他的目的就是要使生产率的提高能够用经济系统内的量来表示。阿罗认为知识的进展是通过学习的过程获得的。而学习又来自实践经验。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人们通过演奏而成为演奏家,通过参与建设而成为建筑师,人们学会的一切都是通过实际去做而学到的。要把学习的过程写入生产函数,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选择代表"经验"的变量,二是决定这一变量怎样进入生产函数。阿罗在模型中取"累积总投资"作为代表"经验"的变量。同时假定技术变化是完全体现在新资本品中的。由于阿罗写出的是个总量模型,知识积累尽管内在化了,但相当于是公共产品,实际上暗含了技术完全扩散的假定。这就使得阿罗对经济增长的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学习过程、短期与长期的关系等)因其形式的简单而被忽略。同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舒尔茨,把收益递增与专业化结合起来。开拓了我们的认识[①]。在上一章我们得知,收益递增是与规模经济十分相似的概念。收益递增可以来自于固定投入的不可分性,也可以来自于经济外在性,它反映的是生产率随产量增加而上升的过程。人们关于收益递增与专业化的认识是这样的,市场规模决定分工程度,分工决定生产率,因而生产率受制于市场规模。分工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专业化人力资本和专业化学习过程。专业化

---

① 见舒尔茨:《为实现收益递增进行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载《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

的学习过程不再需要对技术完全扩散的假定，可以比较现实地描述增长过程。

近年来，关于专业化与收益递增的讨论是与组织理论和贸易理论密切联系的。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复杂，企业之间的交易必然会加大。斯蒂格勒(stigler)在50年代曾预计，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将进一步横向专业化，例如研究和开发活动将会逐渐从企业中脱离出来，生产的垂直联系上也会进一步分解，矿山会从冶金企业中独立出来等等，出现反垂直一体化的趋势。但是他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垂直一体化并未消弱。这正应验了交易成本学派对企业性质的分析，如果专业化成不同的企业，则这些企业之间的往来就必须依靠经济契约的方式。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性和契约的不可完全预见性，就面临着一定的风险。组织成一个企业则可以用直接控制的方式协调生产的全过程，这样或许成本会更小。企业家就要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和比较。类似的一个问题是企业的规模经济，在达到最佳规模之前，加大产量都会是收益递增的。但是，企业垂直合并也好，扩大水平规模也好，都不会无限制的发展。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成本上升很快，当一个企业过大的时候，就使得管理层次太多、机构运转不灵，出现经营上的“官僚主义”现象，难以实现最优的或较优的决策，这是近年来美国管理理论中十分热门的话题。

3.2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讨论

将引起内生经济的诸因素写成形式化的模型，有助于清楚地分析经济增长的路径。经济模型是对经济现实的抽象，不可能

精细到包含所有因素，但又必须包含影响经济本质的重要因素。因而，比较可取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既不是总量模型也不是过细的分量模型，而应该是恰好能够反映经济增长性质而又变量较少的模型。

完整的增长理论模型应该包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需求因素决定资源的利用强度。需求增长又可分为国内需求和国际需求两部分，其基本来源是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对国内需求来说，又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本文着重于从供给角度研究经济增长，因而对需求因素不多加考虑。

长期的供给增长来源于这样四部分：(1)资源投入量的增长，包括劳动力增长、资本增长和人力资本增长；(2)新技术的不断产生。这里的新技术指的是软件概念上的新设计、新思想。而为实现新技术所投入的资金和技术设备应看作资本的增加；(3)学习过程带来的效率提高。指随着从事某项活动时间的延长和经验的积累而带来的成本下降；(4)工业组织变化带来的效率提高，包括专业化、联合化和企业重组，使生产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这四个来源中，前两个是一般增长模型都要包括的。后两个则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描述经济增长的长期性质，关键在于供给函数的具体形式的设定。实际上，即使是今天广泛使用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本质也是一种假定。对上述四因素的供给函数，我们可以抽象地写成：Q＝Q(R，T，L，O)。R、T、L、O 分别代表要素、技术、学习水平和组织水平。要素投入 R 的变化决定于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力增长，而在长期的供给分析中，投资又是产出的函数。这样，决定 R 变化的只有外生的劳动力增长率或人口增长率。技术水平 T 的变化具有外在经济性，可假定为前期

技术水平的函数。也就是说，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越高，则技术进步的能力越强，即 T=f(T)。学习过程 L 的最简单假定是，L 是时间 t 的函数。由于学习过程是由具体生产活动的经验决定的，所以，象在阿罗模型中那样，以累积总产量代表经验更准确一些。组织水平 O 的变化比较难以描述，仅能一般性认为与产出规模有关。产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实现专业化或联合化组织。

按照增长理论模型的一般要求，对任何设定的供给函数形式，必须求出其均衡增长解，以观察其长期变化是否收敛于一个可信的区间内。由于内生增长因素中存在收益递增和经济外在性，所以最优增长路径与均衡增长路径发生背离，在数学求解上也比较复杂。特别是象对专业化的描述这类问题，总量描述是不够的，而分量怎样划分是个很费考虑的问题。至今看到的内生增长模型中，比较令人满意的是罗默(Paul Romer)于 90 年给出的一个模型①。

模型假定有四种投入：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技术。假定经济中有三种类型的部门：(1)研究部门；(2)中间产品部门；(3)最终产品部门。

(1) 最终产出 Y 是劳动力、物质资本和用于最终产品生产的人力资本 H_y 的函数。与一般生产函数不同的是，这里的资本分解为无数的用于生产的资本品，记为 $X=\{X_i\}_{i=1}^{\infty}$，作为最终产出生产的投入。Xi 第 i 种资本品。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写成：

$$Y(H_y,X,L)=H_y^{\alpha}L^{\beta}\sum_{i=1}^{\infty}X_i^{1-\alpha-\beta}$$

① 见罗默："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一般的生产函数认为不同种资本间具有完全替代性，而这里假定每种特定的资本品对产出具有单独的作用。

(2) 中间产品的生产指对资本品的生产。把中间品的生产过程看成一个黑箱，输入是最终产品，输出是资本品。中间产品的生产企业必须购买或自行设计一项技术，有了这项技术就可以将单位的最终产品投入转化为1单位的资本品产出。由于各种资本互不相同，为了成本最小，企业i是资本品i的唯一出售者，故而对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K(t)=Y(t)-C(t)$$

$$K=\eta\sum_{i=1}^{\infty}Xi$$

(3) 研究部门的投入是人力资本 H_a 和已有的知识存量，产出是新设计、新技术。第j种技术的产出为 δHjAj，其中δ为生产率系数。若考虑知识是共享的，则技术j的产出为 δHjA。将所有研究加起来则有 $\dot{A}=\delta H_aA$，H_a 为从事研究的总人力资本。关于产出的这种线性假定纯粹是为了方便。至此我们看到，在这个模型中，以人力资本为载体的知识有两种方式进入生产过程：新设计导致新产品的生产，同时增加知识存量，使设计部门的生产率上升。总人力资本投入为设计部门使用的人力资本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使用的人力资本之和，$H=H_y+H_a$。

取代表性的最终产品生产企业，面对所有资本品 X(i) 和对应的价格 P(i)，选择利润最大化。

$$\max\int_0^{\infty}[H_y^{\alpha}L^{\beta}X(i)^{1-\alpha-\beta}-P(i)X(i)]di$$

由此可求出对资本品的总需求：

$$P(i)=(1-\alpha-\beta)H_y^{\alpha}L^{\beta}X(i)^{-\alpha-\beta}$$

对中间产品生产企业而言，上式作为给定的需求曲线，其利

润最大化：

$$\max_{x}[P(x)X-r\eta X]=$$

$$\max[(1-\alpha-\beta)H_y^{\alpha}L^{\beta}X^{1-\alpha-\beta}-r\eta X]$$

r 为资本收益。

选择技术的决策依赖于技术的价格 P_a。因为技术是通过竞争招标获得的，所以 P_a 等于净利润的现值：

$$\int_t^{\infty}e^{-\int_t^{\tau}r(s)ds}\pi(\tau)d\tau=P_a(t)$$

对 t 微分：

$\pi(t)=r(t)\cdot P_a$。即在任何时点上，收益超过边际成本部分必须足以覆盖最初对设计投资的利息成本。

这个模型的稳定增长解为：

$$g=\dot{C}/C=\dot{Y}/Y=\dot{K}/K=\dot{A}/A=\delta H-r\alpha/(1-\alpha-\beta)(\alpha+\beta)$$

从这个稳定增长解我们看到，增长率随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而上升，随利息率的上升而下降。这个模型引入了知识的外在性，描述了专业化对增长的影响，把资本品的种类作为描述专业化的变量是很有启发性的。这个模型没有描述学习过程。由于学习过程是特定于具体生产过程的，而不同部门的学习潜力又相距甚远，给出一般性的学习过程的描述是十分困难的。

内生增长模型的进一步深入将有助于解释增长率在各国间的差异。各国间的比较优势导致生产的相对专业化，而相对专业化带来的收益递增又是比较利益的重要成因。但由于各项生产活动的技术潜力不同，学习效应不同。那些专业化高于学习潜力的生产活动的国家，就易于获得持久的高增长率。

3.3 增长理论与工业组织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的提出是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不完善。至于各国战后经济增长的记录是否真与索洛增长方程难以相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计量经济学家验证。怀疑内生增长理论的学者认为，当假定不同的生产函数形式时，考虑技术进步是一个随机过程，则索洛模型可以与战后的增长统计相容，并不需要引入外在性和收益递增[1]。本文讨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并不是否认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恰恰相反，本文正是要讨论如何有效地发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否能描述经济增长的大致轮廓，这种理论的过于简化和关于均衡的假定都难以为我们所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下述方面是有启发的。

第一，内生技术进步的思想强调技术进步是一个一般均衡过程，是由经济系统内的变量在一定的机制引导下而实现的，这有助于我们研究影响技术进步的因素。为了实现技术进步而从事的研究和开发活动是有层次的。基础研究面临的是发现原理的不确定性，一般是由政府资助的，其结果具有公开性。应用于商业性质的开发，目的在于推出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或降低产品成本，多与具体的设备、环境和费用相联系，宜于由企业来进行。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追求的是最大化的利润，在不存在经济外在性、规模经济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可以证明自由竞争的市

---

[1] 见 J. Benhabib and B. Jovanovic, "Externalities and Growth Accounting".

场机制可以引导企业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是同样的机制是否也能引导企业的创新活动达到最佳状态呢？或者说怎样的安排才能实现创新的作用呢？对资源配置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有过许多研究，但比较肯定的结果是技术进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例如技术进步增加了创新企业的市场力，提高了进入壁垒等。资源配置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则没有可靠的答案。一位学者曾戏称技术进步象天气一样，能够影响资源配置，却不受其它经济因素影响。坚持认为带有垄断性的市场结构有利于创新过程的代表人物是熊彼特。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是新的产品、过程和工业组织取代旧的过程，而创新所能获得的超额利润是这一过程的动力。创新所取得的垄断地位是短暂的，因为不断有更新的创新产生。然而熊彼特争辩道，创新需要托管相当规模的资源并获得可观的收益。而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其它企业对新产品和新过程的迅速模仿将会减小创新企业的收益，从而减小创新的动力。面对完全竞争而没有创新的市场和不完全竞争而有创新的市场，熊彼特选择后者。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不同于教科书上刻划的那样，起作用的并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和新的供给来源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在实际中起作用，而且是一种现实的威胁。企业家感到处于竞争位置，即使他是领先的。曾经名噪一时的加尔布雷斯(J. K. Galbraith)则认为，只有垄断利润的引诱还是不够的。他认为当代的技术发明已经不同于过去，需要大量的科学家、工程师，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设备，只有大企业才有这种实力。也有人提出只有大企业才能同时从事多项研究，抵抗技术不确定性的冲击。于是就要问，具有垄断性的大企业是否有利于创新。数十年来，为了这个论点做过许多的经验研究。现实资料并没有支持

上述看法。从技术发明活动的效率(以开发活动的投入——产出效果来衡量)和创新的努力程度(以创新密度指数衡量)上,都没有统计规律表明大企业占有优势。用以集中度衡量的市场结构分析技术进步,也没有肯定的答案。当然,现有测度开发活动投入和产出的量也只能从现成数据中收集,也有不尽准确的地方。可见,如何分析资源配置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仍有许多研究可做。国内已有许多学者在从事此类研究,本文则仅仅是提到这个问题,而不拟深入讨论。

第二,除去研究和开发活动之外,确实存在着其它因素影响经济增长。这些因素并不都由新的创造决定,而可能来自经济系统自身的演变和调整。例如,经验的作用其实是早已被证实了的。在一个产业中,假定设备技术条件相似,一般是历史较长的企业效率更高。有时一个新企业要进入某一领域是很困难的,除非这个新企业具有突破性的创新。企业是如此,宏观上也是如此。某一产业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运转之后,其各种配套关系都接近协调,发现了的配置失衡可以用新增投资来弥补。这就是日常所说的"挖掘潜力",是容易理解的。从理论的观点看,这是起因于学习成本。在内生增长理论的讨论中,常见的是三种形式,即:(1)把生产率与总投资或总产出相关联,如阿罗模型;(2)把增长与外在经济性相联系,如卢卡斯模型;(3)把增长与专业化经济联系起来,如舒尔茨理论。仔细考察其机理都源于学习过程。专业化经济是明显的学习过程,通过专业化,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需要学习的内容大大地集中在一个领域内,这就降低了学习成本,加强了学习深度。外在经济性也是学习过程的一个方面。经济中有意义的学习过程,并非是要学懂弄通某一原理,而是从不会经营某一产品到会经营(生产)这一产品。技术的外在

性就大大节省了模仿者的学习成本。把生产率与总投资联系起来，一是由于"熟能生巧"的自然学习过程，二是由于新增投资中包含了新的知识，这样新增投资就可以加速人们对新生产过程的学习。很显然，经济中不可能也不必要事事通过自己创新来实现。加速学习过程，减少学习成本对经济增长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学习是依赖于经济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的，所以资源配置和结构对学习过程有很大的影响。学习成本的下降往往会引起组织成本的上升，例如过度专业化引起交易过程的复杂，组织交易的成本上升。技术的大量扩散会降低学习成本，却使企业失去竞争激励。学习成本与组织成本之间的权衡是一个重要的组织问题；特别是在存在某些体制刚性的时候，往往有同时降低学习成本和组织成本的机会，这必将大大地有利于经济增长。

承认学习过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就暗含了这样两个敏感问题。一是由于学习必然使市场结构中出现一定的垄断力和进入壁垒，这将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二是专业化经济如果在各个部门中的潜力不同，那么以比较成本为标准的贸易结构和以最佳增长为标准的贸易结构就会出现不同，怎样看待和协调这种不同就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

第三，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可以发现长期变量与短期变量的联系，这是十分有意义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对短期变量的忽视使它难以研究现实的经济政策和控制。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由于学习过程的存在，而投资中包含了知识，因而象投资这样的短期变量就有了增长意义。经验也告诉我们，投资具有增长作用。且不说技术创新一般是资金体现型的，要以投资作保证，仅就投资配置的调整来说，在任何时点上经济增长都和重置资源

联系在一起，投资的增加会不断创造出新的增长机会。从实践中更容易体会，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一次性的投资都有长期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我们能够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所要求的条件。

总之，现实经济中存在着内生的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与工业组织有密切关系。内生增长理论建立了经济增长与工业组织之间的理论联系。下面我们将要做的是，把增长过程与工业组织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这将丰富增长理论的内容，深入我们对增长本质的认识。

第 4 章 经济增长与工业组织的实证考察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1]

我们已经一般性地认识到，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工业组织的改进。按照生产力优化的原则，在技术和其它经济环境的动态变化中，不断地创造出推动和适应经济增长的工业组织形式和结构，是经济增长过程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在完成了抽象的理论讨论之后，从本章起，我们转向对经济增长实际过程的分析，并试图从中发掘出对我们有启发的认识和规律。由于经济增长过程的极其复杂，我们首先讨论以日本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经历和其中有代表性的工业组织特点，然后以南朝鲜为例，分析亚洲新兴工业国和地区高速增长中的不同的特色，最后对经济增长与组织演变的动态关系作出概括性论述。

---

① 见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

4.1 实例之一：美国和日本经济兴起过程中的工业组织

持续的经济增长预示着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追求高速增长是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共同意愿。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指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很多，特别是在短期内，宏观政策上的波动会引起经济状况的很大变化。因而考虑工业组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应该剔除掉其它因素的影响，这在现实经济中是难以做到的。所以，我们只能从经济增长和工业组织的长期趋势上去分析。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进程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到50年代初期，美国超过了其它国家成为头号经济强国。在此期间，钢铁、汽车、化工、机械等工业是经济增长的支柱。50年代之后是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阶段。西方主要国家自50年代开始，经历了二十余年的经济增长黄金时代。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美国，出现了群雄并起的局面。在这个阶段中，重化工业趋于成熟，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日益重要。七十年代以后，以石油危机为导火索，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慢，而一些传统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从60年代开始，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有希望在不长的时期内接近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

如表4—1所示，1950年之前，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居西方发达国家之首。1950年之后，日本的增长率远高于其它国家。从时间段上看，1913至1950期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因而各国的增长率均比前期下降。50—73年

各国的增长率都很高，73 年之后显著下降。很明显，美国和日本分别代表了发达国家在五十年代之前和之后的最高经济增长率。我们以这两个国家为例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组织变化的作用。

表 4—1　主要发达国家经济(GDP)增长率的变动情况

	1870—1913 年	1913-50 年	1950—73 年	1973—84 年	1984—89 年
美国	4.2	2.8	3.7	2.3	3.5
日本	2.5	2.2	9.4	3.8	4.3
西德	2.8	1.3	5.9	1.7	2.8
法国	1.7	1.1	5.1	2.2	2.9
英国	1.9	1.3	3.0	1.1	3.8

资料来源：1984 年之前数据取自 Maddison p. 650[1]。
(1984—89 年数据系笔者据世界银行《世界表 1991》计算，由于来源不同，不可与 1984 年之前数据直接比较。其中西德数字为 GNP。)

现代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估计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 4—2 给出了一种对美国和日本不同时段上的增长因素分析。正如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指出的，工业组织演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是从生产力的角度进行的，而工业组织的作用是适应和推动这些因素充分发挥作用。从表 4—2 看到，无论在美国或日本的高速增长时期，增长的来源主要是资本投入的增长、结构转换，以及劳动力质量的提高等等。而资本的不断投入必须以不断创造出可供投资的利润为条件，投资和结构转换都需要适宜的工业组织为媒介。其二，工业组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会通过内生

---

① 此文综合了丹尼森、肯得里克、阿伯拉莫维兹、乔根森等多项增长核算的成果，是近年内增长核算方面的权威性的论文。

增长因素直接起作用。表4—2中，日、美两国都有一定比例的因素没有得到解释，其中列出的日本的赶超效应也只是一种提法。在这些未解释的因素中，就有内生经济增长因素的作用。工业组织形式及其演变关系到内生因素的发挥。但由于内生经济增长因素在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的时期，作用的变化很大，因而难以给出总量上的估计。在经济增长的过程的实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组织变化的作用。

表4—2 美国、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分解(数字为年度增长率)

	美国		日本	
	1913—1950年	1950—1973年	1913—1950年	1950—1973年
国内生产总值	2.78	3.72	2.24	9.37
劳动数量	0.25	0.85	0.36	1.09
劳动质量	0.35	0.29	0.61	0.52
隐性劳动	0	0	−0.56	0.90
居民用资本	0.13	0.23	0.01	0.43
非居民用资本	0.41	0.79	0.77	2.06
资本质量	0.45	0.51	0.45	0.58
生产能力使用率	0	0	−0.24	0.39
赶超效应	0	0	0	1.02
结构效应	0.29	0.12	0.62	1.22
国际贸易作用	0.01	0.05	0.02	0.26
规模经济	0.08	0.11	0.07	0.28
合计	1.97	2.91	2.11	8.73
未解释剩余	0.81	0.81	0.13	0.64

资料来源：Maddison p. 679①。

① 这种划分方式是丹尼森式的，兼有新古典和凯恩斯的理论因素。而剑桥派的罗宾逊坚持认为资本是不可测度的。

一 美国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工业组织变化

1. 早期的基本历史过程

美国的经济和工业组织形式的革命性变化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以来。"直到1850年，绝大多数的美国一般制造业是在工场和家庭里通过家庭劳动或是通过雇用学徒的私营店主而进行的"[①]。从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的制造业获得了高速发展。1850年至1900年，美国人口增长3倍，农产品也增长3倍，而制造业增长了11倍[②]。制造业的迅速增长的原因，是资源的不断开发、劳动力的流入和技术的进步。美国拥有无可比拟的天然资源，有大量的牲畜、棉花，以及石油、铁、煤等多种矿产资源。在美国最初的制造业产品中，几乎都是与这些资源相关的。面粉加工，肉类加工、木材加工和皮革加工在1860年时是制造品的主要部门。到1914年，钢铁生产和车辆制造已经跻身于主要的部门之列。

制造业的发展是新的工业组织形式产生的基本动力和来源。制造业的兴起对交通运输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求，而运输的发展又推动了现代企业的形成。与传统的手工业相比，统一生产的工厂制度是工业组织形式的一次跃进，这一跃进是在以煤、电为基础的工业革命中在欧洲实现的。工厂制度有利于分工，因而极大地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最初的工厂规模有限，一般由所有

---

① 《第十二届国情调查》，引自福克纳下卷，37页。

② 福克纳，38页。

者直接控制和管理。要完成社会最终产品的生产，就要经由市场交换，通过多个工厂来完成。从工厂制度到现代公司制度，是工业组织上的又一次飞跃。现代公司制度以大批量生产和销售为特征，由职业化的经理人员进行控制，有力地降低了制造业生产成本，提高了效率。自从本世纪初，现代企业制度出现以来，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产品，而且改变了人们对制造过程的观念。尽管功能独立的小厂在发达国家仍大量存在，但是集中生产的大生产方式已经统治了经济生活的主要方面，多数小企业已被纳入现代公司的配套生产中。

美国的铁路公司是最早的现代企业的雏型。动力和机械技术上的进步使铁路的迅速和全天候的运输得以实现，但安全可靠的调度和各种设备和管理，需要很强的专业化组织能力。而建造铁路所需要的资本又极其庞大，最初的铁路靠发行公债筹集资金，很快就转向了铁路股票的发行。众多的持股人无法亲自经营铁路，而管理工作又十分复杂，只有经过特别训练的人才能胜任，于是只持有少量股票或完全不持有股票的职业经理人员，开始领导经营管理工作，所有权和经营权出现分离。

运输和通讯的发展使美国国内市场扩展，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使大量生产成为可能。大量生产指的是，经由技术和组织的创新而创造高度的通过能力，使得少量的劳动力就能生产大量的产品。机器和设备不单是替代手工作业，同时使多个生产阶段的生产速度都比分散于不同工厂时要高[1]。大量生产的经济性，从本质上看来源于速度而不是规模。只有当规模的扩大与生产速度相关时，两者才是一致的。

---

[1] 参见钱德勒，279页。

大量生产先是出现在石油加工中，而后扩散到机械制造中。由于产量的迅速扩大，加上某些产品销售中所需要的特殊服务，使得大量生产又与大量的销售结合起来。这样，制造商就有机会通过有效地协调生产和销售过程，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考察上个世纪末的美国企业组织，制造业公司的大型化是个显著的特征。一些企业通过内部增设供应和销售机构实现了生产与销售的纵向结合，另一些企业则通过横向兼并扩大了规模。到本世纪初美国工业企业已具备了现代企业的基本形式。

2. 工业组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上述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经济增长与工业组织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工业组织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工业组织应该具有的基本的生产力准则，必须具体考察工业组织对产出能力的影响。我们以美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汽车制造业是本世纪初期美国工业主导产业。汽车工业的发展为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全面的推动作用。汽车工业诞生之初造价昂贵，并没有显示出作为大众消费品的前景。福特汽车公司经过企业组织的调整大大地降低了成本，其意义是重大的。1908 年开始生产的 T 型车，起初制造一辆车的时间为 12.5 小时。同样的车，12 年之后每 1 分钟一辆，又过了五年，即 1925 年，每 10 秒钟产出一辆(多条生产线同时生产，年产 200 多万辆)。每辆车的价格也从 780 美元降到 360 美元。仅以 360 美元的价格，福特公司共出售了 73 万辆 T 型车[1]。生产效率上如此

---

[1] 参见哈伯斯塔姆，74 页。

重大的差异，几乎全部来自组织的效率。在福特的生产组织上兼有标准化和专业化的优势，又有系列化带来的速度。

据记载，1915年在福特公司的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的一条新的装配线上，共有7000多工人。其中许多人是从农村甚至其它国家，抱着摆脱贫困、寻求新机会的渴望涌入底特律的。这条配装线上讲着50多种语言，其中一些人几乎不懂英语。但是，依靠专业化和标准化，生产竟可以正常进行，这就是专业化带来的效率①。

同时，福特公司的垂直一体化也是彻底的，原料和运输都纳入了统一的管理。该公司自己建立了钢铁厂、玻璃厂，并在巴西买有全资的橡胶厂。垂直一体化的结果是原材料的成本得以控制，并使整个生产流程通过统一的控制而大大加快。据记载，星期一早晨，载着铁矿石的驳船驶入内河码头，矿石进入高炉。星期二铁水浇入铸模，当天晚上变成了发动机。原材料经过大约33小时就成了现金②。尽管在当今垂直一体化的程度并非越高越好，但在那时市场的协调还不成熟和不可靠的情况下，福特的组织创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从市场结构上看，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雇用13000人，生产267720辆车，而其余299家公司共雇用66350人，只生产286770辆车。福特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从1908年的9.4%上升到1914年的48%。在这里，市场结构是竞争和创新的结果，并不能对竞争产生多大的影响。只要对手还在，竞争就将持续下去。此后福特汽车公司被通用汽车公司超过也是同样的道理。

---

① 参见 Womack et al.

② 参见哈伯斯塔姆，75页。

汽车成本的大幅度下降和生产率的提高，使得汽车工人的工资能显著地高于其它产业（福特首先实行了每天5美元工资），这就使得汽车的生产为自己创造了有效的需求，从而使美国的汽车工业取得了国际领先的地位，并促进了经济繁荣。当然，作为资本家的企业，福特公司内存在着种种劣迹。我们要说明的仅仅是，福特公司的最初的组织创新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专业化和一体化的同时实现必然要求企业的规模是巨大的。当美国的汽车生产集中于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巨头之后，任何一个巨头的懈怠和疏忽都是后果严重的。近年来，美国汽车厂商在与日本同行的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

总之，美国经济兴起过程中的最明显的组织变化是企业的大型化，以及相应的大型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企业大型化的过程中，企业合并起着重要作用，至今已出现了多次合并高潮。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合并多是以生产相同产品的同类企业的“横合并”为特征的。其原因是，上世纪的后期，工业产量的急剧上升使产品价格迅速下降。全部商品的批发价格指数从1869年的151降至1886年的82。激烈的竞争使各厂商都寻求建立同业联盟，以缩减生产维持价格。于是各行业的卡特尔和托拉斯相继出现，企图操纵市场谋取利润。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垄断法，使这些横向垄断组织成为非法。这样同类企业之间便出现了实质性合并。第二次兼并高潮发生于经济稳定的二十年代，是以垂直合并为特征的。把互相联系的工序和工艺过程纵向组织起来，可以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流通费用，有利于组织生产和加速资金周转。例如福特汽车公司通过垂直合并，形成了集生产焦炭、生铁、钢材、铸件、锻造、汽车零部件装配以及运输、销

售和金融等多环节的统一联合企业。第三次合并高潮发生在60年代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迅速增长时期，是以混合兼并为特征，以实现多样化生产为目的的。80年代以来的企业合并，情况更为复杂，对其评价亦是众说纷纭。据报，近年来的合并有些是通过购买所有权而直接掌握某项技术为动机的。

合并是组织调整的一种形式，但合并并非总是对经济增长有利。当合并是出于垄断和投机的目的时，合并的效果就是有碍于增长的。因而，绝不是现实中所出现的任何组织变化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对于工业组织随经济增长过程的变化轨迹，必须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区间内进行观察。美国经济是由众多小企业的自由竞争走向带有一定垄断性的管理协调的。在市场集中的过程中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

二 日本战后的高速增长与工业组织

从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7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的经济普遍陷于萧条，日本的增长率在发达国家的范围内仍是最高的。据世界银行《世界表1991》统计，1989年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3810现价美元，超过美国21000美元的水平。

虽然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也是在上个世纪开始的，但使其从落后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的实质性转变仍是从战后开始的。从工业组织的特点上看，日本经济的集中度明显超过了美国。战前，日本经济的主要部分是由财阀控制的。财阀经济妨碍竞争、独占剩余并与军国主义有关，不利于经济的正常发展。战后，占领军强制解散了财阀，制订了垄断禁止法，从而促进了竞争和中小企

业的发展。

高速增长的日本，在工业组织上的最大特点就是企业集团的存在。日本的企业集团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原财阀的系列企业，在企业集团的旗帜下重新集合起来，包括三菱、三井和住友三大集团。第二类是以大银行为龙头集聚起来的新兴集团，包括芙蓉、第一劝银和三和集团。这两类合计的六大集团，1980 年共有公司 179 家，除去其中的金融和保险业的企业余 155 家，占全日本各产业（金融、保险业除外）总资产的 15.34%，纯利润的 12.84%，从业人员的 4.91%[1]，可见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很大。第三类集团是以大的制造业企业为核心的独立系企业集团，主要是日立、东芝、松下、新日铁、丰田、日产等。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开始于 1956 年，是以大量的民间设备投资推动的，也就是供给推动型的。这种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企业集团的发展和集团控制的投资活动的加强。

战后日本的资本积累与其它国家不同。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原联邦德国，企业资金的筹集都以内部资金（折旧加利润留成）为主，辅之以股票和公司债券。银行贷款所占比例一般都不大。战后日本企业却是以银行借款为筹资的主要方式。这种情况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各自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以及政府政策造成的相对境况有关，这里不去深究。由于企业对银行的资金依赖，极大地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地位，而一些主要的商业银行恰是战前财阀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样，旧财阀系统的各公司在资金筹集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而在重化工业发展中起了较大的作用，自身也得到了发展。

---

[1] 见日本和平经济计划会议书末附表。

然而，日本战后企业集团与战前财阀有明显的不同。一是战后企业集团内部各企业间以互相持股为主要特征，金字塔式的控制结构消弱。二是适应重化工业的需要，各企业集团不再象战前那样只对主要行业作重点投资，而是在多个行业内进行投资，使各企业集团之间在许多重要行业内部成为竞争对手。竞争程度加剧、垄断性下降，使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与高效的市场竞争同时发挥作用，这就是日本高速增长的组织原因。

企业集团与稳固的资产一体化的结合体不同。按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的意见，企业集团有七个标志：(1)成立经理会，(2)互持股票，(3)互派高级职员，(4)实行系列贷款，(5)广泛的集团内交易，(6)集团作为整体向新领域扩展，(7)共同的商标。另外，综合商社的存在也可以被看成是集团的一个特征。

日本的企业集团在经济增长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重化工业的建设上，比较适合大规模的企业投资，因而企业集团起了先锋作用。结构的迅速转换是日本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日本政府特别是通产省，在计划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中自然是功不可没，但若没有企业集团的推动，若没有集团性的集资和投资行动，重化工业的过程不会这样迅速。如果说美国是在众多小企业经过内部成长或外部合并才发展成适合现代工业的大企业，那样，日本则是依据集团的经济实力，直接搞成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目前，在钢铁、汽车、造船等工业部门内，日本的企业都在世界同行业的企业内占有优势。新日铁、丰田、石川岛播磨、三菱重工等企业是日本经济的支柱和象征。

企业大型化使日本经济用较短的时间达到了先进的水平。50 年至 70 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增长 15 倍，而在那些适合于大批量生产的部门，则速度要快得多。例如，同期日本的汽车产量

从 67200 辆增至 5303200 辆，增加 78 倍。但是，这种大型化并没有引起垄断和相应的效率低下。由于六大集团都是综合化的集团，每一集团都涉及到许多产业，因而集团间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这种既有充分竞争又有优势集中、协调高效的产业组织结构，被人们认为是日本经济能保持较好的投资效果的重要原因。

表 4—3 显示了 1987 年日本部分产业中的有一定实力的企业数。从中可以看到，尽管依部门不同企业数有些变化，但总体上来说既有竞争又有规模先进性。没有出现鱼龙混杂、拉不开档次的情况。

表 4－3　日本部分产业中的可竞争企业数（1987）

空调	13	计算机主机	6	电视机	15
汽车	9	微波设备	5	轮胎	5
照相机	15	造船	33	半导体	34
轻型卡车	8	微型机	16	打字机	14
传真机	10	钢铁	5	录音机	10
机器工具	112	合成纤维	8		

资料来源：Porter，p. 412

据有关资料显示，日本的大量中小企业通过各种合作方式与大企业密切协作，也保持了生机和活力。日本的机床工业有 40 多家大企业，有直接协作关系的中、小企业有 1 千余家，为这 1 千余家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小企业又有 1 万多家。多数工业部门都是由大企业到小企业，通过多次承包所组成的金字塔结构[1]。总之，日本产业组织结构的比较合理和协调是日本经济

①　参见任文侠等主编：《日本工业现代化概况》。

增长中的重要特征。

三 美、日工业组织的比较及其含义

在分析美、日工业组织的异同及其增长意义的时候，必须再次强调经济增长这一宏观过程的极其复杂性。适宜的工业组织只是经济增长取得成绩的众多条件之一。在许多情况下，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供给总能力的培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明显和直接。工业组织对增长的影响，更多地需要从长期趋势上进行分析。日本人在饥饿和寒冷的威胁下，在战争的废墟上把他们劳动所创造的那点资本全部用到了工业的重建上。要素供给和结构转换机会无疑是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尽管如此，美国和日本分别是50年代之前和之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领先国，其工业组织上的特征，对我们分析工业组织的动态演变是有启发性的。

从总体上看，日本工业组织中的集中化程度高于美国，竞争是在广泛的分层次的市场范围内展开，很多产品的竞争是在几家集团之间进行。相比较而言，日本的企业合并虽也有发生，但远没有美国那样频繁。在美国，为企业合并而支出的投资往往落入投机者之手，因而放慢了技术和新产品开发的进程。日本的企业则主要依靠内部发展，这样日本就避免了许多不成功的合并所带来的损失。对新的生产领域的开拓在美国常是由新的公司来实现，而在日本则是由集团内转向新的方向。

比较美、日工业组织的不同，有两点情况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一是日本相对的落后地位为其追赶美国提供了学习的条件，二是日本政府的比较有效的经济干预。作为一个后来者，日本的

集团无论是向重化工业的投资，还是向电子行业的投资，都有一定的经验可以借鉴，因而可以一步到位地大量投入。而美国在探索这些工业的过程中却要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比较。同样，在1965年之前，日本推行重化工业的过程中，对重化工业投资给予了一系列优惠的政策，并通过高关税保护国内的新兴产业，直到1965年之后才开始取消保护，转而采取开放的工业贸易政策。

对日、美汽车和电子工业的组织结构的比较有助于说明问题。日本的汽车业集中度不及美国，零部件的生产专业性很强，整车厂的零部件外购率平均在60—70%左右。虽然整车厂的规模也很大，但一体化程度较低。而美国的汽车工业垂直一体化的程度较高，而在微电子行业，日本是集中在十余个大的综合性企业内，而美国则分散程度较高，变动也很大。例如在计算机生产领域，虽然从50年代以来一直由IBM公司独占鳌头，但企业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大企业之间的兼并和退出时有发生。五十年代初期实力最强的Remington Rand公司由于销售不利，与Sperry合并成Sperry-Rand，之后每况愈下。施乐公司也曾试图进入计算机领域，并于1969年买下了当时很成功的SDS(Scientific Data System)，后来由于竞争不利又退出了计算机生产。六十年代，通用机市场上名列前茅的是：IBM、Sperry-Rand、CDC、Burroughs，Honeywell、RCA、NCR和GE，到1978年变成：IBM、Burroughs、Univas、NCR、CDC、Honeywell，而到1988年则变成：IBM、DEC、Unisys、Amdahl、DG[①]。可见公司之间的竞争是无情的。而日本的电子计算机工业为了与IBM等美国公

① 参见Dorfman。NCR公司已于1989年被另一大公司AT&T收买。

司抗衡，由政府援助，将六家主机制造公司两两联合，靠集中优势取胜[1]。

从技术的角度看，无论是汽车生产还是计算机生产，日本在起步时都是从美国学来的，但依据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做了适合日本特色的调整。技术的发展对工业组织的要求一般可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技术的探索期，在探索期内技术的多种可能性还没有定论，各种技术方案都在尝试和选择之中。这时工业组织以分散为宜。不同的企业独立进行各自的试验，就会更快地发现最优的技术方案，并能够分散技术不确定性造成的经济风险。第二个阶段是技术的大量应用阶段，这一阶段内技术选择已经比较明确，关键的工作是把配套条件组织好，使技术得以充分利用。这时的工业组织常常是一体化的大企业占优势。第三阶段是技术和生产的稳定期，在此期间技术已经定型，生产过程已稳定，许多零部件的生产已经标准化、规范化。工业组织转向专业化协化，从高度集中又走向适度分散。日本在发展汽车工业的时候，汽车生产本身已经十分稳定，因而日本厂商可以选择比较广的专业化协作。同样，美国是电子工业的先进国家，许多技术都在摸索中，所以相对比较分散。而日本一心要学习并应用美国已经搞出来的电子技术，因而风险较小，注意力集中于拿出高质量的产品，于是日本电子工业是相对集中的。

美、日工业组织上的特点表明了工业组织必须适应经济增长水平的要求，且对经济增长率有一定作用。不同的产业部门、不同的技术阶段，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工业组织。资源配置的动态标准就是有效地把资源组织起来，以求得理想的经济增长速度。

---

① 参见岩家芳郎、

4.2 实例之二:韩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工业组织特点

60 年代以来,一些原来并不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取了辉煌的经济成就,有些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

对亚洲的这些创造了奇迹的国家和地区的分析已有很多,一般认为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其经济增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实际上上列三个地区中,新加坡和香港由于规模很小,仅靠贸易利益就足够维持不错的经济增长,这与必须以生产能力为基础的大国的经济增长有本质上的差异。我们要分析生产能力增长与工业组织的关系,只能以韩国为例。

表 4—4 韩国、新加坡、香港经济增长情况

	年平均 GDP 增长率 1965—80	年平均 GDP 增长率 1980—89	人均 GNP(美元) (1989)	人口 (1989)
韩国	9.5	9.3	4400	4238 万
新加坡	10.4	6.9	10450	268 万
香港	8.5	7.0	10320	373 万

资料来源:1965—80 数据出自 Stern p.611。
1980 —90 数据系笔者据《世界表 1991》计算。
人均 GNP 取自《世界表 1991》。

一 韩国的工业组织特点

韩国经济发展的起点很低,又长期为战争奔命,从六十年代

才真正开始经济增长的进程。韩国的工业组织也是以集中为特点的，企业集团也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依靠力量。韩国的集团在规模上不如日本，但集中度也是很高的。据韩国《釜山日报》报道，1981 年时，韩国 30 个大企业集团的营业额（不是增加值）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60%，其中，现代，鲜京、三星、大宇、乐喜这前 5 家分别占 8.2%、7.4%、5.7%、5.3%、3.5%，五家合计占 30%①。

韩国的企业集团与日本的集团有很大不同，前者带有很强的官僚资本的特征。1945 年美军政厅接管了日本人在韩国的财产。这些归属财产相当于韩国当时总资产的 80%，其使用和划分是由官僚行政系统决定的。因而，韩国的企业集团是在战前殖民地经济的基础上，在资本主义未能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由政府扶植起来的。没有经过自由竞争阶段，也没有经过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过程。

战后韩国的发展条件与日本不同，日本毕竟经历过战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已经有了相当强的经营能力和资本积累能力。韩国在工业发展初期的基础却十分薄弱，因而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政府有重点、有目的地扶植了一些大的财阀组织，用以实现重、化工业的建设。

韩国企业集团的发展，依赖的是政府对战略产业给予的优惠政策。1962 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扶植的重点是炼油、肥料、水泥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1967 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扶植的重点是钢铁、石油化工、机械工业。1972 年以后，将钢铁、有色金属、造船、机械、电子、化学工业选定为六大战略

① 参见贾贵春、尹传学：《韩国企业集团》。

产业。每一时期政府都在重点产业内选择重点企业，给予支持和优惠。只要被指定为扶植对象企业，就可以在政府的支持下很快地发展壮大并向其它领域扩张。

在集团内部，韩国的集团是权力集中的，集团的会长具有绝对的权力。而日本的企业集团不存在最高负责人，各企业之间通过互相持股而互相依存，集团的全局事项由经理会协商决定。

韩国的集团内企业并不都是生产上有联系的企业，有些是不相关的企业群。这种多角化发展的情况与日本的集团是相似的。这种大集团搞多样化的结果是，形成了既有垄断又有竞争的产业组织结构。在韩国，许多主要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均是由几家大企业进行竞争。其优点在于，既能形成规模经济又能防止垄断。多样化经营的集团的另一个优点是，有能力聚集大量资金、迅速开拓新的领域。例如，现代集团，依靠承建大规模的建筑项目积累了资金。后来成立了现代汽车公司，1975 年才生产出韩国第一辆"福尼"小轿车。到 1984 年其汽车已打入加拿大市场，1985 年底成为加拿大最大的汽车进口商，1986 年向美出口 10 万辆，其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当然，和其它任何国家的经济过程一样，韩国的中小企业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韩国在 1966 年公布的"中小企业基本法"中明确了中小企业向"专业化、系列化"发展的规定。强调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形成相互补充关系，小企业为大企业的生产配套服务[①]。很显然，韩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比较重视对企业的引导和集中优势，这种政策一方面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使企业集团带有一些非现代因素，例如利用特权等。

---

① 参见王慧炯主编：《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第十六章有关介绍。

二、工业组织与追赶效应

日本已经以无可争议的速度赶上了美国，今天的韩国同样在以日本为范例，重复着这一令人鼓舞的过程。落后国家对先进国家的追赶有着技术和结构上的机会。表 4—5 显示了日本和韩国不同部门的产出增长速度。容易看到，第一，在列出的时间段内，两国增长率最高的都是电子和运输设备部门。而在起始年上两国的经济水平相差很远。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统计，按 1970 年美元计算，日本 1955 年的人均 GNP 是 500 美元，而南朝鲜 1963 年的人均 GNP 是 149 美元[1]。第二，韩国的产出增长率又高于日本，显加速趋势。经济水平相距很大的国家，面对结构转换的机会是相似的，这就会大大缩短经济水平上的差距。

表 4—5 日本、韩国的各部门产出增长率比较

	日本(1955—73)	韩国(1960—77)
食品加工	9.36	16.09
纺织	7.49	18.88
服装	12.52	23.34
皮革	11.15	25.20
木材	7.94	16.32
造纸	11.25	19.41
化工	12.23	21.33
石油和煤	15.28	22.81
橡胶	9.79	20.90
玻璃	12.43	18.93

① 见 Chenery 等编:《工业化与增长》第 150 页表。

	日本(1955—73)	韩国(1960—77)
基本金属	12.11	25.68
金属加工品	14.33	22.19
机械	15.90	23.01
电子	18.26	36.00
运输设备	16.69	28.68

资料来源:Chenery,p. 290。

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工业组织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捷径"现象。美国的混合型大企业是在六十年代达到高潮的,在此之前已经经过长期的竞争、生长和合并的过程,走到这种形式也是多年摸索和选择的结果。而日本的集团多样化则只经过了一个比较短的过程,韩国的集团更是直接采取了多样化的集团结构。

至此,我们已经认识到:(1)从企业组织形式上看,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要求,探索期要求多样化和风险分散,应用期要求垂直一体化程度较高,稳定期要求专业化协作。(2)从产业组织结构上看,既要保证充分的竞争压力,又要使企业达到经济规模和相当的技术水平。既反对独家垄断,也反对遍地开花。要实现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产业组织结构,当经济中存在一些多样化经营的大公司时比较有利。(3)从组织演化的动态过程看,要保证经济增长的正常需要,必须建立动态的组织调整机制。企业应能够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自身组织,并形成正常的企业创立和消亡的法律制度。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非认为"大的就是好的"。确实有一些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国家和地区,也取得了比较理想的增长业绩,例如新加坡和台湾省。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规律,在一个工业体系基本完整的较大的国家里,仅仅依靠中小型企业和分散经

营，实现不了重化工业的发展。新加坡和台湾的国(区)内市场狭小，依靠贸易和第三产业就可以取得不错的国民收入水平，因而至今他们的工业基础是薄弱的。

4.3 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原理

在初步分析了美、日、韩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工业组织特点之后，我们要从一般性的概念上讨论工业组织对经济增长历史过程的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可以抽象地划分为：经济增长机会的开创、经济增长过程的实现、经济增长过程的协调，下面分别讨论工业组织在这三个方面的作用。

一 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机会

经济增长机会是指经济增长的技术可能性，增长机会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初始来源。人类维持增长的历史，按最宽的概念也不过500年。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显著的经济增长则仅有200余年。在短短的几代人之间，实现了如此根本性的改变，今天看来实在令人震惊。通常我们把这种飞跃归因于连续出现的工业革命，这当然是正确的。更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业革命的内容决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革命，也是工业组织革命。工业组织与增长机会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两条：

第一，经济增长机会来自技术上的发现和创新，新技术的应用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组织形式。工业组织必须要适

应新的增长机会，工业组织变化的快慢直接影响增长机会能否很快地发生作用。

第二，新的工业组织形式可以为增长机会的创造作出贡献。

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和钢铁、纺织技术的改进，为十九世纪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从手工作坊到工厂制度的转变就是为了适应增长而进行的调整。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上世纪末股份公司制度的创立中。现代公司制度中最有意义的内容是有限赔偿责任制度和公众性持股，它们使风险资金的筹集有了来源，推动了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实现。至于工业组织为了适应增长的机会而做出的微调，则已经融合于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之中。

在工厂制度建立之前，亚当·斯密就有远见地指出，财富的来源是分工而不是机器。工业组织对增长机会的创造主要体现在：

其一，工业组织的多样性和自主性，为各种不可预见的机会提供了广泛试验的可能性。没有广泛的试验也就不可能有工业技术的迅速和全面的发展，今天我们广泛应用的各种技术不过是过去大量技术设想中的一小部分。成功的这一部分是以更多的未成功的可能性为条件的。单一和僵化的组织形式会扼杀许多有益的机会。

其二，工业组织为增长机会的创造提供积累。创造新的增长机会需要大量的研究和试验，要以人力和资本投入为前提。随着技术的日益复杂化，靠某些天才的个人灵机一动而发明的事情越来越少。技术创新的专业化和系列连续性越来越强，所需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很多有应用价值的技术只能产生于大型的工业实验室内。政府的资助当然有助于此类研究，但由于其范围很广、技术高度专业化、政府难以全面和有效地提供支持。因而，创

造增长机会就必须有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现代大型公司的巨额利润和发展冲动提供了此类研究的资金和人力来源。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每年投入科研开发的资金均在数十亿美元以上，其成果即使从纯科技的角度看也是一流的。例如，埃克森石油公司在地球物理、地质、深水勘探等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而通用电气公司的研究力量在原子动力、超导合金、集成电路、流体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也是国际一流的。多样化的试验和集中的突破构成增长机会的来源，而现代工业组织的分散化和大型化并存也正是适应（或为了适应）这种要求。

二　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实现

经济增长的实现是把经济增长机会转化为广泛应用的产品，大幅度提高有效供给的过程。正是技术改进的大规模广泛应用，从本质上改变了人类的贫困状态，因而经济增长的实现是增长过程的核心。经济增长的实现就是在现实的市场需求能力的制约下，选择最低的生产成本和组织成本，以最快的速度满足社会需要。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组织变化的主要动力就是实现增长过程，其中明显的特征有两个。

第一，企业的大型化趋势。企业的大型化是大规模生产的必要条件。大型化既可以由企业自身积累而实现，也可以通过企业之间的合并实现。大型化与资本集中并不相同，当市场需求扩大、技术改进之后，一个部门内的企业可能普遍扩大规模，这并不是资本集中。只有当一个部门内生产和资金向个别企业倾斜加剧时，才是资本集中的过程。目前在发达国家的主要工业部门中，多是由很少的大企业与众多的小企业共同构成的，专业化经

济和联合化经济都有体现。在许多重要的工业部门中，如化工、石油、钢铁汽车等，大规模生产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从增长过程上看，企业大型化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在于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同时也在于缩短产品普及的时间，也就是推动经济增长率。福特汽车公司在本世纪初以低价推出的 T 型车的大批量生产，其意义远远大于汽车工业发展中的任何技术改进。日本经济增长的成就已为世界瞩目，对日本经济的组织结构分析已经显示，其资本集中率高于美国等老牌发达国家。目前在多数部门的世界十大公司之内，都有日本企业占据的席位，三菱重工、日产、丰田汽车等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

第二、企业的频繁的重组和调整

经济增长的实现过程是一个不断适应情况的过程，是工业组织不断调整的过程。工业组织的灵活性是产品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扎格伦(L. Jagren)对瑞典制造业从 1918 年到 70 年代存在的众多企业中随机地取出 115 个企业，据报这些企业到 1981 年时只剩下 21 个，其它企业或者倒闭或者被兼并。据对美国企业合并运动的研究表明，企业的大规模合并往往发生在经济高涨时期，每次兼并都没有使企业的总数减小，新生的企业从数字上弥补了被兼并掉的企业。这种企业生命的动态变化是结构调整的实现途径。过去我们把一些国家(例如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过多地归功于宏观上的产业政策，而忽略了其组织基础。这或许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久调不动的认识原因。

企业和工业组织的重组是保持生机和活力的必要的步骤。如何使重组在较低的社会成本下自然地实现，是工业组织适应增长的重要内容。比较我国在组织调整上的重重困难，我们自然会想到建立在公开的资本市场基础上的产权转移。这就象是经

济上的投票过程，既有利于控制代理成本，也使企业的雇员的命运与企业的资产的归属有一定距离的超脱，从而减轻了资本调整的阻力。

三　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协调

经济增长协调过程的基本任务是：(1)将需求信号和需求变化及时反映给生产者，建立起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协调，使增长循环得以实现。(2)协调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将生产者收益与其对增长过程的贡献结合起来。(3)选择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佳路径。

1. 市场与工业组织

在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增长的协调是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的。现在人们已一致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即使有计划的参与和指导，对市场的作用也绝不能低估。工业组织是与市场紧密相关的。

经济增长要求不断提高生产率，要求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学习过程。而需求是多样化的，商品的供给和需求要通过市场交易结合起来。市场的范围和规模限制了专业化分工，市场的效率决定了信息反馈的效率，信息又是企业决定产品创新和调整的依据。所以，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并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欧洲经济的工业化是与海外世界的开拓、与对殖民地贸易密切相关的"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能再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马克思的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类似地、在美国经济发展初期，由于

美国国内资源的十分丰富，对外贸易的比重不大，但是美国国内市场的扩展，内河航运和铁路的开发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市场规模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市场包括国内和国际两部分。一般认为，大国由于具有比较确定的国内需求，从而具有市场上的优势。小国则只能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才能建立起一定规模的工业。对许多工业部门来说，一个大企业的产量即可达到或超过一个小国的全部需求，从而造成国内市场的垄断。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即使是大国也应积极参与国际市场。通过国际竞争可以有效地消除国内的某些垄断性，并能通过专业化经济，使一国的发展在更宽的选择范围内实现协调。

就贸易的本质来说，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是相同的。贸易活动的益处一般认为有三条：(1)各种原因导致相对生产成本不同，贸易往来可使各国或地区专门生产成本最低的商品；(2)有助于落后地区获取需要先进技术的货物和劳务，克服人力资源上的欠缺，加速经济增长进程；(3)有助于推动企业参与竞争，确保本地工业达到最高效率水准。当然关于贸易利益的讨论都是建立在要素不充分流动的假定之上的。

在开放经济的国家，对内外贸易是一视同仁的。在日本，大的综合商社既从事国内交易也从事国际贸易。对于国内经济的协调，主要任务是反对行政性垄断和区域分割，提高宏观优化的水平。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必须制订正确的发展战略，并有相应的工业组织来实现其战略要求。

2. 专业化与国际市场

在理论上对于究竟什么因素引起贸易的发生以及其与工业组织的关系，近年来有各种讨论。除去石油及一些与资源条件有

关的产品，国际市场上的制成品贸易绝大部分发生于工业化国家之间。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经济结构和要素价格都很接近，很难说有什么比较优势。按照赫克歇尔——俄林比较利益原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丰富、资本短缺，其出口优势自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发达国家则正好相反。但必须注意到赫—俄理论的严格的前提条件：各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在此前提下，对劳动力是否丰富的判断就必须要把人力资本的因素考虑进去，把劳动力的数量按人力资本水平做质量上的调整之后才可用于贸易优势的分析。以这样的标准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就很难说是劳动力丰富的，其劳动力价格的低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素质的低下，这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努力并不总是顺利。

比较成本原理的一个重要改进就是对成本概念的认识。六十年代以来，比较成本的标准化理解是比较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但是，机会成本的比较尽管在理论上十分完美，在实际应用中却很困难。机会成本通常以"技术转换率"来衡量，现实经济中广泛存在的非总值税和关税都会使真实的转换率与理论背离。因而，唯一的可用的依据只能是一套设计完好的影子价格体系。

任何国家，包括象美国这样的经济强国，都仅在某些产品的生产上具有优势。因而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可以给所有参与交易的国家带来利益，至少从理论上说是这样。从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来看，分工不仅是比较利益的结果，也是贸易的起因。分工和专业化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强竞争力。如果存在学习效应，各国专业化的优势就会保持下去。如果某国所从事专业化的产品学习是潜力有限或是市场需求潜力有限的，则会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该国的经济增长，除非该国能够依靠已经取得的资金较快地调整经济结构。考虑到分工引起的收益递增，按静态的比较利益原则确定贸易结构未必是最佳的。例如，假定A国静态的比较利益适合于从事a产品为主的专业化生产，然而a产品缺乏技术连续性和深化的潜力，学习效应很小，生产率提高的潜力有限，成本不会有长期的下降。那么如果A国真的专业化于a产品，则必然难以维持长期稳定增长。相反地，如果A国选择了静态优势并不明显但学习过程复杂的b产品，则会在长期内保持竞争优势，获得持续的高增长率。

历史上英国经济走向衰落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顽固地坚持比较优势，忽视经济的动态规律。在19世纪后期英国工业的优势在纺织、煤炭、造船和与之相关的钢铁、机械等部门。而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正是工业部门显著变化的时期，电力、电气器材、内燃机和化学工业都在兴起，而英国人自恃棉纺织品上的比较优势，轻视新兴工业的发展。在汽车工业创建之初，英国曾大批从国外进口汽车而疏于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从二十世纪初期英国的经济开始走向衰落。

经济增长不是抽象的概念，它由具体的产品增长构成，而产出的增长以成本、质量、技术上的竞争力为基础。在现实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凡是取得了辉煌增长业绩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在若干种产品的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为什么有些国家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而有些国家则长期停滞?这是经济学家们长期关注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十分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可以肯定，这决不仅仅是宏观问题，而是与资源配置和工业组织密切相关的。仅从国际竞争力来看，一国的主要产品若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则该国的经济增长不会很慢。汇率、利率、财政赤

字等宏观因素确实会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西德、日本、瑞士等国的货币一再升值，韩国一直有很高的利率，西德、瑞士长期实行高工资政策、劳动力短缺。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见，具体产品的竞争优势是十分重要的，而产品竞争优势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专业化和学习过程，其之所以得以实现，是以协调的运行完好的工业组织为基础的。

至此还剩下一个问题。收益递增或规模经济是对各国都适用的，从理论上看，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在世界范围内销售而得到规模经济。那么为什么西德选择了化学工业、瑞士选择了纺织机械、瑞典选择了矿山机械。这是由初始条件决定的，也同时正好说明了学习过程的重要性。一个国家一旦在某一产业内取得一定优势后，就会形成一定的进入壁垒，使其它企业难以竞争，而其自身则通过学习过程，长期保持在这种产品上的优势。

多样化、专业化、一体化、合并和重组以及参与国际分工，这些基本的经济增长现象，反映了经济增长过程对工业组织的内在要求，也是工业组织演变推动经济增长的机理所在。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这些要求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

第 5 章

经济增长与工业组织相互关系的微观机理

上一章，我们简略分析了不同时期内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的工业组织特色，讨论了工业组织在经济增长中的变化的共性。我们将这些性质概括为：(1)企业的大型化和多样化，(2)既有垄断又有竞争的工业组织结构，(3)企业创立、倒闭和重组的规范化。本章内我们在这些现象的基础上，讨论其形成原因、对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情况与金融市场的关系，最后探讨工业组织合理化的准则。

5.1 工业组织的技术和经济的决定因素

上述三条性质从本质上看都是由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决定的，其中贯串着竞争的主线。从成因上看，企业的规模决定是最基本的。企业规模确定之后，在一定的市场需求下就会形成相应的工业组织结构，形成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倒闭了，另一些企业则可能通过合并和改组其它企业而进一步壮大。所以，我们首先观察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

一 企业规模的确定——成本最小化

对于独立经营的企业来说，成本反映企业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成本优势代表着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因而企业总是在试图发现使单位产品成本下降的方式。从事工业活动的人们早就发现，即使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生产的规模与产品的成本相关，这也就是今天已成为基本常识的规模经济原理。

规模经济一般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生产设备的规模经济，来源于固定资产的不可分性和所谓的“几何规则”。固定资产的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是指一些基本的生产条件不随产量的变化而改变(如厂房、专用设备)，这些资产作为固定成本分摊到每个产品中去，生产规模越大，每个产品分摊的成本越低。所谓“几何规则”则是指象容器、管道等设备，其生产能力是以体积衡量的，而其建造成本是由其表面积决定的。这样生产能力的增加大于其成本的增加，因面扩大规模是有利的。

第二个层次是工厂的规模经济。工厂的规模经济中自然包含了由生产设备产生的规模经济，除此之外还有操作成本的规模经济。随着产量的增加，生产中分工的程度加深，在一些工序上可以引入专用设备并实现操作者的专业化。专业化有助于提高操作熟练程度并积累经验，也就有助于降低成本。

第三个层次是在具有多个工厂的企业内的规模经济。除了上述两种规模经济都在企业中发挥作用之外，多个工厂的企业有其组织成本上的规模经济。多个工厂组成一个企业则可以共享一部分销售渠道、共享研究和开发人员，节省会计和核算人员

等，这样就降低了单位产品中的管理费用。

但是，规模经济不是无限的，在超过一定规模之后，继续扩张则反而会导致成本的上升。其原因主要在于，随着规模的日益扩大，管理层次增加，决策者越来越难以面对生产和市场的真实情况，部门之间的协调也越来越困难，使效率下降。因此，对企业成本与规模的形象化的概括至今仍是人们熟知的U型曲线，即在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的情况下，单位成本随产出规模扩大面下降，超过一定规模后又上升。在企业生产多种产品时（multiproducts），无法简单地画出成本曲线，但其原理与单一产品生产几乎完全一致。在多产品生产中，成本函数可抽象地写成：$c(y, w)=\min_{x} \{wx:(x, y)\in T\}=wx^{*}(y,w)$。

式中：w 为投入要素价格，X^{*}是为了产出 y 所需的最小的投入，x，y 均为向量[①]。

在多产品生产企业中，在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之外，还有一个比较新的概念，称为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范围经济来自马歇尔提出的"联合生产"(joint production)概念。其含义是，把几种相互有密切关系的产品放在一个企业内生产，若 $c(y1,y2)<c(y1,0)+c(0,y2)$，则存在范围经济。从理论上看，范围经济的来源在于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共同投入。某一种投入是生产 A 产品所必须的，而同时又可无成本地顺便产生出 B 产品，则 A，B 同时生产最佳。从直观上看，例如，在同企业内生产羊毛和羊肉比分开生产要经济。但是范围经济在当今的现代化工业中，对工业组织的影响是不大的。

---

① 参见 Panzar, J. C. "Techn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Firm and Industry Structure", in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当企业的要素和原材料投入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也就是企业的决策不影响投入价格的情况下，从静态看，企业要考虑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而把产量和品种确定在成本最低的决策上，获得最大利润。如果企业运行中存在着学习过程，那么企业的成本不仅随规模和品种而改变，而且随时间而改变。时间也可以用累积的总产量来代替，正是在最初一部分产品中，为学习生产知识和积累经验付出了成本。一种简单的假定是：生产中的学习过程，仅出现在最初的生产中，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再有学习效应。于是，生产过程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中存在学习过程，第二阶段则没有。第二阶段的成本是第一阶段的产量的函数：$C_2=C_2^i(Q_1^i+\alpha\sum Q_1^i)$。$\alpha$ 是产品之间的影响参数，由于学习过程具有特定性（speciallized learning），即其它产品的生产经验对本产品的成本影响不大，所以 α 远远小于 1。

二　工业组织结构的确定

工业组织（市场）结构的确定决定于企业的大小和市场的大小的相互作用。上面我们分析了企业的规模是由成本性质决定的。而市场的规模是由市场需求曲线决定的。当需求曲线超过成本曲线的时候，市场内就会有企业经营，就是非空的。那么究竟一个市场将容纳和吸引多少个企业呢？假定有 m 个企业，对应的产出向量为 y1、y2……ym，总产量 $\sum y^i=Q(p)$。p 是产品的价格向量。任何一个可行的市场结构必须满足：$p(\sum y^i)\cdot y^i \geq C(y^i)$。$C(y^i)$ 为成本向量。很显然当需求价格远高于成本的时候，无论是竞争型的还是垄断型的市场结构，都是可行的市场

结构。在可行集中存在一个最优市场结构，从理论上说，取这个产业的成本函数的最低点，即为最优结构点。当然，现实中的市场结构并不能保证在最优点。

若考虑动态过程，如果企业进入市场有时间上的差异，则学习过程的存在会产生企业集中的趋势。先进入的企业随着学习效应的发挥，可以比后来者有较低的生产成本。如果企业间从事价格竞争，则先进入者可以订一个低于后来者成本的价格，这样后来者就只能亏损。于是，学习过程就成为限制后来者进入的一种壁垒。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要看学习的潜力和贴现率的高低。如果学习过程带来的好处十分有限，就不足以构成壁垒。同样，由于学习过程的益处随时间递减，后来者尽管在最初阶段蒙受损失，但终会平起平坐。所以若贴现率较低，日后的收益就可以弥补今天的损失，仍会有"远见卓识"的厂商情愿"交学费"。

现实经济中，越是技术和组织比较复杂的产业，学习过程越显重要。学习过程不是仅指技术知识的学习过程，而是生产经营的学习过程。把错综复杂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组织起来并正常运转，绝非一日之功。这种必须付出成本的学习过程是一种风险，构成了厂商的进入壁垒，成为很多厂商参与市场生产和竞争的一种潜在的限制。一个产业的进入壁垒越大，产业内的企业就容易对付潜在的竞争者，也就受到较低的竞争压力，因而易导致效率下降。正象本文第一章中对概念限定的陈述那样，进入壁垒也是市场结构的重要方面。当然，进入壁垒并非仅来自学习过程，占用特种资源、大规模资金需求和许可证制度都是构成进入壁垒的因素。

三 技术决定的工业组织结构与实际工业组织结构

上面讨论了决定工业组织结构的技术因素，那么，在实践中这些因素究竟起多大作用呢？自从工业组织理论建立以来，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基本一致的看法是，技术因素在决定工业组织结构上起了一定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作用。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对最小效率规模（minimum efficient scale，简记 MES）和成本梯度的实际分析。

首先，企业的规模与其利润之间一般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尽管企业的利润并不仅仅取决于效率，而且决定于垄断能力和资产核算方法，但这种关系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规模经济的作用。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制造业公司股票持有者的平均税后收益与公司的资产额有正向关系（参见表 5-1）。

表 5-1 制造业公司的股票持有者的税后收益（%）

公司资产（美元）	1963—65 年	1966—69 年	1969—71 年	1975—77 年
10 亿以上	13.5	12.7	10.3	13.2
2.5 亿—10 亿	11.0	12.1	10.4	13.0
1 亿—2.5 亿	11.2	12.0	9.7	12.1
5 千万—1 亿	10.4	11.2	8.6	12.0
2.5 千万—5 千万	10.6	11.4	8.2	11.9
1 千万—2.5 千万	9.9	11.0	7.9	12.4

资料来源：引自 F. M. Scherer 著《工业市场结构和经济效果》80 版 92 页

我国的情况与此类似，据1985年工业普查显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大致与规模成正相关。见表5-2

表 5-2　1985 年按不同规模分组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经济效益

固定资产原值	人均净产值(元)	人均利税(元)	资金利税率(%)
10 亿元以上	12603	8132	20.35
5—10 亿	6100	4135	18.62
1—5 亿	5748	3778	18.08
0.5—1 亿	5749	3952	23.29
0.1—0.5 亿	6466	4749	29.85
0.1 亿以下	5181	3520	25.99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5 年普查资料》(第三册,全部工业企业)。

表中,在0.1—0.5亿固定资产处出现明显的效益上升。价格体系可能是促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具有1亿元以上固定资产的企业多是重工业企业或原材料生产企业,其价格由国家较严格地控制。而在0.1亿—0.5亿元资产范围内的企业,则价格相对灵活一些,这些企业既有相对于同种产品的其它企业的规模优势,又有经营上的灵活性,故而效益较高,如果能滤掉这种企业类型和控制上的差别,我国规模经济的效益将更为明显。

企业的最小效率规模MES,是试图对不同种产品的生产给出一个有效率的规模的下限。产量低于MES的企业,一般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提高效率。在对MES的实际估算中遇到一些困难,其根本原因依旧在于企业的经营效果与多种因素有关,规模

因素仅仅是其中之一，而要单独把规模因素区分出来是极其困难的。通行的 MES 测度有三种方法：工程技术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和斯蒂格勒提出的生存技术法(Survivor test)。统计分析法主要是分析不同规模的利润率水平，试图从中发现合适的规模。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由于企业盈利的多因素性，这种方法只能观察大致趋势，难以给出具体的界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Stigler,G. J.)在工业组织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思想，但他提出的生存技术法却一直仅仅是一种假说，作为测度 MES 的方法还有很大的疑问。他的生存检验法本质上就是认为，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筛选出最有效率的规模。因而能够在竞争中长期生存的规模就是经济规模。此法虽然简单易行，然而有过分相信市场机制之嫌，这当然与斯蒂格勒的芝加哥学派背景有关。工程技术分析法一般比较准确，但又过于复杂。综合地看，对 MES 的估计以几种方法互相补充配合为宜。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分析 MES 对工业组织结构的影响，所以某部门的 MES 占到本部门国内总需求量的比例是我们关心的。现有对美国工业的 MES 的估计显示，在绝大多数工业部门，MES 占总需求的比例很低，多在 0.1—10%之间，超过 10%的很少[1]。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产业内足以容纳十个以上达到规模经济标准的企业参与竞争，因而由规模经济而导致垄断的技术可能性是很小的。这一结论当然是依赖于美国巨大的国内需求力量的。如果是在一个小国或者是经济不发达的大国，要达到美国标准的 MES，则在国内商场能容

---

(1) 在 Scherer 的著作中列出了美国不同部门的最小经济规模，和这一规模占市场总需求的比例。类似的数据在许多文献中都易发现

纳的企业是很少的。很可能形成一定的垄断。只有实行开放政策，面对国际市场才能确保一定的竞争压力。

成本梯度（cost gradients）表示的是，当企业的规模小于 MES 时，单位成本上升的程度。如果成本梯度较大，企业的规模若偏离 MES 则成本上升很大。企业必须遵从 MES 的要求，规模经济因素在决定工业组织结构中也就会起较大的作用。反之，则结论相反。对成本梯度的研究表明，当企业的规模仅达到 MES 的 1/2 时，单位成本的上升一般小于 10%[7]。这就说明，尽管存在规模经济，但企业可以在很宽的规模区间进行选择，因而规模经济对工业组织结构的影响是有限的。

但是，从发达国家现存的工业组织结构来看，市场集中的程度是很严重的，在很多部门中生产都集中在几家企业手中。既然规模经济的作用不重要，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呢？从技术方面看，学习过程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科学技术日益复杂的现代工业中，资金需求作为进入壁垒的作用已不重要，学习过程正在成为重要的进入壁垒。某些大企业一旦在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便有可能较长时间地保持其市场份额。

四 垂直一体化的组织决定论

规模经济和学习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大型化和市场集中的原因。但企业的大型化并不总是在同一工业部门内进行的，很多企业通过内部扩张或兼并其它企业实现了多样化

⑦ 例如，F. M. Scherer 著 *The Economics of Multi Plant Operatio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Study.*

经营。

企业的垂直一体化并不是由技术原因引起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含义。社会生产从最初投入到最终产品，要经过无数的环节或阶段(stage)，垂直一体化就是把其中的几个阶段组织在一个企业内完成。每一个阶段的生产成本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并不因其是否组织在同一的企业里而改变。如果一个企业仅有生产成本而没有其它成本，那么便没有垂直联合的必要，每个环节都可由单独的企业实现，通过市场使各环节联系起来。但是，很明显，要从事市场活动就必须支付相关的费用，如市场信息的采集、广告、供销人员的开支等等。正象科斯(R. H. Coase)所说，存在着使用价格体系必须付出的成本，也就是通常所称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企业决定其垂直一体化程度的判据就是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和达到最小。

理论上讲的交易成本并不是指供销费用，因为如果企业的每项供销费用是针对限定的功能且组织得合理，那么垂直合并生产环节并不能带来费用的下降。交易成本抽象的表述是市场交换的机会成本，其主要来源是资产的专用性。为了达到高效的生产，时常需要引入一些专用资产和设备，这些资产无法用于其它用途。专用资产的拥有者如果通过市场去和前后工序的生产者打交道，他的谈判地位是十分脆弱的。专用设备开工不足的损失是很大的，因而其对手常可以有效地压低专用设备的使用价格。这种现象的结果，就是使投资者不愿从事专用高效设备的投资，而是改在通用设备上投资。以通用设备代替专用设备而牺牲的生产效率，就是市场交易的社会成本。当投资者能够把专用资产和与之相关的环节组织到同一企业中，实现统一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时，既可以应用高效技术，也不会在价格竞争中处于不利

地位，这也就是对企业垂直一体化现象的一种广泛接受的解释。

对于垂直一体化与分工的关系一直存在着有趣的争论。垂直一体化的企业尽管在内部也可以实行有效的分工合作，但对于工业组织整体而言似乎是一种反社会分工的倾向。斯蒂格勒曾指出，企业的规模受制于企业的功能。在企业的众多功能中，有些是收益递增的，适合于扩大规模，也有些是收益递减的，阻碍扩大规模。两者共同作用就制约了规模经济。如果能够把收益递增的功能分离出去另立企业，则可以扩大规模、提高效率。而能否实现这样的专业化就要受市场需求的限制，只有当需求足够大时，这种专业化才能有足够的产出规模，才能有高效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印证了亚当·斯密的名言，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因而斯蒂格勒认为，在增长的产业，反垂直一体化（分工）将占主导地位。只在那些衰落中的产业中，由于市场规模收缩，垂直一体化才成为主流[1]。但是，多年来的实践并未支持他的分析，原因就在于组织成本的作用。处于增长之中的产业，虽然市场规模在扩大，但是企业的内外部环境的不可充分预见性也很大，企业随时需要为了适应增长而作出投资、生产开发等多方面的调整。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固定性使增长中的企业难以适时地做出反应，或者说要为专业化支付很高的交易成本。考虑到这一点，处于较快的增长和变化中的企业可能会更倾向于把相关的生产阶段结合起来，以适应情况的变化。

综合起来考虑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组织成本之和的最小化，必须把市场规模与市场变化率区分开来。若增长过程是渐进的、平稳的，则市场可预见性强，合同风险较低，交易成本与生产成

---

① 见斯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中有关章节。

本相比较处于次要的地位，市场规模的扩张会促进专业化的倾向，或许会有些环节从原有的企业中独立出来。这也就是斯蒂格勒指出的那种情况。若市场的变化很大，各种创新活动不断涌出，则企业的经营策略要及时调整。这样，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就会较生产成本显得更为重要，企业将有垂直一体化的倾向。在企业组织发展的历史中，市场规模与市场变化率的关系，亦或说，对生产成本与组织成本的权衡有过多种组合。在手工工业时代，市场规模有限，且变化缓慢，企业规模很小，分工程度和内部组织程度都很低，每个农民都必须是他自己家庭的屠夫和面包师。随着制造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程度和内部组织都趋于复杂化。一般而论，处于动态中的企业更倾向于一体化的组织。例如，在70年代初期建立的美国苹果计算机公司，是典型的技术创新的产物，其内部组织一体化程度很高，而分工的程度则较低。至于目前已处于成熟阶段的多数巨型企业，则既有高度的一体化组织，又在统一的控制下实现了广泛的分工。这就是发达国家组织理论中所推崇的，对资源实行有效配置的"看得见的手"。

5.2 工业组织结构的增长效果

在西方的正统产业组织理论中，对工业组织的研究是被包含在市场分析的框架内的。市场结构作为既定的前提，分析不同的市场结构对市场行为和竞争效果的影响，进而对不同的市场结构的效率作出判断。最有影响的是贝恩等倡导的"结构——行为——效果"三合一的体系。即，一个市场的结构(是竞争型还是垄断型，抑或是垄断竞争型)决定了市场内企业的行为(怎样定

价、是否勾结、怎样促销等)，而市场行为自然地就确定了市场的效果。市场效果在静态的模型中主要是资源配置效果，是与帕累托最优相比较的福利损失情况。当然，如果进而考虑动态的市场过程，则市场效果应该包括增长效果。

在此思路中，市场结构有着决定行为和效果的作用，因而确定市场结构便是十分重要的。尽管存在着各种争论，但市场结构在某一时点上只能由企业和市场需求规模的相互关系来决定。例如当企业的规模很大，而市场的需求有限时，市场结构便是垄断型或寡头垄断型。这样，企业组织的形成和规模又成了问题的关键。

企业的生产成本与管理成本之和的最小化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市场需求规模和企业规模的相对关系决定了工业组织结构。在正统的微观经济分析中，完全竞争的组织结构具有完美的市场效果。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任何企业都无法操纵和控制市场，都只能是市场信号的接受者。企业间进行竞争的唯一方法就是降低产品成本、提高运转效率。在这种机制下能够引导资源配置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最佳状态。相反地，一旦市场中存在垄断势力，垄断者就会制订高于其边际成本的价格，减少产品产量，抬高价格水平，从而损害社会福利。

工业组织理论研究的初衷，就是要分析影响工业各部门内竞争程度和效率的因素。最初一致的看法是，一旦少数企业占有大部分市场份额，则会妨碍充分的竞争。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可竞性市场理论。他们认为，无论少数企业在市场中占多大比重，只要进入壁垒有限，企业就随时感到潜在的竞争者的威胁，一旦经营状况不佳，潜在的竞争者就会进入市场，成为现实的挑战者。因此即使有一定垄断性的企业也不能轻

易地抑制竞争。如果没有技术或管理上的实质性的优势，要想长期获取垄断利润是十分困难的。当今在发达国家，有很多产业都是由少数企业控制的，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的表现和形象还都是不错的。很多重大关键技术的创新和开发是由大公司完成的，其经营和服务效率也并不低。这种现象与人们通常设想中的垄断组织的效率低下、质次价高、蛮横无礼等劣迹有一定的距离。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除去企业之间的竞争威胁之外，下面三个原因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第一，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是由雇用的经理人员来执行的，企业对经营管理人员的选择是高度竞争性的，这样尽管企业本身是垄断性的，但经理的位置是没有垄断性的。经营者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绝不敢掉以轻心。第二，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都是直接面向国际市场的。垄断的产生是由于市场需求规模相对于企业的生产规模不足够大。某种企业在一国之内可能是很少的甚至是唯一的，但在国际市场范围内则又是多家竞争的。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可以有效地促进国内生产者的效率，这已为各国的实践所证明。第三，公开的监测系统和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限制了垄断势力的作用。大型公司既是新闻媒介注意的焦点也是股市的焦点，其任何大的动作都会引起众人瞩目，故很少有胆大妄为者公然违背商业规范或玩忽职守。

工业组织结构的效果的研究十分丰富，其详细讨论非本文所必须。这里仅从工业组织结构的增长效果上做些分析。

经济增长来源于创新和学习。创新活动的产生既需要竞争作为动力，又要有技术基础作为条件。在技术高度复杂的现代工业中，靠灵感和才气得到的发明已日益成为天方夜谭。实用技术的改进带有很强的连续性，不仅需要一般科技知识的积累，而且

要有对特定产品研究经验的积累。不付出必要的特定的学习过程，纵使竞争无比残酷，也无法产生有效的技术改进。技术和组织转化中的学习成本是一种客观的过程，其结果是使先进者控制一定的市场力，产生市场集中的趋势，与完全竞争的方向相悖。但是，如果不顾事实上存在的学习效应，强行抑制大公司的扩张，则会使技术开发的速度受到影响，使全社会在低水平上重复支出学习成本。

经济增长的主流是把更高级的生产可能性迅速地转化为大规模的现实生产，规模经济是实现低成本大众化生产的核心。当规模经济与竞争的要求发生冲突时，应权衡利弊，并尽可能在满足规模要求的情况下用其它方法控制垄断的副作用。当市场需求有限时，规模经济带来的低成本会促进需求扩大，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从无到有，从稀缺到丰富的产品供给过程。尽管按照静态的资源配置标准，规模经济妨碍了完全竞争，但从增长效果上看，基于高效率的集中是可取的。

必须指出的是，垄断有不同的来源。在规模产生的经济垄断之外，还有行政性垄断。行政性垄断的通常做法是由政府发放许可证或直接控制企业的经营活动。当然，只有当许可证只发给为数很少的企业时才会产生垄断。在传统体制下，政企不分是造成地区性和局部性垄断的重要来源。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找到行政靠山，其行为常常明显地违背经济规律而有恃无恐。尽管行政性垄断的产生和维持常常是来自社会方面的某些考虑，但可以肯定，在经济上，带有行政性垄断的经营方式有大弊而无一利，应在坚决摒弃之列。对某些必须实行行政性垄断的领域，就应尽量地纳入行政系统，彻底按行政方式处理，决不能搞行政和经营的混血儿。

在上述分析中，工业组织结构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基本条件决定的，这一结构又决定了市场行为和效果。这种思路是静态的。从动态过程上看，组织结构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中。任何一个时点上的工业组织结构，都将随着企业在竞争中的表现和决策而改变。例如，企业间的兼并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工业组织结构，但兼并不是由基本的供求条件决定的，而是由企业不同的经营效果和盈利策略驱动的。静态分析在分析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有一定局限性。例如，分析不同的市场结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是市场结构分析中很引人注目的研究。但是多年来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①]。仅仅从企业的规模或市场的结构上分析企业创新活动的动力显然是不够的。

上一章我们已经分析了动态的工业组织演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种动态变化的微观机理来自于企业的经营策略和技术的条件。在发达国家中，企业的经营目标也不是绝对的利润最大化。特别是在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里，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经理人员仅持有少量的股份，因而常常把追求企业的发展作为主要目标，只求把利润率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上。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许多大企业都以巨额资金投入研究和开发活动，以期求得技术和产品上的新进展。

工业组织演变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和条件就是日益发达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使得一些利润转到了生产过程之外，投资选择的重要性得到了体现。同时也应看到，由于金融因素而导致工业组织变化并不总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与长期的变化趋势不同，

---

① 在 Kamien 的"Market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A Survey"中有关于此项研究的详细介绍。

金融市场上引发的企业合并有时是出于短期的从中渔利的考虑，大量利润落入投机商手中。

5.3 工业组织演变与金融市场

工业组织演变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包括企业的不断的创立和倒闭、企业的成长和企业之间的重组和调整。这些变化使经济中的新陈代谢得以实现。由于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国家，公共性公司是企业中的主流，企业的所有者是广泛的持股人或持股法人。在这种经济下，金融市场既是企业组织动态变化的诱因之一，也是变化的实现条件。

一 企业的成长与金融市场

企业的成长壮大既是适应市场的过程，也是创造新的市场机会的过程。企业的成长受需求和供给能力的双方制约。企业的供给能力也就是企业所拥有的生产资源，包括：(1)实物资产；(2)金融资产；(3)企业声誉(多由市场支出决定)；(4)技术水平(由研究和开发活动决定)。企业要提高供给能力就必须追加投资，而追加投资的资金来源于：(1)利润的再投资；(2)从银行借款；(3)发行公司债券借款；(4)发行新股。有关研究发现，资金来源是否顺利，取决于公司的利润情况。利润的再投资显然是总利润中的一部分。从外部筹款也取决于利润情况，利润越高的企业，倒闭的风险越小，银行乐于贷款、债券易于出售。新的股东进入该公司更是针对利润而来。这样，一个企业所能追加的投资

$I=a\cdot P$。P是公司的总利润，a为比例系数。公司的供给能力增长率为$g=I/K=aP/K=ap$。其中，K为资产总额，p为资产收益率。可见，企业供给能力的增长与该公司的资产收益率成正比。

从需求增长的方面来看，对企业的产品的需求来自于老产品的扩大需求（增加产量）和对新产品的需求。市场对新产品的需求是一种潜在需求，必须由企业去开拓。企业不断推出多样化的新产品，就是对本企业的需求的创造过程。而新产品开发有两种可能性，成功了自然可以带来市场销售的大幅度增加，若失败了也就必然造成损失。所以，企业成长的需求方面，决定于成功的新产品开发。要对付开发新产品中的不确定性，就必须实行多样化开发。而大规模的多样性开发活动，要支出相当高的费用，于是就会降低企业的资产收益率。所以，企业的需求可能性的增长率与资产收益率有负相关关系，$g=f(1/p)$。当然，一旦某项成功的新产品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则企业将有较快的规模扩张和较高的利润率。上式表示的是，在一个确定的边际利润水平上，就有对应的企业增长率，如果企业谋求更快的扩张，则必须以降低资本收益为交换条件。实际上，为了创造需求而追加的多样化的投资，一般会降低资本产出率，也就会使利润下降。假定企业是以资产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为标准的，则企业的成长必须服从资本的收益率。

虽然真实的企业成长问题远比上述说法复杂，但是，资本收益与企业成长之间存在矛盾是毫无疑问的。即使在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存在。如果仅仅考虑利税收入，则企业上缴越多越好。如果允许企业谋求扩大规模、提高水平，则必然会使成本和支出上升，减少上缴利润。国内有些学者常用长期利润和短期利润来分析企业成长与利税收入的关系，这是欠全面的。将利润的一部

分留给企业扩大再生产确实会在数年以后收回更多的利润，但这仅仅是资本数量扩张的结果，而并没有提高利润率。若考虑到资金的时间贴现因素更是如此。如果企业试图更快地发展则必然会降低利润率。资产不是利润，对资产所有者来说，如果资产失去了创造利润的能力，就要贬值。而利润的下降有可能是经营者失误所致，也有可能是经营者有意追求其它目标所致。

现代企业是由经营者控制的。企业的成长壮大，可提高经营者的权力和威望、地位，因而经营者的追求目标会与资产所有者不同。那么，哪些因素限制了经营者追求企业成长最大化的动机呢？一是经营效率，二是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股值的变化。企业的股票在资本市场上的估值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按最基本的分析，股票的现值是以后各期内股票的收益的现值。收益包括分红和股票的出卖收益，而股票出卖的价格也是由预期的收益流决定的。企业的市场值就是全部股票的现值。企业谋求不断的自身成长会导致各项支出增加、降低企业的利润。当然股票的市价是由对未来的预期收益决定的。如果投资者认为企业的利润下降是暂时的，随着规模的发展、市场的开拓，企业前景很好，那么股价不会下跌，还有可能上升。如果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佳，股票持有者便在资本市场上售出其股票，从而股价下跌。当股价跌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就面临被接管(takeover)的威胁。某些投资者可以以较低的市价买进这些股票，达到总股票数的一定比例之后，便可以接管该企业、重新任命主要经营者。然后，调整经营策略、控制企业的成本支出，提高资产收益率，股票的市价又会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分红政策并不影响资产收益。关于分红政策如何影响股票的市价，有三种不同的理论。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

提出股利无关理论，其思想是公司的股值与分红政策无关。公司的总值由公司本身的获利能力和风险决定，取决于公司的投资政策而不是收益的分配与留存的比例情况。另一个理论称为“在手之鸟”理论，认为股利收入比留存收益带来的资本收益更为可靠，因而多分红是受欢迎的。相反地，税差理论则认为，在一些国家内（如美国在1986年以前）长期资本收益是减税的，因而把收益留在企业中更为有利。至今人们观察到的情况是股值与分红政策关系不大，一些公司的分红率很低而股值持续上涨。

资本市场为企业的成长提供了资金来源，同时也对企业施加了一定的限制。当企业谋求不切合实际的扩张时，股票持有人会因风险过大、未来收益不可靠而出售股票。一般而言，企业总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利润率水平，使股票的市价基本稳定，在此基础上寻求企业成长。这样，从统计规律上看，在任何时间段内，只有少数企业处于明显的成长壮大中。这些企业之所以能显著地发展，主要是由于他们成功地开发了适合市场需要的新产品，而这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机的。只有大型的企业才有财力维持相对多样化的开发计划，做到“东方不亮西方亮”，减少产品开发上的不确定性。

二　企业重组与金融市场

企业的重组包括性质不同的两种情况：合并和接管。合并可以是双方自愿的行为，在双方共同接受的价格下达成协议。接管则是带有敌意的，通过占有多数股权而剥夺原经营者的控制权。企业兼并一般是一种统称。前面，我们讨论了历史上发生的几次企业兼并的高潮，至于其发生的原因则十分复杂。企业兼并可能

会给企业的资产所有者带来更高的收益。这种收益可能来自于：(A)协同效应。包括四种情况：(1)经营上的规模经济，(2)财务经济(指较低的贷款费用和较强的还款能力)，(3)效率上的差异(兼并前效率很低，兼并后效率得以提高)，(4)通过兼并增加了市场力、扩大了市场份额。(B)避税，当企业内部没有合适的投资机会时，兼并其它企业可以为盈余资金找到出路。如果把盈余资金分给个人则必须纳税。(C)低于重置成本的市场配置。当企业严重经营不善时，市场价会低于其重置成本。兼并这样的企业对买主是有利的。

针对企业兼并的效果问题，经济学家们做过许多实证分析和统计验证。结果却是，企业合并仅仅在营销费用上有一定经济性，其它方面则无明显的利益。多数合并企业的股值并未超过其它企业，相当一部分企业合并之后的利润有下降。因而，合并的经济性是很不确定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要获得上述经营上的益处，就必须在兼并后实行有效的内部调整，这将需要较长的时间。如果不进行艰巨的重组工作，同一块牌子下的两个企业，仍然是各自为是的两张皮。

企业兼并即使不能带来生产、经营上的益处，也还有可能对资产所有者有利，那就是分散风险。

股票执有者在一个企业的资本收益是服从概率规律的，有一个预期的均值，还有均值的分布即方差，股票执有人当然希望有高均值和低方差。当两个企业合并以后，执有合并后的企业的股票，与分别执有两家股票相比，股票的收益均值不变，而方差只可能变小。当两家企业从事的活动具有相反的风险时，合并之后的风险方差明显下降。A 企业失败的概率加大，则 B 企业成功的概率加大，于是投资风险下降。

当然，股票投资者个人的资产组合(portfolio)已经考虑了避免风险。投资者依风险和收益的不同执有多种股票，有了这种组合，就无须要求每一种股票都风险很小。但是，投资者要分散投资，必须卖掉一些股票，再去买其它股票。在出售股票的过程中必须缴纳资本收益税，因而企业合并对降低股票持有人的风险还是有益的。

现实中的企业兼并都是由经理人员发起和实现的。企业兼并既能使经理们利用经济中的闲置和错置的资源，促进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发展，也能提高经理的个人地位和威望。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经理们总是热衷于企业兼并。一种乐观的看法是，资本市场是企业经营活动的晴雨表，它可以密切监视企业的经营状况。一旦某个企业效率低下，就会受到接管的威胁，从而激发每个企业都保持不懈的竞争精神。

企业兼并也是企业追求扩张的结果。企业如果仅靠自身的发展，会遇到盈利率的限制，而兼并其它企业则不受限制。当然，企业用于兼并其它企业的资金来源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企业只能用利润中的再投资部分收购其它企业，则无异于自身积累。而当企业能够以自己的股票按照一定比例去换取它企业的股票时，则很容易扩张规模。近年来，负债收购其它企业比较多，企业发行一种利息高但风险很大的垃圾债券，把所得资金用于收买其它企业。

总之，资本市场在企业的重组和成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常运转的资本市场有助于克服企业的低效和经营者对所有者意愿的背离。企业的成长和通过重组而实现成长，有利于生产的合理组织、有利于产品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因而对整个经济增长过程意义很大。

5.4 工业组织合理化的准则

我们已经讨论了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了决定工业组织的微观机理。很自然地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的工业组织结构是适应经济增长要求的？合理的工业组织结构怎样随经济增长而改变？这类问题有很强的实用意义，但由于工业组织与各国的具体情况有密切联系，因而只能做一般性的讨论。

一 影响工业组织结构的外部因素

前面我们讨论了影响工业组织结构的内部因素，包括规模经济、学习过程、组织成本等。这些内部因素是决定工业组织结构的依据。然而在内部的要求基本一致的情况，工业组织会由于外部社会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变异。

1. 资源配置格局与工业组织结构

各国之间由于在资源条件、发展水平和国家大小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资源配置格局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各国国内商品的比价关系与国际市场的比价关系出现背离的基本原因。规模很小的国家，只能从事有限的专业化生产，其工业组织结构也就由该种产品的特性所规定。中型以上的国家，产品种类比较齐全，按粗略的划分可以将所有产品归为三类：自需型、优势型和发展型。自需型产品是指贸易性较差的产品，如建筑、劳务、部分日常消费品和基础原材料。此类产品无论成本如何都要生产。

其中日用品的成本差异不大，其组织特点是规模有限、广泛布点。而基础原料生产则适合于以资源为基础的大型化生产。优势型产品是各国已经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产品，例如在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生产的纺织品、手工艺品等。这些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可以带来很高的利益，若能维持较长时间的优势，则能够获取大量资金推动经济全面增长。象台湾、香港的纺织品、鞋类、玩具生产都是比较成功的范例。发达国家也有这类产品，象日本批量生产的电器、汽车等。这类产品引起的价格竞争越来越激烈，因而成本优势成为关键。其组织特点是适合专业化、大批量生产以尽量发挥规模经济效果。发展型产品是有好的市场前景，对未来的国际竞争起关键作用的产品，如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合成材料等产品。这类产品有时被称为高技术产品，但实际上，技术的复杂性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开发的系列性和组织的复杂性有时甚至起更重大的作用。例如我国可以成功地开发高技术的运载火箭，而至今不能生产大型民用客机，这显然不是什么技术没有掌握，而是由于复杂的组织和技术学习过程阻碍了我们以可接受的成本参与生产。某些精密的工艺要求在通用设备上确实难以实现，而专用设备和专业化生产很容易解决复杂的工艺问题，所以生产组织是更重要的。发展产品的工业组织要求具有双重性，既要求经验积累和资金集中，也要求广泛的试验性。协调这两方面的要求意味着工业组织的更高的层次。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有不同的三类产品组合，因则需要不同的工业组织结构。

2. 工业组织受经济增长阶段的影响

经济增长的路径、产品的市场阶段都影响工业组织。例如日

本和美国，尽管在经济水平和产品结构上相近，而工业组织却有明显的不同。前一章已经提到在微电子行业，日本是由十余家大公司为主体的，这些大企业具有很高的垂直一体化程度，而在美国的同领域内则存在大量的小企业。而在汽车制造业中，美国的垂直一体化程度却又远高于日本。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进入市场的时间和产品的变化过程。美国是微电子技术的先驱，没有人知道怎样的选择是正确的，因而风险较大。分散性的企业有利于多样化的试验，而技术的选择方向明确了后，大规模生产就是重要的了。日本在进入微电子生产领域，主要模仿美国的技术，全方位的试验已经不很重要。因而以集中的方式，在"看得见的手"的直接控制下，从事规模生产、降低成本是有利的。美、日在汽车工业的工业组织结构情况虽与微电子行业恰恰相反，但道理却一样。汽车工业经过的近百年的发展，基本的生产过程和产品参数是稳定的，这就使后来者能够放心地依靠市场合同实现分工和协作，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关键工序上。

二　工业组织合理化的一般理论准则

综合上文的分析，工业组织合理化的静态标准至少应包括：

（1）任何企业只要受规模经济规律影响，都必须达到最小经济规模，在成本最低的状态下生产和经营。

（2）达到最小经济规模的同部门企业必须严格独立，任何形式的串通和旨在控制市场的合并均在禁止之列，更不能在部门内搞人为的独家经营。必须维持基本的市场竞争条件（公共事业部门当然不在讨论之列）

（3）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必须在一定的限度内。越是在国内

市场上具有垄断(即最经济规模与市场需求规模接近)性质的产业,越要降低其保护率,直到采取零关税,以消除垄断带来的种种危害。

(4) 必须绝对地实行政企分开。任何独立核算的企业都不应带有行政管理职能,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也不能搞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行政的垄断渗入经营活动是最为恶劣的垄断,许多效率低下、玩忽职守及至经济犯罪都源出于此。

至于工业组织合理化的动态标准则更难一概而论,仅能从企业的变化能力上窥见一二。

(5) 在一个动态的时期内,应该有不为零的企业出生率和死亡率,以适应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这是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组织基础。

(6) 应有一部分企业从小到大的明显的发育生长过程。这个过程反映的是,成功地适应了市场需求的企业,具有自我积累、建立优势并进一步满足市场的能力。这是以规范的企业收益分配制度为条件的。

(7) 要有数量众多而技术上各具特色的小企业以适应多样化的需要。这些小企业的主要活动并不是从事批量生产,而是进行有特殊要求的加工、服务、开发或配套,因而与规模经济的要求并不矛盾。

(8) 无论是大企业内部还是企业之间应该有专业化的趋势,无论是产品专业化还是工艺专业化或者是劳动力的专业化。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来观察,任何一个观察点上所从事的活动种类应该趋于减少。

上述合理化准则的实现需要有一整套内在的机制。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可以在市场的引导下,实

现基本合理的工业组织结构。但是正象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这个过程必须以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法律干预为条件。同时，市场的波动和不可预见性，会使需要长期投入的学习过程风险很大，从而动力不足并影响到经济增长。所以即使在西方国家，许多新技术的最初研制也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进行的。美国的大量高技术产品，如飞机、卫星设备、计算机等，都是在政府出于军事考虑的订货单下发展起来的。

发展中国家要加快经济增长、追赶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不仅要有积极稳定的宏观政策，也要有适合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其增长道路多是以总量推动的。一些国家靠大量的投资带来了一时的经济繁荣，但随之而来的是恶性通货膨胀和债台高筑。事实证明，微观经济的协调和效率的提高，比总量的发展速度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我们可以粗略地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归纳为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宏观上的总量增长，主要目标是实现一个较高的积累率和投资率并保证货币的稳定。第二个层次是推进结构转换，从落后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转向先进的结构。第三个层次是经济的集约化发展，其标志是企业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能够不断推出高质量的新产品，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率。

这三个层次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没有微观经济效率的提高，结构转换就难以顺利进行，宏观经济也难以维持长期稳定发展。要使这三个层次的问题得到较为理想的解决，适宜的工业组织是十分必要的。合理、有效的工业组织对于提高微观经济效率和实现结构转换都有推动作用。

正象在技术上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一样，在工业组织上，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借鉴已有的经验，少走弯路。当然，工业组织只

是一种中间表现形式。决定工业组织形式和演变过程的是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和经济管理体制。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如果计划者能够及时地掌握充分的信息，可以通过直接控制，实现工业组织的合理化，直接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然而，困难在于，现实中的计划者即使能够掌握完全的信息，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统统管住，而只能以分级管理的方式来操作。现实中的计划过程也绝非一个完全出自经济考虑的过程。理论上计划部门应该考虑全社会的综合利益，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然而指标的多重性使得判断的标准模糊，于是人为因素便时常冲到前台。分级管理的执行者一旦有了自身利益和要求，便难以按统一的整体最优的准则行事，这就产生了无休止的讨价还价、感情融通，也就一再产生重复建设、地方割据和肥水流向国外的情况。建立起适合经济增长的工业组织结构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实现这一任务需要有意识的行动和改革的深化。

第 6 章 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特征

我们已经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工业组织的关系。从这一章起，我们转向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工业组织的研究，分析我国的工业组织对经济增长有利的方面和不利的方面，并进而讨论我国工业组织调整的途径和问题。首先我们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特征。

6.1 我国的经济增长道路与发展战略

本文的主旨是分析经济增长与工业组织的关系，正如前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工业组织是由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决定的。只有在从总体上把握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和推动力量之后，才能准确地认识工业组织因素的作用。

对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特征，已有众多学者进行了颇为深入的分析。一般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有几个突出的特征：相当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迅速的工业化过程、低的经济效率、剧烈的经济波动。

按照增长研究的通常的做法，分析一国经济增长的总体特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做出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观察各种因素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①。

具体分析我国投资和劳动力使用的实际情况，将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这里我们只能用总量数据大致地描述我国增长来源的轮廓。

全社会的资产存量是分析中的最大困难。本文中做了这样的近似处理：(1)估计基年的资产总额，(2)以历年的国民收入积累额作为以当年价格计算的资产增量，(3)以国民收入平减指数将历年的积累额换算为基年的不变价格。在附表 A 中，列出了这一换算过程。根据附表 A 的最末一列，我们得到附表 B，附表 B 显示了各主要时点上的可比的资产存量和劳动力数量。

我们以可比价计算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作为全社会的产出增长率，以社会劳动者人数衡量劳动投入。在这样的近似中存在着一些误差：第一，我国的国民收入是按物质生产部门的产出计算的，而资产和社会劳动者的口径都是全社会的，因而存在统计口径上的不一致。测度产出的比较合适的指标应该是国民生产总值，但由于我国没有长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只能做此近似。第二，国民收入指数的数据名义上是可比的，但是由于新产品按新价格，每年总有那么一些不新的产品混用当年价格计算。但由于无法做出精确的估计，只能在认识到略有高估的情况下，仍然使用这组数值。第三，资本存量的低估来自于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缺少考虑。对改革之前的情况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每到农闲季节，便有无数农村劳力手扶原始的简单工具参加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效率很低但毕竟也是社会资产的积累，而这

① 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社科院数量所和计委经济研究所都有详细的研究和成功的经验。本文只是粗略地观察增长总量的基本趋势，为后文的进一步分析做基础

种积累没有包括在积累额中。第四，象其它学者做过的一样，我们估计52年的资产总量为2000亿当年价人民币，这个基准数据也会存在一些误差①。

根据上面说明的情况，我们列出要素投入和产出的年均增长率。

表6 1　国民收入和要素增长率

	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	劳动力年均增长率	资本年均增长率
1952—90年	6.74%	2.65%	7.58%
1978—90年	8.39%	2.92%	7.91%
1984—90年	8.46%	2.76%	8.96%

资料来源：国民收入增长率出自《中国统计年鉴1991》。

要素增长率根据附表B计算。

分析经济效率的关键在于确定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即增加的劳动力和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在西方国家的增长因素分析中，一般是依照要素的边际产出等于其边际收入的假定，把不同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share)作为权数，然后计算综合要素生产率。在我国，要素的边际收入与边际产出可能相距很远，权数的确定十分困难。世界银行在对我国生产率的分析中采用了人为假定的权数，在此之后假定权数的做法多次出现。由于中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人们认为劳动力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不大，多倾向于给一个较小的权数(如0.1)。实际上这种假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所有得出中国经济整体效率

---

① 这个估计最初是由帕金斯做出的。一般认为比较接近实际情况，因而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利用这一估计。

接近停滞这一结论的分析，都与权数的假定有关。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列出丹尼森对主要西方国家1950—1962年之间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

表 6-2 主要西方国家 1950—62 年间的增长因素

	美国	法国	西德	英国
资本增长率	3.58	4.17	6.37	3.35
劳力增长率	1.42	0.58	1.84	0.77
产出增长率	3.32	4.92	7.26	2.29
权数（劳动:资本）	82:15	77.8:18	74.4:21.1	81.1:16

资料来源：Denison：*Why Growth Rate Differ*，p. 190、p. 193

从表上可见，西方国家也是资本增长率远高于劳力增长率，同时劳力的权数很大，因而就出现很大的 TFP。很显然，如果劳动的权数小一些，而资本的权数大一些，则 TFP 会变小。我国按劳动和资本权数分别为 0.6 和 0.4 计算的全要素（TFP）增长率为 2.12%，按 0.4 和 0.6 计算则为 1.13%，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31.4%和 16.8%。如果也按这个人为的权数计算上表中的美国，那么，按 0.6:0.4，则 TFP 增长为 $3.32-0.6\times1.41-0.4\times3.58=1.04$，对增长的贡献为 $1.04/3.32=31.2\%$；按 0.4:0.6，则 TFP 增长 0.60，对增长的贡献为 18.2%。没有人认为美国经济是粗放型的，但若按这种权数，则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我国的情况相近。

这样，问题就转化为各要素对产出的真实贡献究竟是怎样的。由于人们一般认为我国已经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对产出增长的作用很小，相应地资本增加对产出增

长的作用应该较大，所以倾向于给资本贡献一个较大的权数。于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显得有限了。

表 6-3 不同权数假定下的我国综合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1952—90)

	全要素投入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TFP 对总增长的贡献
(1)劳动(0.6)资本(0.4)	4.62	2.12	31.4%
(2)劳动(0.4)资本(0.6)	5.61	1.13	16.8%
(3)劳动(0.8)资本(0.2)	3.64	3.1	53.9%

由表 7-1,7—3 可以看出，我国经济自 52 年以来保持了相当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总体上看经济效率也在不断提高。建国以后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迅速的工业化过程。建国初期开展的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问题的讨论，代表了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战略。其基本思想是：基本上依靠国内积累的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它产业部门，使这些部门逐步转移到机器大生产的轨道上来，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它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逐步改善人民生活[①]。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推进得十分迅速。到八十年代初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工业已在原本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发

① 参见董辅礽：《经济发展研究》。

展到今天具有相当规模和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虽然传统的发展战略是以高积累和抑农扶工的方式实现的，但毕竟是极大地改变了国民经济的面貌、促进了整体效率的提高。

高积累率、重工业优先和进口替代是传统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这些思想在其产生之初是带有很强的实践性的，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和困难的国际环境下做出的选择。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这套战略在逐渐定型的过程中脱离了应有的限度，对一些问题做了绝对性的理解和处理。造成了积累与消费、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结构失衡。直到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对工业的倾斜政策依然在发挥作用。

6.2 改革以来工业经济的特征和面临的问题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的经济体制改革，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战略的重大转变。虽然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和规律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许多问题上必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下列几条基本的认识，奠定了改革的理论共识，并影响了发展战略的转变。

(1)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是直接、快速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经济工作的成败要由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程度来评价。

(2)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既要靠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更要靠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

(3)提高经济效率要解决宏观决策科学性和微观经济单位(企业和个人)的激励问题。

由于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基本经济问题上，我们的认识经过了长期停滞和反复，改革只能从最容易的角度上突破。以农村经济责任制和企业简政放权为代表的微观层次的改革，最先确立了新体制的开始。

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经济增长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生产的转移，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初期的经济增长。工业生产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速度，1979—1990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2%。在工业内部，消费品生产持续增长、市场空前繁荣。改革的深化为我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希望。

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意在通过调整体制刺激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但至今为止这方面的效果还不如人意。近年来的增长实绩中，工业经济的波动加剧，经济效益显著下降，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和调整进展缓慢。这些现象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只有从生产力发展规律和经济体制两方面来认识我们目前工业发展的特征，才能选择比较合适的应对策略。

(1)一般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总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换。日本、南朝鲜的战后经济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重化工业推动的。而我国的工业化转换在改革之前就已经基本从形式上完成了，八十年代初我国生产结构中制造业的比例，已经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这种初级工业化的实现，使数量上的工业化不可能继续成为改革以来工业增长的动力。十多年来的工业增长来自于这样几个方面的推动：第一，乡镇企业的大量发展和技术水平的逐渐提高；第二，消费品工业的迅速发展；第三，国家对重点工业项目的投资；第四，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

提高了已有企业的产出能力。

从工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上看，地方各级政府的投资是主要的组成部分。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地方的投资倾向于投向轻型加工业。随着轻加工业的普遍过剩，其投资效益必然下降。从生产力发展的本质上讲，无论投资主体是谁，要维持工业经济的较高的增长速度，关键是要有市场容量很大的投资机会。如果没有比较明显的投资机会，工业经济依靠正常的技术进步和内涵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虽然会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但不会有很快的增长速度。近年来各地投资趋同的现象日益严重，对热点项目的积极性非常高，这实际上是明显的投资机会在减小的一种反映。随着消费品市场的极大丰富，投资热点正在从某类商品缩小为某种商品。

(2)上述观点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失去了以结构转换推动经济增长的时机，今后只能取得中速的工业经济增长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国工业化过程远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层次还很低，工业技术水平和效率都比较落后。提高工业化的水平、继续完成工业化的进程，将是今后我国工业增长的动力所在。具体来说，将来工业高速增长的机会将来自：第一，培养和发展少量国内的先进企业，使其达到国际同行业的先进水平，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和良好信誉。争取把最好的企业送入世界百强之列，争取有更多的企业达到发展中国家前百家大公司的水平①。第二、实

---

① 据《管理世界》对我国1987年100家大企业的分析，能够达到当年发展中国家100家大企业标准的只有7家，而在列出的发展中国家100家大企业中，印度有18家、韩国16家、巴西15家、香港7家、台湾6家（见《管理世界》1989年第2期）。同时，美国的第100位的企业居然也比我国第一大企业大庆石油管理局还要大出许多。这也就反映了我国工业化水平还很低。

现工业产品和工业结构的高级化。据《管理世界》对我国87年100家最大企业的分析，采矿业和冶金业的企业占63%。100家中许多企业是"一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这就说明了我国工业结构还处于较低的层次。至于产品的粗糙、守旧以及劣质更是普遍的现象。实现产品和产业的升级，可以在产出数量稳定的情况下，大大提高工业产值。第三，我国劳动力充裕且廉价，本应具有加工品出口的优势。亚洲四小的工业增长都借助于国际市场的力量。目前我们的许多工业品的换汇成本都偏高，如能有一部分工业品能够降低成本，打入国际市场，则需求的容量很大。如果没能利用这些增长机会，则高速增长只能建立在总量扩张上，必须导致轮番的"膨胀—紧缩"。

当然，上面指出的仅仅是，工业继续高速增长的机会依然存在，但要实现这些机会则难度很大。从外延型经济增长转向内涵型已经讲了多年，这是我们必须适应的变化。提高工业化的质量既要靠建立企业内在发展的机制，也要靠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实践已经证明，只要方法得当，可以既保证企业独立决策的高效率，又从总体上有意识地推动经济成长，例如日本的通产省在推动日本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中就起过不小的作用。我国最近几年对企业机制和宏观引导都很重视，但实践中的效果还不明显。

(3)经济发展状况是判断改革成效的标准，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是人们的共同希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大致包括这样三个方面的改革：Ⅰ.建立正常的企业微观机制，Ⅱ.完善市场体系，Ⅲ.转变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和形成新的调控方法和体系。这三个方面的改革只有配套进行才能取得好的效果，然而任何一方面的问题都还远没有达成共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将有助于充分发育经济增长因素，有助于新发展战略和实施方案的尽快定型。无论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是多年的计划体制的影响，都决定了要在中国建立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规则，将是一个较长的痛苦过程。体制转轨需要成本，这本身并不可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现存的市场经济体系，无论是运作在哪个国家，当然地并非十全十美，不作深入研究地照搬只能是东施效颦。即使是在他国运行完好的东西，与我国信息不充分、透明度不高的现状相结合，也可能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应该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进行。因而，对于市场经济下能推动经济增长的工业组织形式的研究就更显重要。

工业组织的调整对生产力发展和改革的深入都有促进作用。下一章我们将专门讨论工业组织调整对我国经济增长将会起的作用。

6.3 近年来我国工业经济增长中的效率问题

在从总体上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选择之后，我们已经认识到，决定目前和今后长期内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国工业的效率。

世界银行84年经济考察团在《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的报告中，首次指出中国国营工业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在1957—1982年间是停滞的。人均占有资金额的上升，使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由于资金产出率下降，使综合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对这一判断尽管有不同意见，但生产率的问题引起了人

们强烈的关注。

近年来对工业经济效率的研究正在深入，效率下降问题也更为严重。综合反映工业经济效益的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从1979年的24.8%下降为1990年的12.4%。由于效率降低带来的损失是重大的。

工业经济效率作为一个总体指标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在原有的经济技术条件和投入产出关系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投入品和产出品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引起的企业销售利润的变动，这种变动常常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第二个层次是在技术能力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市场因素导致要素利用率的变化，如开工不足等。资源闲置使得用名义投入量(如固定资产原值、职工数等)计算的效率发生变化。第三个层次是由技术和组织因素决定的实际生产能力的变动，即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移动，这是纯粹的生产率的变动。国外关于生产率变动的分析一般是指这类变动。至于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则不应作为考察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指标。例如以各种形式的利润率来衡量工业经济效率是不妥的。因为其中包括了分配因素。

那么我国工业经济效率的下降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呢？是单纯的"效益转移"或者"市场波动"，还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真实的下降？我们分层次逐一考察近年来的情况，以期做出一个客观的判断。

(1)实际投入与实际产出的变化。实际产出的准确测度是实物产出量，实际投入包括物质消耗投入、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资本投入是固定资产在生产中的磨损，其效率反映在整体生产效率中，无法单独分析。因而单位产品的物质消耗和实物劳动

生产率就反映了实际的技术效率的变化。

据199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在重点工业企业单位产品物耗指标的近百个指标中，1990年与1985年相比，物耗下降的寥寥无几，大部分指标持平，一部分指标上升。物耗指标上升的合理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一些资源型产业生产条件恶化；二是耗能指标受非生产性活动影响也就受开工率的影响；三是产品质量的改进可能需要增加消耗。除此之外的物耗上升，只意味着管理水平的退化。重点工业企业实物劳动生产率的31个有效指标中，从1985年到1990年，上升和波动上升11个，持平10个，下降10个，各占三分天下[1]。结论十分清楚，从实物的生产率上看，中国工业从1985年到1990年效率提高是不明显的。

(2)从生产能力的利用情况看，重点工业企业的设备利用率，1990年与1985年相比，大多数持平，相当一部分下降，只有极少数上升。在纺织工业内几乎所有设备的利用率指标都是下降[2]。生产能力的闲置一方面反映了生产能力的供给过量，另一方面受到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

(3)至于价值型的综合效率下降则更为明显。价格的变化对价值型的工业效率起了主要作用。近年来在企业成本中，原材料费、运费和各种管理费用大幅度上升，折旧增加，利息支付上升。汇率上升也使一部分需进口原材料的企业失去了一部分利润。通常议论很多的工资上涨，实际上并不构成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材料、工资和各项费用构成的工业产品总成本中，五十年代，材料费占70%，工资占18%，其它费用

---

① 见《中国统计年鉴》第444页。

② 见《中国统计年鉴》第445页。

12%左右。而在1987年变成：材料费73%，工资7.7%，其它费用18.6%[1]。另据统计局公布的职工平均工资指数，1985年至1990年的六年间，实际工资下降的年份有两年（1988—1989），持平的年份一年（1987），有三年实际工资增长，但增幅都在10%以内[2]。因此尽管也存在着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问题，但并不是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升是理顺价格体系的重要步骤，价格上升带来的利益的大部分也仍在工业内部，只不过从加工业部门转向了原材料工业部门，只有以农业为原材料的加工部门的一部分利润流向了农业。然而在近些年的全面的效益滑坡中，由价格变化损失的利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那些本应从价格变化中获得的利润却无声地湮没了。将上述分析综合起来，容易看到，中国工业经济效益长期没有摆脱停滞的局面，近年来效率下滑更加明显。效率的下降不仅是由于相对价格调整而引起的货币现象，也是与宏观失调和市场波动密切联系的，更是实实在在的由技术和管理水平下降带来的生产率停滞的外在表现。使人们费解的是，在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低效率的粗放发展由来已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已一再深化，为什么久未改观？从技术的角度上看，我国重点工业企业在改革开放以来，多数已经过大规模的更新改造，然而为什么在效率上不见起色？

对中国工业经济效率的下降的深层原因已有许多有见地的看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效益下降的结构说和速度说。

一、从结构的角度看，工业内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的失调趋

---

① 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现状》267页。

② 见《中国统计年鉴》第130页。

向严重。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使加工能力远远超过原材料和能源的供给能力，造成资源紧张，一部分企业开工不足。同时由于市场需求的限制，大量产品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如此情况效益必然下降。近年来，对加工工业和基础工业的失衡一再试图调整，但收效不大。其原因之一是，由于价格体系的不合理，加工业利润大，因而吸引投资不断投入加工工业。事实上，衡量不同部门的利润率有两种不同的角度，一个是企业的成本利润率，一个是资金利税率。以企业的成本利润率为标准，则基础工业的成本利润率较高。例如，1987 年主要行业以成本利润率排序，列在前面的是：(1)石油天然气开采(26.01%)，(2)木材及竹材采运(19.92%)，(3)电力工业(17.40%)，(4)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15.30%)。而加工工业的成本利润率一般较低。但若以资金利税率为标准，则加工工业偏高。1987 年以资金利税率排序，列在前面的是：(1)烟草加工业，(2)石油加工业，(3)橡胶制品业，(4)文教体育用品业，(5)电气机械业，(6)医药工业，(7)饮料制造业，(8)造纸及纸制品业等等。这种差异是由于基础工业资本构成较高，我国的折旧率很低，因而成本利润率较高而资金利税率较低。对应地，加工工业的资本占用量较低而用工较多，故资金利税率高，成本利润率低。为了求得等量资金的利税最大化，必然会按照资金利税率的标准选择资金投向。

但是，从工业品出厂价格来看，比价关系一直在向着有利于基础工业的方向显著转变。1980 年至 1985 年间，重工业中采掘工业的产品价格上涨 25.2%，原材料工业上涨 18.1%，加工工业的产品价格上涨 6.2%，而同期轻工产品的出厂价格则下降

0.1%[1]。同时，一哄而起的低水平重复投资从来也不曾带来效益，亏损的企业越来越多。例如，1980年末全国已有酒类生产厂6333个，平均每县三个厂，亏损企业687个，亏损面10.8%。1986年居然猛增长到10540家，平均每县五个，亏损企业2207个，亏损面高达20.9%。这些事实反映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行政性分权导致资金分散，各地受到投资审批限额的制约，只能上些小项目。二是缺少组织资金的网络。某些持有少量资金的机构实在不知道干什么好，只能投资碰运气，不然怎样会出现如此多的亏损酒厂。这就是说，结构的不合理以及结构调整的困难都是有其组织根源的。

二、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看，增长速度的变化无常也会引起效率的下降。按照正常情况，是工业的生产和效率情况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我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效率问题的。但是行政性的宏观经济管理却常常使增长率变成随意的。当经济过热时，各种投入费用全面上升，资源缺口使劣质替代盛行，许多质次价高的产品得以出笼，对经济效率产生实质性损坏。当经济过冷时，由于投资和购买力的紧缩，需求下降、产品积压、产量下降，而劳动力工资和固定成本不变，其结果自然是效益下降。问题还有更让人担忧的一面，如果在紧缩过程中真的是那些质量低劣、品种不适销产品和长线产品积压，而效率较高的企业仍保持畅销，那么通过紧缩施加了产品调整压力，挤出了增长中的水份，而没有影响增长的进程。但是，由于行政力量的渗透和企业自身的软弱，中国企业的运行状况基本是同起同落。扩张时百花齐放，紧缩时万木凋零。极少有企业能够迎接经济波动的考验。

① 《中国工业现状》208页。

中国的大企业不能在逆境中显示出强者的实力，这也就说明了我国工业组织上存在缺陷。

附表 A

年份	国民收入额（现价）	国民收入指数（可比价计算）	系数	积累额（现价）	积累额（不变价）
1952	589	100	1	130	130
1953	709	111.0	0.947	168	159.1
1954	748	120.6	0.950	195	185.2
1955	788	128.3	0.959	185	177.4
1956	882	146.4	0.978	217	212.2
1957	908	153.0	0.992	233	231.2
1958	1118	186.7	0.984	379	372.8
1959	1222	202.0	0.974	558	543.3
1960	1220	199.1	0.961	501	481.6
1961	996	140.0	0.828	195	161.4
1962	924	130.9	0.834	99	82.6
1963	1000	144.9	0.853	183	156.2
1964	1166	168.8	0.853	263	224.3
1965	1387	197.4	0.838	365	305.9
1966	1586	231.0	0.858	470	403.2
1967	1487	211.3	0.849	304	258.0
1968	1415	200.3	0.834	298	248.5
1969	1617	239.0	0.871	357	310.8
1970	1926	294.6	0.901	618	556.8
1971	2077	315.3	0.891	684	611.6
1972	2136	321.3	0.894	648	579.5
1973	2318	351.2	0.892	741	661.3
1974	2348	355.2	0.891	741	660.2
1975	2503	384.7	0.90[illegible]	836	751.4
1976	2127	374.5	0.909	748	679.8

年份	国民收入额（现价）	国民收入指数（可比价计算）	系数	积累额（现价）	积累额（不变价）
1977	2644	403.7	0.899	832	748.2
1978	3010	453.4	0.887	1087	964.4
1979	3350	485.1	0.853	1161	990.2
1980	3688	516.3	0.824	1165	960.6
1981	3941	541.5	0.809	1106	894.8
1982	4258	585.8	0.810	1236	1001.6
1983	4736	644.2	0.801	1421	1138.5
1984	5652	731.9	0.763	1796	1369.8
1985	7072	830.6	0.697	2628	1831.5
1986	7859	894.5	0.670	2944	1973.6
1987	9313	985.7	0.623	3298	2056.0
1988	11738	1097.2	0.551	4231	2329.4
1989	13176	1137.2	0.508	4666	2372.0
1990	14429	1191.6	0.486	4895	2381.0

附表 B

	社会劳动者（万人）	资产存量（亿元）
1952 年	20729	2000
1978 年	40152	12858
1984 年	48197	19213
1990 年	56740	32156

附表 A、B 中的原始数据均出自《中国统计年鉴 1991》。

第7章 我国的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

上一章我们已经提到，工业组织调整对于创造增长机会、提高经济效率都大有可为。本章我们集中分析这一问题，研究工业组织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起过以及可能起到哪些作用。在本文的概论中已经说明，工业组织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经济增长。一是通过影响资源配置，提高产出效率，从现有经济中获得更高的收益，进而增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二是工业组织的某些形式可以充分利用生产过程中的外在经济性、学习过程和技术、产品、组织经验的积累，提高供给增长的潜力，直接作用于增长过程。对于工业组织的资源配置作用一般没有什么疑问，而对直接的增长作用则不甚明了。本章内我们首先说明工业组织的直接增长作用的存在性，而后分析我国工业组织对经济增长的诸种影响，最后指出我国工业组织的体制根源。

7.1 工业组织因素对增长过程的作用的存在性

说明组织因素对增长的直接作用，一般要证实学习过程或外在经济性的存在。学习过程需要对具体产品的分析，因各种产品的技术特点而异，情况比较复杂。这里我们仅用我国的地区间

的数据来说明外在经济性存在。基本的思路是：(1)选取一些主要工业部门，(2)测度这些部门内各地区之间生产率的差异，(3)说明生产率的差异与地区总的国民收入水平相关。这也就说明了随着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一些经济因素具有外在性，使主要部门的生产率都受到影响。

我们取的是我国工业 1987 年的数据，在诸多工业部门中，以净产值计，最大的 4 个部门是：机械工业、纺织工业、化学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这四个产业为例[①]，用 1987 年我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②]，的横截面数据，估计这四个部门的 C—D 型生产函数：

$$P_i = A_i \cdot L_i^{\alpha} \cdot K_i^{\beta} \qquad i=1,2,3,4$$

$$\ln P_i = \ln A_i + \alpha_i \ln L_i + \beta_i \ln K_i \qquad i=1,2,3,4$$

P_i 是 i 部门的净产值，L_i 是 i 部门的劳动者人数，K_i 是 i 部门的全部资金。回归结果为：

机械工业：

$$\ln P_1 = -1.31 + 1.101 \ln L_1 \qquad R^2 = 0.942$$

$$(-7.40) \quad (20.6)$$

纺织工业：

$$\ln P_2 = -1.59 + 0.236 \ln L_2 + 0.848 \ln K_2 \qquad R^2 = 0.983$$

$$(-11.17) \quad (1.53) \quad (5.01)$$

化学工业：

$$\ln P_3 = -2.26 + 1.218 \ln K_3 \qquad R^2 = 0.936$$

---

① 按目前的产业部门划分，工业行业有 30 多个，其中一些行业的产值比列出的前四位相差并不很远。但每个行业都去分析实为繁琐亦无必要，只以此四个行业为例，用以说明。

② 不含台湾、西藏，当时还未设海南省。

(−10.83) (19.54)

黑色金属压延和加工业：

$\ln P_4 = -1.57 + 0.55\ln L_4 + 0.655\ln K_4 \quad R^2 = 0.946$

(−6.03) (2.61) (3.19)

为了测度地区间生产率的差异，我们建造边界生产函数。假定边界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Y = f(x) \cdot e^{-\mu} (\mu \geqslant 0)$

其中 f(x)为生产边界。对于C—D型的生产函数，得到：

$\ln Y = \alpha_0 + \sum \alpha_i \ln X_i - \mu$

我们从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出的常数项实际就是这里的 $\alpha_0 - \mu$，边界生产函数的常数项是 α_0。为了估计 α_0，移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出的常数项，直到样本中的最后一个点也落在边界之内，于是选择：

$$\hat{\mu} = \max(\ln y_j - (\alpha_0 - \mu) - \sum_{i=1}^{n} \alpha_i \ln X_{ij}) \qquad (1)$$

得到

$$\hat{\alpha}_0 = (\hat{\alpha} - \mu) + \hat{\mu}。$$

将地区 j 的 L_j 和 K_j 代入边界生产函数中，获得此投入下的最大可能的产出[①]，用实际的产出与这一最大可能产出相比，就是该地区的相对效率。

$$E_j = Y_j / \hat{Y}_j = Y_j / e^{\alpha_0} \cdot L_j^{\alpha} \cdot K_j^{\beta}$$

E_j 就是 j 地区的相对效率，Y_j 是地区 j 的实际产出，$\hat{Y}_j$ 是地区 j 的最大可能产出。对 E_j 取对数：

$$\ln(Y_j / \hat{Y}_j) = \ln Y_j - (\alpha_0 + \alpha \ln L_j + \beta \ln K_j)$$

---

① 这里的最大可能产出指的是在目前生产技术水平上，由此样本内可能达到的最高效率，这也就是边界生产函数的经济含义。

$$=\ln Y_i-(\alpha-\mu+\alpha\ln L_i+\beta\ln K_i)-\mu$$

容易看出，这个值正是i地区在最小二乘法中的余项减去μ。而这个μ值是由(1)式导出的，在这项分析中经计算，机械工业的μ值是0.636，纺织工业的μ值是0.399，化学工业的μ值0.866，黑色金属工业的μ值是0.593。

影响效率差异的原因很多，这里忽略其它因素而仅考虑与工业组织有关的问题。我们将此问题归结为企业的规模经济和外在经济性。以每个地区本部门企业的平均规模P_i/N_i表示企业的规模的影响，以当地的人均国民收入IN表示平均经济水平，检验下列方程的显著性：

$$E_i=C_i\cdot(P_i/N_i)^{\beta_1}\cdot IN^{\beta_2}$$

即：$\ln E_i=C_i+\beta1\ln(P_i/N_i)+\beta2\ln IN$

在对样本数值进行回归检验之前，对样本值进行了分析，去掉了个别极端点[①]。机械工业取24个地区的数据为样本，得到：

$$\ln E_1=0.817+0.31\ln(P_1/N_1)+0.157\ln IN \quad R^2=0.760$$

(2.38)　(3.97)　(2.11)

纺织工业取24个地区的数据为有效样本，得到：

$$\ln E_2=0.115+0.113\ln(P_2/N_2)+0.135\ln IN \quad R^2=0.613$$

(0.44)　(1.76)　(2.68)

化学工业取25个地区的数据为有效样本，得到：

$$\ln E_3=-1.19-0.105\ln(P_3/N_3)+0.553\ln IN \quad R^2=0.653$$

(−5.15)　(−1.86)　(5.73)

黑色金属工业取23个地区的数据为有效样本，得到：

---

① 在机械工业和纺织工业内，去掉了辽宁、黑龙江、浙江和广西的数据，在化学工业内去掉了辽宁、上海和广西的数据，在黑色金属工业中去掉了内蒙古、浙江、福建、广西和甘肃的数据。

$$\ln E_4 = 0.088 + 0.14\ln(P_4/N_4) + 0.553\ln IN \quad R^2 = 0.653$$
$$(0.762) \quad (3.09) \quad (2.07)$$

在上述分析中以 P/N 表示企业的规模是有一定误差的，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出企业的大小的分布，某些地区的个别大企业可能效率很高，但若当地有众多的小企业，从 P/N 上则反映不出大企业的规模。另外，不同地区的企业在产品品种的侧重上有很大不同，而不同产品的盈利能力有差异，这也将导致分析的误差。尽管存在近似性，上述检验仍然显示出各地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这是典型的经济外在性的表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指出的人均国民收入较高的地区易于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率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在投资选择上的侧重标准。对具体的投资项目的确定应该以对整体的费用效益分析为依据，不仅要考虑纯经济利益也要考虑社会综合发展，最基本的准则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

存在外在经济性的作用，也就说明投资过程具有内在的提高生产率的效应。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指出，存在外在经济性就使经济增长与工业组织发生了联系。道理很明显，外在经济性是通过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实现的，有些组织形式和结构易于发挥外在经济性的作用，而有些则相反。建立适合经济增长又有利于资源配置的工业组织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本文研究的主题所在。

7.2 我国经济增长与工业组织关系的历史分析

我国经济增长和工业组织的关系，可以从我国生动的实践中观察和分析。在我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中，有过多次对工业

组织的调整。每一次调整都反映了内在经济规律的要求，有一些步骤曾对促进生产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 计划体制下的工业组织调整

解放初期的工业组织调整是与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联系在一起的。最初全国有资本主义企业12.3万家，在没收其中的官僚资本使其转为国营企业的同时，对民族工业进行了改造。在公私合营的过程中建立了许多专业公司。对相同行业或相近产品的企业进行“梳辫子，装口袋”，减少了生产中的矛盾和浪费，提高了中小企业的效率。

随着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企业越来越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由于政府直接控制企业，引起了企业积极性下降以及部门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在此之后的工业组织调整一直是围绕着条条和块块之间的权力而进行，并没有触及到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1954年之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全国统一的部门管理为主的体制占主导地位。为了鼓励各地方的积极性，克服过分中央集权，1956年出版的《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8年4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下放企业。除一些重要的、特殊的企业仍归中央管理外，其它企业一律下放。据统计，中央各部门所属企事业单位1957年有9300个，到1958年减少到1200个[1]。1961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又大

① 见蒋一苇主编《工业组织体制改革》。

权上收企业，并对经营不善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1964年，为了协调生产、提高效率，开始试办第一批12个托拉斯。全国性的托拉斯有9个，包括：烟草工业公司，医药公司，汽车工业公司，拖拉机和内燃机配件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地质机械公司，仪器工业公司，制铝公司和橡胶公司。据分析，其中的一些公司曾对合理组织生产起过很好的作用。例如，烟草公司将104个烟厂调整为61个，牌号由900多种减为270种，产量则由330万箱提高到480万箱。但这种全国性的公司过于统一，也影响到企业的积极性和运转效率。文革期间经济混乱，依照备战的要求又一次全面下放企业。

二　改革以后的工业组织变化

改革以来，工业组织状况发生了多个方面的变化。

(1)企业的小型化和多样化趋势。

随着农村改革，乡镇企业大量涌现。最初的乡镇企业只能从事简单的活动，但由于它们创立和倒闭都十分简单，成本很小，调整频繁，所以经过多年积累和探索之后，有些乡镇企业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在工业领域内，由于放权让利和投资权的下放，地、县、乡各级都投资新上了许多小企业。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数量在1988年达到了高峰，为810万家，比1985年增长56%，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988年为9.9万家，仅比1985年增长5.8%[①]。

这一时期是企业创立数增加最快的时期，但由于投资者技

---

① 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1》。

术和知识水平的限制，我国这一时期的企业小型化和多样化，主要是为了灵活地利用当地资源，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发达国家，企业小型化和多样化一般是由于两种需要，一是产品和技术特性的要求，例如皮革、时装、珠宝以及其它精细加工等不宜于大量生产；二是为了尝试某种新的技术可能性。我国近年建立的新技术产业试验区，目的就在于通过多样化的试验创造出新技术和高速发展的企业。然而，多样化和小型化仅是试验阶段的要求，一旦某种先进的产品得以产出，就应有能力迅速扩大其生产。这一过程可以借助于金融市场来实现，单纯靠企业的自身积累和银行贷款有时是不够的。

(2)企业的联合化趋势。

在国营企业内部，由于生产和协作的内在要求，几次提出加强联合的问题。1980 年和 1986 年国务院两次发布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规定，这两个规定在"所有制、隶属关系、财政渠道三不变"原则下，避开了体制中的矛盾，促进了生产和经营上的合作。随着企业自主权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企业要求按照生产力优化的准则配置资源，希望通过联合提高效率。顺应这种要求，国务院在 1987 年初制订了《关于大型工业联营企业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暂行规定》，1987 年底制订了《关于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的几点意见》。这两个文件将企业集团(紧密层)的计划、物资权和投资审批权向上移动，加强了集团的权限，冲击了条块分割的体制。集团开始跨地区跨部门承包、租赁或购买企业，逐渐突破了三不变原则，规范化的企业集团得以发育。关于横向联合和企业集团在节省投资、发挥优势、提高效率等多方面的优势，报刊上已有许多报道，这里不再赘述。

(3)竞争和市场作用的加强

改革以来，指令性计划日益减少，大部分产品已经完全依靠市场调节，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发展迅速，企业间的竞争逐渐激化。企业间的竞争，不仅是产品价格上的竞争，更应该是质量、品种上的竞争，也应该是投资决策的准确性的竞争。然而，在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强化的同时，投资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政府手中，条块政府直接参与竞争。企业间的竞争被条块间的竞争所掩盖，各地区间结构趋同、水平相近，稀缺物质流通不畅，一些低效企业受到行政力量的保护。

竞争和市场意识的加强，使相当多的企业已经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决策和行为方式上已经被推向了市场。今后的任务是要向两个方向努力。一是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进一步解决企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强化市场信号，完善市场体系，提高市场效率。二是要提高竞争的层次，引导部分企业通过竞争实现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

我们简单地再现这一历史过程，是为了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改革前的这种条、块之间的反复，至少说明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无论是条条还是块块管理企业，都有其内在的缺陷，这也就是一再反复的原因。改革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真正应该实行的步骤是解决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但是时至今日，我们的企业由于生产条件的行政性配套供应，计划、财政以及人事管理上的行政性权力划分，仍然要受制于行政系统，或者是来自条条、或者来自块块，也可能兼而有之。突破条块分割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还要付出新的努力。第二，即使是在传统体制下，人们的认识囿于一些限制，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依然会以各种形式得以表现，也就会得到人们的某种程度的理解和认识。例如，组建专业公司和试办托拉斯，都是通过组织的

调整而提高生产率的尝试。当然由于体制上的约束，那时的专业公司和托拉斯在组建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最初实行了企业的联合改组，专业化协作的水平有所提高。近年来各种横向经济联合和企业集团应运而生，对工业效率的提高和合理配置资源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但由于财政包干和市场疲软的影响，地方经济分割有加剧之势。

三　几点基本认识

从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看，总的说，我们的工业组织还不十分适合经济增长的需要。过去长期实行的外延型经济发展策略，把注意力集中在收集企业的利润用于新建项目。因而对企业的发展和调整都不够重视，更没有比较健全的企业发展的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已经拥有了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企业的内涵型发展。在我国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可得出这样几点基本认识。

第一，要实现高效的经济增长必须使现有企业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必须有正常的企业发展机制。企业的发展是以产品选择和产品投资为核心的过程，即从盈利的产品中获得资金，再将其投入到创造新的盈利的生产和开发活动中去。优质适销的产品是企业生命力的来源。然而，任何产品都有其生命周期，不可能长盛不衰。企业必须在产品生长期内迅速扩大生产规模，最大可能地占有该产品利润，并通过大量生产来降低成本，进一步占领

市场。同时，从销售利润中拿出大量资金投入研究和开发活动，不断推出新产品、改进老产品，使企业保持在不断更新产品的正常循环中。一旦某种产品可以较长时间地占有市场，则一个小企业可以迅速扩张为大企业。这种企业的发展轨迹在发达国家是处处可见的。在我国，企业投资权限和投资能力都很有限。某种畅销商品推出以后，创造了这一商品的企业必然会从中获利。然而销售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被税收和其它费用占去，再经企业与政府的受益分配，企业的留利打了很大的折扣。企业留利中还有日见增加的部分用于提高职工福利，所以生产规模的扩张很慢。与此同时，其它部门或地方见该产品有利可图，必然重新投资于此产品的生产。于是结构重复、遍地开花。许多产品的供给总量已经大大超过需求量，然而却没有一家达到经济规模。这种情况一再重演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这中间既造成了经济效率上的大量损失，也耽误了产品改进和高级化的进程。

第二，企业的重组和调整是持续增长、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不确定性，不可能所有的企业都蓬勃发展。随着环境的变化，一些企业成功了，另一些则失败了。这时通过企业重组就能大大促进成功企业的规模，及时把失败企业的损失控制在最小。必要的企业倒闭和兼并，有利于释放出错置的经济资源、减少社会的浪费。在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倒闭和兼并是很常见的。然而在中国，即使是企业合并也难上加难，更不用说企业倒闭。从理论上说，同属于全民所有的企业之间的重组并不涉及财产的转移，理应十分顺利。然而现实中的行政权限、干部安排、职工收入等诸多问题，使企业重组的阻力很大。偶尔有个别合并成功的范例，其中所付出的口舌和心机，以及进程的缓慢也令人热情顿消。因而我们常见的是，各级经济管理部门

耐心地等待着毫无指望的企业"起死回生"。

第三，我国的工业组织结构上也有一些缺陷，主要是企业规模偏小和企业间竞争的无序，企业间的分工和协作关系缺乏。工业化的过程要求一部分企业从事大规模生产，在某些部门内只有大型化才能提高效率。我国尚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工业技术水平的绝对值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数倍的距离。虽然我国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大中型企业，但企业的规模仍然偏低，技术仍然落后。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工业企业能在国际上居前列的地位。从一定程度上看，我国大企业竞争不过小企业的现象，也是与大企业本身的成本优势不明显有关的。要提高工业经济效率，必须进一步提高大型企业的技术和生产规模，切实形成优势。另一方面，企业间的竞争是企业保持高效率和不断创新的重要动力。在我国，一方面企业规模不合理，大而全，小而全严重；另一方面垄断也很严重，每个企业都有主管部门或地区的行政力量撑腰，划地为牢、分割市场。近年来多种经济成分的兴起，又使许多非正当竞争手段冲入市场，企业间应有的质量竞争、创新竞争、成本竞争已被权力的作用所淹没。

很明显，上述工业组织对增长的不利的影响，有着深刻的体制根源。改革以来，企业活力的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而行政割据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解决行政性封闭造成的弊端，将大大地有利于我国经济效率的提高。

7.3 现阶段我国工业组织的理论模式

本文至此，我们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到这样几个问题：

（1）要适应和推动经济增长，客观上存在着工业组织合理化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这种内在规律反映的是自然界的规律和生产力的规律。本文在"工业组织合理化的准则"中做了讨论。

（2）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各国（或地区）不同的资源状态相对应，存在着比较适宜的工业组织结构和状态。

（3）工业组织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在不同的体制下，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对应每种体制状况，都有相对应的可选择的工业组织结构。这也就是说，理想的工业组织也是体制状态的函数。

我国工业组织的合理化，必须考虑到国家大、水平低、发展不均衡的国情，考虑到已经形成的资源配置格局，考虑到双重体制交替时期的经济运行特点。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试图初步勾画出我国现阶段适合经济增长要求的工业组织的理论模式。

第一，工业组织适合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是自主经营的商品经营者。

在前文的理论分析中已经指出，工业组织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来源于两类机制：一是通过合适的组织形态和组织结构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二是某些工业组织形式，如专业化、一体化、规模经济等直接影响学习过程，从而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率。

从经济效率方面看，经过多年的实践，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要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必须解决企业的激励和运行机制，必须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从第二个机制上看，结论可能不那么直观。既然人们已经认识到某些特定的组织形式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那么是否可以通过计划系统更直接、更有效地实现工业组织优化呢？答案是

否定的。

实践最有说服力。我国在近三十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多次试图实现专业化和规模经济，但总是难以有效地实现预先设计的目标。计划经济实行的初期，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全面的计划容易操作。由中央政府直接安排的，以156项为代表的大型项目，确实是按照当时人们所能认识到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原则进行的。例如，一汽的规模、哈尔滨、洛阳轴承厂的专业化，在当时都是很有水准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难度增加，反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的倾向逐渐加强。表现为“大而全、小而全”的全能厂越来越多，能耗高、效率低、浪费大的小型企业四处开花。

这种政府努力推行优化的组织、而实际中却总是出现非优化的组织的现象，是计划经济固有的悲剧，它来源于计划理想与计划实现方法之间的悖论。中央计划者出于时间、能力特别是信息的限制①，不可能事无巨细统统列入中央计划，只能分层次管理，也就是划块块。企业是政府的附属，投资、经营权基本控制在政府手中。各级政府要解决本地的繁荣和个人的政绩，必须要力争当地的产值、就业和财政收入。这样，依靠当地资源和有限的资金上小型项目就是必然的。也正是由于计划层次的存在，使每个块块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块块之间的交易和协调所需的成本极高，而专业化企业又必须要考虑与其它企业的配套。一旦本块块内没有配套企业，必须到块块之外去配套，则不确定性很大，因而任何块块的首脑都倾向于搞全能厂。

---

① 信息的真实性是最困难的，原因既在于收集众多真实信息需要很高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当信息的提供者意识到提供真实信息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时，他根本就不愿意去做提供真实信息的努力。

很显然，传统计划体系并没有直接实现优化组织的内在机制，更何况这一体制对经济动力的压制作用阻碍了效率的提高。可见，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实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工业组织，只能依靠市场机制。也就是说，必须以企业的主权和经济主体地位为条件。不充分认识和给予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自主权利，就无法实现工业组织优化。

第二，参照本文第五章提出的工业组织合理化的一般准则，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的工业组织应该在近期内实现下述目标：

(1) 控制基础行业和主导行业的小型化倾向继续发展，引导和支持一些有效率的小型企业，通过经济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依据不同行业的生产特性和要求，形成既体现规模经济又有充分竞争的行业内组织结构。例如：汽车、家电等加工装配型产品和石化、钢铁等连续流程式产品，应以几家大型企业为主进行生产。这些企业要达到经济规模的要求。同类产品应有两家以上的企业同时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不出现独家垄断。

(2) 控制和减少全能厂的比重，形成一批零、部件专业厂，使众多的装配型产品能够以经济契约为准则，不受地区和部门的限制，按专业化协作方式生产。

(3) 解决低水平过度竞争、形成有序市场。形成为数不多但实力雄厚的大型集团公司，其基本特征是：融资能力很强、从事多角化经营。这样就有助于实现高层次竞争并推动产业高级化的进程。

(4) 鼓励创新，改变某些企业不死不活的状态。一般民用产品和高技术产品要继续向多样化和探索型发展。众多的小企业处于动态调整中，有新生、有倒闭，有萎缩、有壮大。

第三，促进工业组织合理化的措施。

促进我国工业组织合理化的措施，可以从大类上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完善市场体系的一般性措施，通过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根本上保证工业组织合理化的机制。这类措施包括：(1)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打破条块分割和行政干预。(2)完善市场体系。在发育商品市场的同时，建立和开放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促进生产要素的全面流动。(3)加强维持市场公平和权威的法制建设，坚决执行企业破产法和企业法。

第二类措施是针对工业组织调整的特殊措施，带有一定阶段性和表面性。包括：(1)制订具体的行业政策，通过政策法规限制无效率的企业产生和运作。(2)通过推进企业集团建设，有目的地提高市场效率。

完善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之一。实现市场的充分发育和健康运作是贯穿改革始终的艰巨任务，本文不再深入讨论。在下一章中，我们重点讨论企业集团在改进工业组织中的作用。

第四，正如我反复说明的，本文中工业组织的讨论限定在企业制度和市场结构、市场体系上。同时我们又看到，改革以来，随着企业制度的趋向正常，市场结构反而表现为劣化，行政性垄断、地区割据等问题很突出。正确地估价改革以来的工业组织状况的变化，应该明确这样两个基本观点：(1)改革以来出现的区域市场分割的强化，根源于传统的分级的计划和行政体制，而不是改革本身。正是因为中央政府在力争坚持改革取向，放松了对地方的严格直接控制，才使地方政府的局部经济行为从暗处走向明处。(2)从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上看，即使静态

的工业组织状况在短期内没有改进，这一时期全国为经济增长所做的资源动员和资源投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为今后的继续增长预付了沉没成本，换取了学习过程。因而，本文坚持要把工业组织放到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中讨论，并一般性地对工业组织的静态分析，以及“结构—行为—效果”的体系不以为然。

7.4 经济增长与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

本文的中心是讨论经济增长与工业组织，而工业组织又包含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联合化、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企业的动态演变。上面我们已经简略地观察了改革前后工业组织变化的基本情况，及其对整体经济效率和增长的影响。接着我们讨论一个近来很受重视的问题，即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问题。促进国营大中型企业成长是工业组织调整的重要内容。本文作者曾于 1990 年和 1991 年两次，在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调查企业发展问题，曾走访和调查十家效益很好或有特色的企业①。在与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接触和探讨中，我们一致认为，搞活企业的目标模式固然重要，但有效的操作过程更具有迫切性。

关于搞活大中型企业这一问题，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强调企业负担过重，要求在企业与政府的分配关系上进一步向企业倾斜，要求财政继续减税让利。第二种意见强调要为企业

① 这十家企业是：第二纺织机械厂、嘉丰棉纺织厂、中西药厂、凹凸彩印厂、第九针织厂、上海电池厂、分析仪器厂、天原化工厂、信谊药厂、轮胎橡胶公司，这些企业不仅提供了大量数据，而且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想。

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指企业之间的义务要大致相当，有平等竞争的条件和基础。同时要有运转正常的市场，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资金松紧适度、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等等。第三种意见认为，搞活企业的关键是企业组织制度的改革，要确立企业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主体地位，建立以股份制为代表的资产责任制度，理顺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这三种意见各有合理之处，各自强调了问题的一个侧面。真正建立起高效的社会主义企业制度，要同时解决多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很困难的。1991 年末国家决定分期下调大中型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在财政状况已经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作出此决定，是很有魄力和远见的。提高折旧率、补充流动资金和提取新产品开发费，这几项措施对于企业实现技术进步、解决过多的债务负担，将起很好的作用。然而，正常的市场秩序和规范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的建立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们正处在从传统体制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过渡的转轨时期。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利益调整将需要较长的时间。如果经济主体的行为不变，同时结构刚性依旧，那么经济形势出现周期性振荡的可能性也就不能排除。所以，维护企业的良性的外部环境，是一篇事关全局的大文章，难以立杆见影大见成效。企业内部的产权制度的建立酝酿已久，但全面推开股份制还有许多操作上的困难。而资产关系不解决，企业就会长期受行政体系的控制，或者导致严重的短期行为，使国有资产蒙受损失。

从理论上看，我们深信，要建立正常的企业发展机制，必须靠体制改革的深化。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生产力的角度分析企业发展的条件。我们对上海市十家企业的调查表明，某些特殊政策和特殊条件确实对企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不是企业发展

的决定性因素[1]。决定企业经营状况和发展潜力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企业是否拥有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产品是企业的生命，一个企业如果没有经得考验的产品，任何优惠政策都无济于事。

形成产品在市场上的优势，大致不外乎三种途径。一是产品种类适应市场需求，或产品本身就是创新，足以占领和开拓市场，二是产品质量很高、声誉很好，可以在竞争中取胜。三是产品的成本较低，具有价格上的优势。在近年市场波动很大，特别是市场疲软的影响下，大多数企业效益下降，能保持利税总额显著增长的企业为数很少。在笔者调查的十家企业中，仅有二纺机、嘉丰是利税总额显著增长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二纺机1990年利税总额5968.9万元，比1985年增长1.25倍。嘉丰1990年利税总额2773.2万元，比1985年增长2.2倍。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发展成绩，直接原因就是具有优质畅销的产品。嘉丰棉纺织厂的主要产品4040纯绵府绸多次获得国家金质奖，产品大部分出口，在国际市场有很好的声誉，因而价格看好，创汇成本远低于汇率，所以效益显著。二纺机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产品的出口和国内市场的畅销。该厂1990年的出口总值达1697万美元，比1986年增长69倍。取得这样的成绩当然与政策支持有一定关系，例如二纺机是上海市试点之最，嘉丰棉纺厂较早地实行了出口代理制。但最初产品优势的取得，则是这两个企业苦心经营和积累的结果。嘉丰厂产品的高质量，是该厂长期狠抓质量的累积结果，代理制不过是给予了该厂实现优质优价的条件。第

① 一次性增加投入，不能影响长期增长率，但如果配合相应的机制调整，则可以起到起动增长过程的作用。

二纺织机械厂则是靠不断投入开发和技术改造资金，从而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的。1987年开始试行放开经营的时候，正好是全国各地中小纺织厂遍地开花的时候、对纺机的需求很大。二纺机厂正是以此为契机，通过挖潜扩大生产量而获得了可观的初始积累，而后大量投入资金推动产品的技术进步，逐渐具有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一旦企业进入发展的过程中，则有许多客观规律促进企业进一步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第一，规模经济效益使企业受益。企业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就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量，而扩大产量又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从而有更大的竞争力。第二，产品开发能力使企业保持发展的势头。新产品的不断推出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新产品的开发能否适应市场是有一定随机性的。只有当新产品开发的品种较多时，才能确保"东方不亮西方亮"。而这就需要企业能够有足够的投入，只有经营状况比较好的企业才能承受。第三，市场状态好的企业易于获得技术改造贷款和立项上的支持。第四，管理水平的提高也依赖于企业的基础。许多企业的厂长都认为，在企业经营较好时容易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

任何产品都有其生命周期，企业不能希望靠几种或一种优势产品而维持长盛不衰。重要的是，企业要抓住时机，以资金的积累为基础，取得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以投入推动发展。从宏观上看，当众多的企业都处于显著增长中时，社会的有效总供给就显著上升，经济形势就比较稳定和乐观。

为了使企业能够进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前应注意：(1)集中优势保证那些正处于明显成长阶段的企业，使其顺利成长、增强实力，实现增量调

整。(2)把沉淀在市场中的国有资产充分利用起来,将大量资源占用从滞销产品和低效企业中释放出来,实现存量调整、实现这两项任务,本身就是工业组织调整的重要内容。工业组织调整的实施,需要可操作性的步骤和方案,组建企业集团是当前可取的最有效的选择。

第 8 章 我国工业组织调整的方向和有关理论问题

我们已经认识到，工业组织的形式、结构和动态演变在经济增长中有重要作用，而我国的工业组织现状中有诸多不利于高效增长的因素。本章讨论调整我国工业组织，使之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基本设想。本章围绕三个问题展开，首先分析企业集团在我国工业组织调整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然后分析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最后分析工业组织变革与市场和宏观经济管理的关系。

8.1 组建企业集团是工业组织调整的有效途径

提高中国工业的组织效率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确立企业的独立的商品经营者的地位，切实做到政企分开；二是调整规模结构，既要强化大型企业的优势，完成工业化的进程，力争在短时间内使一些企业达到国际竞争水平，又要创造多样化的就业机会；三是转向以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投资主体，打破条块分割的行政性投资体系，避免重复投资并实施有效的结构调整。在当前情况下，有意识地推动以企业集团（企业性公司）为方向的组织结构调整，有利于上述三个问题的改善。

一　企业集团的含义

严格地说，企业集团应包括四个层次。核心层是在集团内起主导作用、具有母公司性质的企业，可以是有很强经济实力的大型企业，也可以是控股公司。母公司本身可以有事业部和分公司。紧密层是由核心公司掌握主要股份，必须接受核心公司领导的子公司，子公司也是独立的法人。核心企业与紧密层企业之间以资产为纽带，共同构成企业集团的主体。半紧密层也就是持股层，与母公司有资产关系，但未达到控制界限。第四个层次则是松散层或称协作层，与集团内企业没有重要的资产融合，但具有比较稳定的互惠性协作关系。

容易看出，集团与一般大公司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持有其它公司的股份。凡是形成母公司—子公司关系、子公司也具有法人地位的，一般称为集团。仅有分公司而没有子公司，也就是公司总体上是一个法人的企业则不称为集团。目前发达国家的大公司都有海外的子公司，但是这些大公司并不自称集团。我国有关专家对美国企业集团进行考察后发现，大公司内部在对子公司和分公司的管理上并没有多大区别。设立子公司或成立分公司常常是出于税收和风险方面的考虑①。发达国家的大型公司设立全资的分公司与设立控股子公司，对其经济职能和实力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因而，企业集团与大公司在许多方面是十分相似的。

---

① 参见《中国企业集团考察团赴美国和加拿大考察报告》，国家体改委1991年5月。

我国的企业集团发展是近年来才兴起的。最初人们并不是从严格概念上来理解企业集团的，而是把企业集团作为比横向经济联合体更进一步的一种联合形式。由于国内没有形式较普遍的股份制企业和控股公司，紧密层和半紧密层的形成自然就成了问题。目前国内的企业集团中，紧密型除控股企业之外，还包括行政划转给核心企业管理但仍具有法人地位的企业；以及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授权核心企业经营其国有资产的企业。在半紧密型中也包括由核心企业长期承包、租赁的企业。由于紧密层和半紧密层虚弱，我国的企业集团常常仅有一体化的核心层和协作关系的松散层。如果松散层企业较少且协作不很稳定，那么集团与一般的大企业没多大区别。如果企业之间势均力敌，且是仅凭一纸协议的合作关系，那么其实质就是初级的经济联合体。在我国企业集团创建之初，有"十个集团九个空"的说法，其根源也就在于集团内部关系的松散。

从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一思路来分析，企业集团与大型公司十分相近，在西方国家几乎毫无差别。在我国，企业性公司先天不足，工厂直接受控于条条或块块的上级行政部门。已有的大企业多是单方向经营，基本上是一个生产单位。企业集团则包括了比较广泛的过渡形式，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经过对其它企业的渗透和影响，许多已经成为企业集团。例如解放汽车集团、东风汽车集团、鞍钢集团、宝钢集团等。而尚未称作集团的其它大型企业。经过多样化发展，实际上也有着集团的基本性质。对照企业集团的标准理论，我国企业集团的特点是，集团核心多是一个或几个生产型大企业，属混合控股公司类型。在本文中"企业集团"这一概念的使用，依据的是前述的企业集团的基本性质。凡是在性质上和职能上具有投资中心功能的企业集团，不

论其是否在名义上称为集团，都在讨论的范围之内。

二 企业集团与工业组织调整

以企业集团作为工业组织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国家以间接管理为主的方式，确立跨地区、跨部门的特大型企业集团的投资和经营主体地位。以集团整体为对象，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对必须保留的计划和物资分配实行计划单列，给予企业充分的投资权、经营决策权和直接外贸权，建立集团内的财务公司并逐步扩大其金融功能，最终使大型企业集团成为财团。各部门、各地区仍可保留和建立隶属于自己的企业，也可以搞自己范围内的小一些的集团。但无论集团大小，必须是企业性的，必须理顺企业与国家的关系。这样，政府各级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就有了三个渠道：通过部门、通过地区和通过企业集团。随着后一种渠道所占比例的逐渐扩大，工业组织中的条块分割、结构趋同将有望得到缓解。

组建企业集团并强化集团在经济中的作用，具有如下益处：

第一，有利于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维护企业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地位，探索搞活大中型企业的路子。搞活大中型企业，使企业真正关心长期利益，建立起自我发展的良性机制，是改革以来一直在试图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难以有一普遍接受的方案。目前多数企业实行的承包制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对强化区域封锁和企业短期行为也有一定责任。时至今日，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只能采用个案处理的方法，既要保证国家必要的收入和一定的监督，又要放水养鱼、搞活企业。由于人力和信息的限制，只有对数量不多而透明度较

高、影响较大的大型企业，才可能比较科学地确定长期内的承包方案。既克服短期行为、又放手搞活企业。首钢实行长期总承包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国家仅与少数特大型集团整体建立承包关系，也有利于搞好企业的多样化试点。集团内部各企业可以实行多种形式的资产代理，可以实行股份制。既保证了宏观上的稳定，又充分鼓励各种形式的组织创新，兼容并蓄、百家争鸣。即使将来我们找到了更有效的间接管理方式，那些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部门的管理，大概也只能采取这种方式。

第二、有利于特大型骨干企业继续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向国际先进水平靠拢。我国企业的技术和设备在建立时就已经确定，资本和劳动的组合、投入要素的价格以至产品价格大都是外定的，要提高素质和技术水平必须有重点地进行更新改造。以企业为决策者确定更新改造的选择，可以和内部组织调整和改善经营管理结合起来，有理由希望比行政部门做得好。以大型企业集团为投资主体，也有利于克服资金分散的弊端，集中财力跟上国际先进水平。以特大型集团为主体直接参与国际竞争还将有助于及时吸取贸易中的间接利益，掌握国际市场动态，提高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企业声誉，为将来建立中国的跨国公司做好准备。大型企业集团可以通过有效的内部组织，实现专业化分工，实现规模经济，实现垂直联合，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第三、有利于克服条块分割造成的各种弊端，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布局不合理已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阻碍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据报，国内的汽车生产厂家个数超过了欧美汽车厂的总和。类似的情况还体现在过

多的彩电线、冰箱线上。不论怎样解释，试图以宏观协调的办法控制重复建设，在执行中有许多困难。若将企业集团作为投资中心，则有助于改变现有的投资体制，从机制上解决重复投资的问题。经济活动必须用经济规律来协调，用市场的方法控制重复建设，就要集中财力把一些企业办得十分成功，创造出竞争优势和成本优势，形成进入壁垒。使那些企图搞重复建设的部门望而生畏。企业集团在规范市场行为中大有可为，例如，一汽、二汽两个集团成立之后，我国中型汽车生产上的混乱局面迅速改观。企业集团之间是否也会出现重复投资呢？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一则，企业投资的方向具有一定连续性，同等资金用于集团内的更新改造和企业发展投资，一般比用于新领域有更高的把握和收益；二则，即使是热门项目，企业投资也比政府投资更注重经济效益。企业必须对投资的经济后果负责，事先要进行市场调查，不敢冒重复建设的险。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手中执有大量资金的大公司很多，但从未出现过重复建设。大型的企业集团还可在投资利润的指导下，从事跨地区、跨部门的经营活动，推动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建立，提高市场的竞争性，抵制行政性垄断。

第四、有利于促进企业重组，实现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对经济增长中的创新和应变能力越来越重视，对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的重要性已有充分认识。然而，对工业组织的重组却步履维艰。关、停、并、转一批亏损企业的主张已经喊了多年，但总是搞不下去。原因很清楚，所谓关停并转实质在于关，社会成本过高。对照国外频繁的企业合并和倒闭，我们认识到社会保障体系和企业产权的正常转移起了重要作用。大型企业集团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可以为拍卖亏

损的国营企业准备买主。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企业的合并和接管将形成正常的渠道，而大型集团公司的建立也是开办全国性资本市场的条件。

三 我国企业集团的现状

我国的企业集团还处于初创阶段，多数在结构和功能上还不完善。近年来，随着对横向经济联合和企业集团的鼓励和赞扬之声，各种内容混杂的集团纷纷涌现。几年前的一份统计资料曾发现，全国县级以上有两千家左右集团。借鉴国外企业组织演变过程中的概念，这些“集团”中既有靠契约协调生产和销售活动的联合体（卡特尔和辛迪加），又有资产一体化的公司（托拉斯），也有多法人的企业集团（康采恩）。据国家体改委的统计，比较符合企业集团标准的只有数百家。

传统体制下为了有效地控制各行业的企业，许多地方政府在主管局之下又都设有行政性的专业公司。随着城市改革的推开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深化，行政性公司普遍取消，有些行政性公司“翻牌”成为企业性公司。近年来以“集团”旗号出现的群体中，也有极个别的是原行政性公司的再现。因而必须明确，企业集团不能兼有行政管理职能。

我国的企业集团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矛盾。在集团的组建上，遇到行政分割的障碍，资产联系缺少有效的形式。在集团内部管理上，也遇到统一规划与保持成员企业积极性之间的矛盾。从集团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来看，我国的现有集团规模偏小、功能单一、竞争力不强。标志我国目前企业集团实力的，是国务院1991年71号文件中列出的55家第一批试点企业集团。这

些集团具有几个性质：(1)尽管有些集团已比较强大，但从总体上看规模还不大，与国外的企业集团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2)我国的企业集团多是工业型集团，缺少财团型集团。(3)我国的现有企业集团都是以一家大企业为主体，联合其它中小企业。很少有几家大公司相互循环持股的情况。(4)我国现有企业集团很少有多角化经营，多数集中在同类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上。(5)由于我们企业集团的经济实力仍处于发展和壮大中，目前尚不具有在国际市场竞争的优势。

四　发展我国企业集团推动经济增长

如前文所述，企业集团的发展是我国工业组织调整的重要内容，其作用可以概括为改善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增长。仅从生产力的角度上看，集团化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有利于新产品和质量上的竞争，有利于集中优势参与国际竞争。我国的工业化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主要工业的质量、档次、技术水平及至产量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同时我们又受到来自其它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一方面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有待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所从事的新技术产业已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面对这多重矛盾和挑战，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尽快搞好一批大型企业集团，推动结构调整。

既然组建了企业集团，就一定要将其搞好，绝不能停留在形式上。搞好我国的企业集团必须从发展和体制两方面着手。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要使一部分集团迅速赶上国际水平，取得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在本文中我们已经指出，经济增长的成功国家都具有国际水平的大企业作为其

经济的支柱。我国也无法例外，只有当一批中国的企业崛起于世界经济竞争之中时，中国的经济才名符其实地走向了世界。

为了使一部分企业集团发展的“步子再快一点”，必须在内部加强管理和改进结构的前提下，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增加对企业集团的投入。增加投入又有相关的三种方式，即给政策、给项目、给资金。

给政策意味着扩大企业集团的自主权，有时也意味着国家对企业的让利。目前企业集团的特殊政策包括：计划单列、自营进出口权、组建财务公司以及一度下放的项目审批权等。企业集团当然地也获得了国家为搞活大中型企业而普遍给予的政策，如提高折旧率、提取新产品开发基金等。虽然对新旧体制交替时期，企业集团所遇到困难和解决的方法还有不同的认识，但这些政策无疑为企业集团注入了力量。给项目是指政府在考虑和审批新的投资项目时，要充分考虑已有企业集团的潜力，切实把外延型投资转变为内涵型，使企业集团有不断发展提高的机会。给资金是壮大企业集团的经济实力，增加集团的自有资金。

目前国家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搞活大中型企业(包括企业集团)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要使企业集团能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更快的发展，必须借助于金融市场的力量。允许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和其它一些大公司发行股票，可以有多种益处。第一，企业集团(或其它大公司)可以收集到永久性的建设资金，用于技术改造和产品开发，迅速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第二，股票投资一经投入便无法提出，这将有效地抑制储蓄存款冲击市场的威胁。第三，大企业形成股份制之后，有利于处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有利于资产存量的调整，有利于企业内部关系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第四，企业集团股票的大量上市将有助于克服金融

市场的脆弱性，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出于各种原因，在大型企业集团和公司中实行公开上市的股份制，可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试验。首先可以允许一些企业集团面向社会发行债卷，以筹集到的资金用于企业发展，力争在短期内有较大的提高。

搞企业集团就要将其搞好。从经济增长的角度上看，企业集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今后将普遍出现的中小型集团，其作用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资产存量调整、开展专业化生产和协作。另一类是大型的发展型集团，这类集团除去通过技术扩散和产品扩散带动中小企业发展之外，更主要的任务是要脱颖而出，切实成为国际竞争中的"国家队"。发展型集团要成为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和长期增长的主导力量。目前我国的大型工业企业和集团多在从事进口替代性质的生产活动(例如汽车、钢材生产)，应逐渐提高竞争力并走向出口导向和跨国经营。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企业，是经济从落后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过程中关键的一步。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由于产品的档次偏低，在国际市场售价较低，换汇成本很高。以至于按官方汇率统计，近年来以美元计的人均国民收入处于停顿状态[1]。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显示，一旦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达到国际市场的标准，一国的外汇收入迅速增加、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从此走向发达国家的行列。

当然，要使一部分大企业达到国际水平，仅仅增加资金投入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高素质的人和高水平的管理。在日本、韩国的经济起飞过程中，政府都有意识地推动了工业组织优化。在我

---

[1] 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官方汇率逐渐接近市场汇率所致。

国更应该能够依靠计划经济的优势，为部分企业的成长创造有利条件。需要强调的是，企业集团作为整体受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调节，甚至国家可以直接组建企业集团①。但是，企业集团本身一定是企业性的，不能继续保持行政职能。在同一产业部门内应有分属于不同集团的多家企业参与竞争。独家垄断必然导致低效，依产品划分的全国独家的条条公司不是发展的方向。既要发挥规模优势又要保证竞争，就需要有一定的市场需求规模。在那些具有垄断性质的部门，要逐渐降低贸易保护，以保证国际竞争的压力。

8.2 工业组织调整中的体制问题

工业组织调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优化工业组织，达到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二是逐渐形成灵活的工业组织调整机制。前者主要是个生产力方面的问题，而后者更多地是个体制问题。组建并搞好大型企业集团，可以比较有效地实现工业组织优化，并从实践中探索组织调整机制的问题。但是，全面地解决工业组织调整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现有的工业组织调整，包括企业的关、停、并、转以及组建企业集团等，基本上是通过行政手段实现的。在条块分割的现实中，企业的发展以及企业间的竞争都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企业集团的发展、工业组织的调整更不可避免地要触及现行体制。在公有制经济范围内，要有效地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工业组织调整，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工业组织的顺利调整需要两个条件：明确的资产权和高效

---

① 例如，意大利政府就直接组建了三家国有集团。

的资本市场。在产权比较明确的情况下，通过所有权的有偿转让实现组织调整是有效的。无论是兼并、买入股权或出让股权，都是经资本市场进行的。在这一点上企业兼并与控制其它企业（使其成为子公司）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不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在理论上属全民所有，但究竟由谁代表资产所有者还是个问题。企业的厂长和经理被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理所当然地应该对国有资产的增值负责。但是，由于三个主要原因，厂长并不普遍地为资产收益率而努力。第一，经理人员的自身利益与资产收益关系不大，因而对资产增值缺少热情而对加强经营者的地位和收入比较关注。西方经济学的文献中，称这种经理人员为达到自己的意图而对资产所有者带来的损失为代理成本。当今世界上现代大型企业的经理人员常常不是其所管理的公司的主要所有者，因而代理成本是各国公司都会出现的普遍现象。减小代理成本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竞争性的经理市场，使任何代理者都必须严格地忠于职守。第二，我们的改革是沿着两权分离的思路进行的，但是，所有权究竟管什么、如何体现等问题并不明确，经营权的范围也很模糊。现在倾向于所有权不由主管部门代表，而是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表。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怎样实现其所有权代表者的作用，这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几年前我国出现的企业有偿兼并中，出卖企业所得的利益是归上级主管部门所有的[①]。这就等于承认了主管部门对国家资产代行所有权。从理论上说，承包经营责任制交付给厂长的只是经营权，如果主管部门代行所有权，那么条块分割的格局难

---

① 例如几年前引起较大注意的北京市管总厂购买朝阳区金属工艺制品厂（也是国营企业），就是由买方付钱给出卖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朝阳区政府。当时的企业买卖大部分是这样进行的。

以改变。第三，对资产经营的效果缺少准确科学的判定依据。资产的经营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受到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常常很难区分资产收益的下降是由经营不善造成的，还是由外部环境变化造成的。即使是在市场透明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所有者（股东）对经营者的资产经营情况也只能用模糊评价。一部分股东认为资产收益不佳时，则可卖掉股票收回资金，而不去计较资产收益下降的原因。在我国企业负责人基本上还是行政任命的方式，必须有准确的标准才能明确经营者对资产收益应负的责任，这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当外部环境变化时，很难说清经理人员的绩效。

因而，要从企业体制上推动工业组织调整，必须进行两项工作。第一，在公有制为主体的范围内明确产权关系以及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界限，使企业之间的参股和买卖能够摆脱行政性干预，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第二，对国营企业制订资产评价标准，对资不抵债且无好转希望的企业要强制倒闭、核产拍卖。概括起来，当前我国的工业组织调整要结合深化改革，通过建立企业发展和重组的机制，增强企业的活力，从而推动广泛的企业联合和专业化分工，提高效率、促进增长。同时又要有意识地重点扶持少量大型企业或集团，给予目前所能给予的一切条件，将这些企业推向国际市场，为中国的高速和长期经济增长开创道路。

8.3 微观和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

在跨世纪的转折时期实现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历程，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已经分析了实现持续增长所需的工业组织政策，下面我们对工业发展的市场条件和宏观经济管

理问题略作讨论。

有效的市场体系对于调节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已经是一个基本的常识。西方国家的市场体系是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我们今天已经拥有了相当庞大的经济体系，这套体系是在行政直接控制下建立起来的。在两套体制交替的时期，如果不能及时地建立起市场的机制，则行政机能的弱化会导致体制的真空。在这种既不是市场调节也不是计划管理的所谓"即时体制"中，存在着各种漏洞。若听任其维持下去，势必严重损害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在工业组织和交易过程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一放就活"是一种幻想。因而，为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有意识地超前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当前特别要强化市场信号、加强市场的透明度，并加快期货市场的建立，引导企业的生产活动。

资本市场对于筹集资金和实现企业重组有重要的积极作用。资本市场不仅是宏观经济波动的指示器，也是经营状况的晴雨表。公开的资本市场交易是每个持股人的选票，时刻对各企业施加竞争的压力。以大型企业集团为经济主体，必须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发行股票可以筹集大量永久性资金，推动大型企业集团步入良性循环。在游资泛滥、通胀压力很大的情况下，由大型企业集团进入资本市场可以一举多得，极大地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完善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参与国际市场。目前我国的进出口比重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美国。然而，对外贸易中的垄断和低效没有明显改观。我国的出口品数量很大、质量不错却销售价甚低。生产企业很难及时获得国际市场的需求信息和产品动向，产品竞争力很

差。比较优势明显的纺织品出口，在世界纺织品贸易中的份额已超过10%，很难再有大幅度增长。因而，打破对外贸易中的垄断、提高对外贸易的效率已是当务之急。根据国际经验，由制造业企业直接进行对外贸易是十分有利的。给予大型企业集团直接对外贸易权是有利的和必要的。说得更远一点，我国价格体系的调整也依赖于国际市场价格作为参照。国际市场的价格可以有效地抑制比价关系的轮番上涨，而这一问题恰是理顺价格的难点所在。

作为分析经济增长的文章，本文的着眼点放在经济增长的供给分析。在结束全文之前，简略地讨论一下需求因素的影响。

从供给方面研究经济增长实际上是研究可能的最大增长率。无论是创新还是分工和专业化都是意在提供更大的生产能力，然而这些生产能力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作用并创造相应的价值，则要看需求的状况。

在标准的西方宏观经济短期分析中，总供给是相对固定的，而总需求是一个可调节的变量。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部分生产能力闲置，造成非自愿失业。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则物价普遍上涨，引起通货膨胀。

从长期的动态过程来看，则是另一番图景。一方面，在长期内持续存在需求不足是没有道理的。"供给能自动地产生它的需求"，历史悠久的萨伊定律一再引起某些西方经济学家的赞同总是有其道理的。产品的供给必须投入已有的产品和劳动力，供给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其它产品的需求过程，也是制造产品购买力的过程。从长期总量上看，供给和需求应该是吻合的。当然，如果不能解决短期内出现的供求矛盾，则像凯恩斯所说："长期内我们都死了"。另一方面，供给能力很难说是一个定值，实际上也

受需求的影响。供给能力是在一段时间内的产出能力，需求引力越大，则设备的利用负荷越高、资金周转越快。最通俗的例子莫过于，将一班制生产改三班制生产，则供给能力大幅度提高。事实上很少的工业企业曾达到供给能力的极限。

需求因素在现实的经济增长中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例如英国，长期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尽管资源配置的效率是高的，但经济增长缓慢。我国经济虽然存在严重的结构扭曲和资源错置，但增长率很高。这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需求的作用。当然，只有当需求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带动供给增长时，需求的增长才是有利的。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投资的收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的发展，如果创造了过多的需求就会引起物价上涨。在发展中国家，以需求拉动为动力的经济增长一般可以获得较高的增长率，但也会引起一些负作用。一是纵容粗放型发展，不利于结构调整。二是长期的通胀压力一旦遇到供给方面的障碍，易产生滞胀局面。

总需求和总供给互相影响决定了经济增长率。以亚洲四小为代表的半工业化国家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成绩，主要是建立在低成本高竞争力的产品发展之上的。创造出有吸引力的产品自然就创造了需求，这当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情况。也应注意到，以美国为例的发达国家在战后实行的需求管理政策，也有助于维持二十年的繁荣。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以高投资为特征的需求拉动型经济也取得了可观的增长效果。因而保持一定的需求水平和需求增长率是完全必要的。

当然，总需求调整的前提是价格机制可以自动调节资源配置。宏观总量管理不能解决结构刚性问题。同样地，结构的僵化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也主要地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不能归罪

于宏观上的冷、热。凯恩斯理论的宏观调节暗含了资源全面利用不足，对不符合这一假定的情况，（例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所强调的，发展中国家仅仅有剩余劳动力，而没有其它剩余资源，）宏观需求管理的作用是有限的。即使是在西方国家，如果存在某种程度的结构刚性，也会使宏观调控失灵。自 70 年代初开始的美国经济停滞已经显示了总量调节的困境。据分析，这次停滞的导火线在于石油危机引起能源价格上涨，造成了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的困难。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被迫采取紧缩政策，致使投资下降、失业上升，这是很正常的结果。接下去的情况是，如果失业率能迫使实际工资下降，则生产成本下降，资本收益率回升，诱导经济扩张。然而，如果存在工资刚性，则失业率的上升并不能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效率，那么停滞将持续下去。

宏观需求管理是十分复杂的，本文这里所要表达的仅仅是：(1)需求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2)需求调控必须以高效的微观调节机制为基础，在结构刚性严重的情况下，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体的宏观经济调节是难以取得满意结果的。

出于我国的现实，宏观需求管理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大。相反地，宏观经济的波动却极大地有害于微观经济的运行，使本来就低效的微观经济活动无章可循、变化无常。因此，"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方式对我国是不合适的，应该执行长期稳定的宏观政策，建立起企业和个人对长期经济状况的稳定预期，使它们在稳定的参照系中乐于从事长期的研究和开发，从事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才会真正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随着工业组织的调整和微观经济效率的提高，结构刚性会逐渐缓和，直到最终形成较为灵活的市场出清的机制。那时，宏观经济调节将大有用武之地。

结束语——走向繁荣

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过持续数年的高速增长，通过这一段黄金时期实现了经济起飞，从此告别贫困走向繁荣。在中国也能出现一段宏观和微观协调、供给和需求协调的起飞阶段，这是无数中国人热切的希望。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充满信心，我们同时也必须为此而做出艰苦的努力。

工业组织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是工业经济持续增长的组织基础。中国不同于那些仅靠商业就足以致富的小国，只有培养了中国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名牌企业，建立了高效的工业组织调整和演变的机制，才能在跨世纪的时刻自信地面对未来。现代化之路任重道远、千端万绪，呼唤着经济学的理性和管理者的实干精神。

主要参考文献

[1] (美)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1987年。
[2] (日)白泽照雄,《日本汽车工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3] 赍贵春、尹传学,《南朝鲜企业集团》,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年。
[4] (美)戴维·哈伯斯塔姆,《汽车大亨》,机械工业出版社,1986年。
[5] 董辅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
[6] 董新保,《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991年。
[7] (美)多马,E.,《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
[8] 傅家骥,《工业技术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
[9] (美)福克纳,《美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
[10] 管理世界中国企业评价中心,"1987年中国100家最大工业企业及九大行业50家评价",载《管理世界》89年,第1、2期。
[11] (日)广泽广已主编,《日本的崛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12] 龚维敬、甘当善,《美国垄断财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3] 国家计委地区局、中国企管培训中心编,《企业集团的组织与发展》,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 年。

[14]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年。

[15] 国务院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工业现状》,人民出版社,1990 年。

[16] 霍利斯·钱纳里,《发展的格局 1950--1970》,中国财经出版社,1989 年。

[17] 机械工业政策研究编委会,《中国机械工业产业政策研究》,机械工业出版社,1990 年。

[18] 蒋一苇主编,《工业组织体制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 年。

[19] (美)乔根森,D. W. ,戈洛,F. M. ,《生产率与美国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年。

[20] (美)乔治·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三联,1989 年。

[21] 金光锡、朴俊卿,《韩国经济高速度增长因素》,新华出版社,1981 年。

[22] 金泰相、张赤宸主编,《战后日本垄断资本》,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 年。

[23] (日)君冢芳郎,《日本计算机工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

[24] 李子奈,《计量经济学——方法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年。

[25] (英)罗伊·哈罗德,《动态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3 年。

[26] 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27] 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 1989—1990》,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 年。
[28] 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 1990—1991》,中国展望出版社,1991 年。
[29]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 年。
[30] (法)莫里斯·阿莱,《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年。
[31] (日)南亮进,《日本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9 年。
[32] (美)钱德勒,D.,《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 年。
[33] 任文侠等主编,《日本工业现代化概况》,三联书店,1980 年。
[34] 日本和平经济计划会议编,《日本垄断企业集团》,商务印书馆,1983 年。
[35] 塞风、陈淮,《工业经济管理问题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年。
[36] (美)沙伊贝,H.N. 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
[37] 世界银行,《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年。
[38] 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中国:计划与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年。
[39] 世界银行 1984 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年。

[40] 史景星主编,《中国工业公司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41] 田源主编,《中国企业产权转让》,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 年。
[42] 汪海波主编,《中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经济效益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0 年。
[43] (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85 年。
[44] 杨宏儒,"内生增长模型的比较",载《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1991,9 期。
[45] 杨宏儒,"内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启示",载《经济学动态》,1992 年第 4 期。
[46] 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第 25 届年会,《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年。
[47] (美)尤金·伯格汉姆等,《美国中级财务管理》,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 年。
[48] 周叔莲,"我国企业管理的现状和对策",载《管理世界》,1991 年第 1 期。
[49] 朱镕基:"坚持技术进步的道路",载《解放日报》,1989 年 10 月 28 日。
[50] Arrow, Kenneth J.,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 155—173.
[51] Auerbach, A. J. ed. *Corporate Takeovers: Causes and Consequ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52] Benhabib, J. and Jovanovic, B. "Externalities and Growth

Account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 81 No. 1.

[53] Baumol, W. J. , Panzar, J. C. , Willig, R. D. .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54] Carlsson, Bo ed. *Industrial Dynamic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1989.

[55] Chenery, H. B. , et 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Oxford Univ. Press, 1986.

[56] Chenery, H. , Srinivason, T. N.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North Holland, 1988.

[57] Chandler, Jr. A. D. . *Scale and Scop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8] Dasgupta, P. and Stiglitz, J. . "Learning-by-Doing, Market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and Trade Policies", *Oxford Economic Paper*. V. 40, 246--268.

[59] Dasgupta, P. and Stiglitz, J. .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Nature of Innovative Activ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June, 1980.

[60] Day, R. H. and Eliasson, G. eds. *The Dynamics of Market Economic*.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7.

[61] Denison, E. F. . *Why Growth Rates Differ: Postwar Experience in Nine Western Countri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7.

[62] DeJong, H. W. et al eds. *Mainstreams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6.

[63] Dorfman, Nancy S. . *Innovation and Market Structure:*

Lessons from the Computer and Semiconducter Industries. Balinger Publishing, 1987.

[64] Ehrlich, Isaac. "The Problem of Development: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 98, No. 5.

[65] Gapinski, James H.. *Macroeconomic Theory: Statics, Dynamics and Policy.* McGraw-Hill, 1982.

[66] Grossman, G. M. and Helpman, E..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Long-Run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 80, No. 4.

[67] Hay, Donald A. and Morris, D. J.. *Industrial Economics-Theory and Evid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68] Helpman, E. and Krugman, P. R..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MIT Press, 1985.

[69] Jagren, L.. "Concentration, Exit, Ent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Swedish Manufacturing". in *IUI Yearbook* 1986—87.

[70] Kaldor, 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uti, F. A. and Hague, D. C. eds, *The Theory of Capital.* St. Martin's Press, 1961.

[71] Kamien, M. I. and Schwartz, N. L.. "Market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 13, No. 1.

[72] Krueger, Anne O.. "Factor Endowments and Per Capita Income Differences Among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Sept, 1968.

[73] Landau, D..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n Empirical Study for 1960—1980".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86, 35—75.

[74] Langlois, R. N. ed. *Economic as a Process: Essays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75] Lucas, R. E. J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 22, 3- 42.

[76] Maddison, Angus. "Growth and Slowdown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cs: Techniques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June, 1987.

[77] Matthews, R. C. O.. "The 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Source of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Dec. 1986.

[78] Olson, 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79] Porter, M.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Macmillan Press, 1990.

[80] Reid, G. C.. *Theorie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Basil Blackwell, 1987.

[81] 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 1986.

[82] Romer, P. M.. "Are Nonconvexities In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90.

[83] Romer, P.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 98, No. 5, 1990.

[84] Rosenzweig, M. R.. "Population Growth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 98, No. 5, 1990.

[85] Scherer, F. M..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Honghton-Mifflin, 1980.

[86] Schmalensee, R. and Willig, R. D. ed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 1989.

[87] Shujiro Urata.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China: 1956—1981".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87, 96~115.

[88] Steiner, P. O.. *Mergers: Motives, Effects, Polic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5.

[89] Stern, Nicholas. "The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A Survey". *The Economic Journal*, Sept. 1989.

[90] Stiglitz, J. E.. "Markets, Markets Failures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 79, No. 2.

[91] Stiglitz, J. E. and Mathewson, G. F. eds.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Analysis of Market Structure*. Macmillan, 1986.

[92] World Bank. *World Tables 1991*.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93] Yang, Hongru and Li Yi Yuan.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es of Scale in Major Industries of China", Presented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Quantitative Econom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 the 1990's, Beijing, 1990.
[94] Yang, X. K. and Borland, J.. "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No. 3.

后　记

本书是在我提交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略作修改而成。

想到本书将被送到读者面前，心中便有些不安。这篇博士论文完成于1992年5月，当时中共十四大尚未召开，对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还有尖锐的争论。本文遵循经济学者的基本准则，客观地分析和讨论了本文相关的理论问题。这使得本文在十四大之后无须做任何应景的修饰。但同时，十四大之后的中国经济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在召唤着更深刻和面对现实的理论。这样看来，对全文做些补充和完善会更好些。怎奈手上工作繁忙，使我未能如愿。

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实践性。面对市场经济的新课题，每个人都要重新调整自己的资源分配，以求得最大的目标函数值。在清华园十一年使我受益非浅，但同时也进入了理论学习的边际收益递减区域。为了获得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我于92年9月"下海"到北京四通集团，体会在市场经济中游泳的酸甜苦辣。我相信，这样的经历会使我在个人素质上得到丰富和提高，或许将来会提出更具有操作性的相对成熟的经济理论。

本书将显示出的作者学识上的浅薄是无法回避的，每个人都无法超越学习曲线的约束。好在学界的师长和朋友们对此都能理解。把不成熟的认识端出来，也许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任何科学都是在借鉴和探索中前进的。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要感谢我的博士学位导师朱镕基教授和董新保教授。1990年初，当我进行论文选题的时候，朱镕基教授正任上海市市长。他在百忙之中先后两次安排了我在上海的调研，之后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我以鼓励。

我还要特别感谢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是他将本文推荐给三联书店，并热情地给我以具体指导。三联书店的吕祥博士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我十分珍视他们给予我的友情和付出的劳动。

最后，我要再次表述一个熟知的道理：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行为，增长理论研究是为未来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是献给女儿杨易易和她们那一代人的。

杨宏儒

1995年1月

出版后记

当前，在海内外华人学者当中，一个呼声正在兴起——它在诉说中华文明的光辉历程，它在争辩中国学术文化的独立地位，它在呼喊中国优秀知识传统的复兴与鼎盛，它在日益清晰而明确地向人类表明：我们不但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我们还要群策群力，力争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变成真正的文明大国、思想大国和学术大国。

在这种令人鼓舞的气氛中，三联书店荣幸在得到海内外关心中国学术文化的朋友们的帮助，编辑出版这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以为华人学者们上述强劲呼求的一种纪录、一个回应。

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著名专家、教授应本店之邀，组成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完全独立地运作，负责审定书稿，并指导本店编辑部进行必要的工作。每一本专著书尾，均刊印学术委员会推荐此书的专家评语。此种学术质量责任制度，将尽可能保证本丛书的学术品格。对于以季羡林教授为首的本丛书学术委员会的辛勤工作和高度责任心，我们深为钦佩并表谢意。

推动中国学术进步，促进国内学术自由，鼓励学界进取探索，是为三联书店之一贯宗旨。希望在中国日益开放、进步、繁盛

的氛围中，在海内外学术机构、热心人士、学界先进的支持帮助下，更多地出版学术和文化精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九三年十月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征稿启事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面向海内外学界，专诚征集中国新进中青年学人的优秀学术专著，包括中青年留学生在海外的研究成果。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专家组成学术委员会，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按年度评审遴选，决出每辑书目。投寄而未能入选的稿件，学术委员会将严守秘密。

凡有意应征者，可以写信或者寄稿给北京 100706，朝内大街 166 号三联书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学术委员会。来信或来稿务请注意：

一、参选作品必须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专著；

二、书稿必须附有至少两位专家（教授或研究员）的署名推荐书及修改意见；

三、附寄本人简历，特别是关于学术经历、写作经过的说明；

四、除完整的手写稿件，如不接纳将退寄作者外，其余（包括打印稿件）均不退还；

五、惠稿如不予接纳，学术委员会将写信通知本人；限于人力，请恕不能详述退稿理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九三年十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作者＝
页数＝１７１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